

目 录

- 一九三六年绥远抗战始末.....董其武
孙兰峰 (1)
- 回忆傅作义先生.....王克俊 (28)
- 红格尔图抗日战役前后.....李忠孚 (99)
- 收复百灵庙的回忆.....令狐里 (105)
- 长城抗日战争中的怀柔战役.....苗玉田 (116)
- 关于冯玉祥在五原时期活动的一些见闻.....刘人俊 (131)
- 我所知道的徐永昌.....李居义 (141)
- 蒋方震自戕目击记.....苗玉田 (150)
- 锡盟王公觐见袁世凯亲历记.....宋 英 (153)
- 海山.....白玉崑 (157)
- 海山简历.....吴紫云 (162)
- 章文轩统治鄂托克旗二十年.....刘映元 (164)
- 巴布扎布事略.....正珠尔扎布 (184)
- 巴布扎布叛乱始末.....彭祝三 (189)

五四初期新文化运动在绥远地区的传播……………杨令德（198）

√ 回忆包头《西北民报》……………杨令德（205）

清兵镇压卓昭两盟金丹道起义的经过……………邢复礼（208）

一九三六年绥远抗战始末

董其武 孙兰峰

一九三六年的绥远抗战，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感召下、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发动的。傅作义将军坚决地领导了这次抗战。绥远抗战包括红格尔图战役（当时习惯上也称为绥东抗战），百灵庙战役，其尾声是收复大庙。我们两人当年在傅作义将军的领导下，曾分别参与了这两次战役的指挥。现将绥远抗战有关史料忆述如下，以为史学研究参考，并希知情同志赐正。

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绥远的 阴谋活动

（一）设置特务机关

日本帝国主义自它的先占满蒙、后占华北、进而吞并全中国的侵华国策确定之后，便处心积虑地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向我国推行其侵略计划，以期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侵

占了我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一九三二年又侵占我热河省。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唆使汉奸殷汝耕成立了傀儡政权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我冀东二十二县脱离中国。一九三六年春，又指使日蒙伪军侵占了我察北六县，并将冀察两省特殊化。而其野心不死，妄图进而控制整个华北和整个大西北。其初步计划为首先夺取绥远大青山以北各县，逐渐推向西北甘、宁、新三省边界，阻断中国西北对外交通，实现其所谓满蒙新政策。

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以上计划，首先在华北和绥远各地设置特务机关。派和知鹰二为太原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为化德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为归绥特务机关长。这些特务机关成立后，就开始进行其卑鄙无耻的勾当，如搜集情报，挑拨民族关系，分化民族团结，拉拢收买民族败类，捣乱破坏社会秩序，而最主要的是收买卖国贼，组织傀儡政权，依据一九三五年夏签订的“何梅协定”，压制民众抗日情绪，破坏抗日活动。日本侵略者企图用这些卑鄙伎俩阴谋夺取绥远，控制华北，并进一步覬覦西北，最后实现其吞并整个中国的迷梦。

（二）扶植傀儡武装

日本侵略者一方面让田中隆吉拉拢扶植和指挥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和李守信，阴谋组织所谓“大元帝国”，其第一步先成立了“蒙古军政府”，搞出一个类似伪满洲国的傀儡组织，另一方面收买匪首王英组织所谓“西北蒙汉防共自治军”和“大汉义军”，不时从察哈尔窜扰绥境。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占蒙绥费尽心机，只在利用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组织所谓“大元帝国”一事上，即耗费大量资财，千方

百计企图把百灵庙经营成为绥北的军事战略要地和交通中枢。

在日本侵略者的卵翼下，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包悦卿等人组成了所谓“蒙古军政府”和“蒙古军总司令部”。以德穆楚克栋鲁普为总司令，李守信为副司令，编组成伪蒙古军。由李守信兼第一军军长，德兼第二军军长。又指使王英、张万庆、金宪章、石玉山、葛子厚、安华亭、王子修等组成伪“西北蒙汉防共自治军”，后又改为“大汉义军”，王英为总司令，张万庆、雷中田为副司令。另外在察北设立军事学校，派遣日本军部后各军官担任教官，在伪蒙古军及王英伪“大汉义军”部队中，大量派遣日本军官担任部队训练和作战指挥人员。补给德穆楚克栋鲁普飞机、大炮、装甲车及大批军需用品。令德穆楚克栋鲁普驻嘉卜寺（化德），蒙奸李守信部驻张北及庙滩，匪首王英部驻尚义、商都，德的嫡系部队伪蒙古军第七师穆克登宝部驻百灵庙，并抽调热河伪满骑兵五千名，由热河东部北票开驻察北多伦、沽源一带。日本侵略者的这些部署总的企图是于必要时指挥伪满热河骑兵部队和德、李、王的伪军，用三方面的力量实现其侵占蒙绥之宿愿。

（三）傅作义将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1、限制特务机关的破坏活动。一九三五年夏，日方派羽山喜郎为归绥特务机关长。当时担任绥远省主席的傅作义将军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斗争。首先对“特务机关”这个名称，傅认为不能接受。他说：用特务机关来搞中日亲善，不但不能起好作用，反而会激起群众的不满。“特务机关”四字在绥远不能适用。羽山不得不接受傅的意见，将“特务机关”改称“羽山公

馆”（日寇在华北各地均称“特务机关”，唯在绥远叫“羽山公馆”）。随之羽山又藉日中亲善之名，要求取消一切反日组织的活动，并要求检查部队中有无反日情绪等。这些无理要求遭到傅的坚决反对，予以严词拒绝。

羽山见其特务活动难以施展，遂又采取卑鄙手段派遣大批日韩浪人，分往包头、萨县、集宁、丰镇等地，寻衅闹事，进行破坏捣乱。傅作义将军密令各该地军、政机关和基层工作人员严加防范，采取相应措施，打击了羽山派往各地的特务人员，使他们寻衅闹事挑起争端的阴谋未能得逞。

2、武力制止日寇修建机库。一九三六年，日寇要求在包头飞机场修建日本飞机库。傅作义将军当即以国家主权不容破坏严加拒绝。而羽山竟由天津运来大批器材及日本技术人员和天津的工人，要强行施工。对此情况，我方一面向羽山严重抗议，一面下令包头县政府派警宪和地方保安队，开进飞机场，在机场内搭起帐篷作长期露营演习，迫使日本人不得不停止修建机库。

8、挫败日寇坂垣的阴谋。一九三六年八月间，日本帝国主义特派其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突然乘飞机来绥远“访问”傅作义主席。傅在省政府正厅接见了坂垣。在接谈中，坂垣大弹日中是同文同种的两个兄弟国家，应该互相亲善，不应互相仇视，影响两国邦交等等滥调。傅说：中日亲善必须是以平等互惠，互相尊重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为前提。若以“亲善”两字作幌子，而迫使一方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根本就谈不上“互相亲善”。坂垣无言以对，竟厚颜无耻地对傅说：傅将军是中国的伟大人物，是华北的名将，在华北的威望最高，应该给华北人民作一番事业，改善日中关系。我们大日本帝国将全力来支持你。并且离间说：宋哲元虽和我们签订了“华北协定”，但我们认为宋在

华北的威望不够，领导不起华北来。傅听到这里当即正告说：华北是中国的领土，绝不许任何人出来自搞一个独立局面。坂垣再遭碰壁后转而提出蒙绥问题，傅说内蒙和绥远都是中国领土，不许任何人来分割独立，也不许任何人来侵略蹂躏。如果德穆楚克栋鲁普背叛祖国，进犯绥远，我们将坚决予以消灭。因为我是国家边防负责人，守土有责，绝不能使国家领土受到侵犯。坂垣解释说：德是打算假道绥远向甘肃、宁夏去，绝无攻占绥远之意。傅见坂垣越说越不象话，即告以不要再谈这些问题。坂垣游说、分化、离间的阴谋被挫败，自感无趣，即托词谢退，乘飞机匆匆而去。

二、绥远抗战前夕

(一) 日伪加紧侵绥活动

一九三六年夏天之后，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和操纵下，大肆扩军备战，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侵绥部署。同时日寇在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的特务活动也更加猖狂。日寇的飞机不断在空中侦察，汽车连夜赶运物资，调动部队，潜伏各地的汉奸也蠢蠢欲动。七月初，日伪西北防共自治军司令于志谦，副司令马子玉率部进犯兴和，傅作义将军命令许书庭团长于七月初出击，俘马子玉等六十余人。七月三十日，日伪西北防共自治军总司令王道一率众二千余人进攻我绥境东北之红格尔图 and 土木尔台，八月二日经我集宁驻军出击，毙伤敌过半，王道一逃回商都后被日寇枪决。此后，日伪更变本加厉，积极备战。

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日本侵略者在嘉卜寺（化德）召开绥远军事会议。会议由日寇关东军派遣的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主持，参加人员有：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王英以及卓世海、张海鹏等。会议决定以王英、李守信两部为主力进犯绥远。王部由商都进犯陶林，兵站及后援部队设商都及嘉卜寺；李部由张北以西之南壕堑、大青沟直犯兴和，兵站及后援部队设张北。进犯计划共分三路：以蒙奸李守信率伪蒙古军第一军，部署于绥东兴和一带为左翼；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的第二军，部署于绥北土木尔台以北一带，并以穆克登宝伪蒙骑兵第七师驻百灵庙为右翼；另以匪首王英的伪部进驻于红格尔图东北的土城子一带，先行侵占红格尔图，然后从百灵庙与红格尔图由左右两翼同时出动进犯归绥，再分兵侵犯绥东集宁、绥西包头及河套。这样南可直接威胁晋、察、冀地区，西可与日寇在甘、宁、青、新各省所培植的亲日分子取得联系，为完成各省的特殊化创造条件。此外，日寇还宣布由十月份起至战斗结束期间，部队一律发给双薪。战争所需的武器、弹药等之补充，均由日方负责，并发给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王英各三十万元，卓世海、张海鹏各十万元，以资鼓励。

会议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即令伪满骑兵三千，由热河东北部的北票，经赤峰开至察北多伦、沽源一带；令驻沽源的匪军李振铭部千余人，开驻商都以西的羊群；令驻多伦之匪军四千余人，西开至宝昌、康保；令宝昌之吕存义部三百余人，开驻商都附近；令伪蒙古第二军宝德勒额骑兵八百余人，由公会西进归李守信直接指挥；令李守信部王振华全师于十一月上旬开抵商都，协助匪首王英作战。另派日飞机数架、坦克数辆，协助王英匪部作战。并将皮军衣、汽油等急运张北供给李守信部，又由多伦运张北毒瓦

斯弹及毒瓦斯发射器两具，另给李守信汽车数十辆，运送武器、弹药，装备李伪匪军。同时由关东军派出飞机多架，集结于张北及商都机场，每天派出飞机飞我绥东及武川一带进行侦察活动。当时日本侵略者指挥的日伪军兵力计有：匪首王英的伪部队约一万三千余人，蒙奸李守信的伪蒙军部队约万余人，其余卓世海的伪察蒙保安队及金甲三伪部队等约万余人，连同日寇派遣在各伪军部队中的各级指挥和特工人员等，总兵力号称四万。大有倾巢犯绥，战争一触即发之势。

（二）傅作义将军决心抗击侵略

傅作义将军侦得上述情况后，感到自己守土有责，决心奋起抗击日伪侵略。但又自知绥省力薄势孤，困难重重。十月下旬，蒋介石以避寿为名在洛阳部署“西北围剿”的反共军事，分批召见华北和西北高级将领。傅乃藉随阎锡山前往洛阳晋见蒋介石之机，向蒋、阎陈述绥远局势紧张情况，同时提出：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及避免绥省同胞遭受灾难，决心给敢于来犯的日寇及其指挥下的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以迎头痛击，希望中央给予支持。蒋、阎则主张集中兵力先消灭中国共产党，不同意对日寇及其指挥下的蒙奸进行反击，唯恐引起中日冲突，让傅克制忍让。傅力陈绥远安危关系国家前途，不能再蹈东北复辙，坚决主战。蒋、阎仍不同意。经傅再三陈述，最后蒋、阎出于胜败诱诸地方，胜则归功于自己领导有方，败则归罪于傅作义处理不当，那时可以按地方事件牺牲傅作义向日本帝国主义塞责这样一个卑鄙目的，勉强同意了傅的主张，任命傅为晋绥军前线总指挥。当时傅虽也深知蒋、阎表面应充，骨子里不怀好意，但出于爱国情深与守土重

任，决心不惜一切，抗击到底。返绥后便与阎锡山派来绥远拥兵监视傅作义的晋军赵承绶和王靖国商谈抗敌大事。赵承绶慨然同意傅的反击主张，并表示愿以全力支持抗敌。王靖国阴险狡猾，表面同意，实际不愿卷入漩涡。傅与赵、王商谈后，又秘密召开各级军政人员会议，会上大家一致拥护傅作义将军的抗战决心，并对部队官兵秘密进行思想教育，印发抗战的“士兵读物”小册子，鼓励官兵敌汽同仇，树立必胜的信心和决心，秣马厉兵，枕戈待旦。

傅作义将军除积极部署军事，激励官兵决心抗战外，并对各界人士发表谈话，表示抗战决心。他说：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和蒙奸李守信、匪首王英等，背叛祖国，出卖国家民族，认贼作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指挥下，妄图进犯我绥蒙边疆。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坚决进行反击。我们一定要坚毅、沉着地积极作好一切准备，为完成我们抗战救国的艰巨伟大任务而奋斗。

十一月五日，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伪察境蒙政委员会的名义向傅作义将军发出通电，进行战争威胁。傅作义将军当即复电严予驳斥。

十一月八日晚，傅作义将军在总指挥部召开营以上军官参加的秘密军事会议商讨抗敌的对策。傅在会上将日伪军的兵力部署及有关的其它情况作了详细说明，然后征求大家意见。与会人员一致表示：我们身为军人，誓死保卫祖国的边防，一寸土地也不能让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日伪胆敢来犯，定将其全部歼灭。傅说：大家精神很好，但只凭血气之勇，不能战胜敌人，必须讲求策略和很好地运用战略战术，才能克敌制胜。战略上要以攻代守，战术上要先发制人。这次抗战任务非常艰巨，尤以我军在行进中，上有敌机侦察，下有深雪挡道。要做到出奇制胜，必须行动迅

速，严守秘密。同时要准备开路用具，防空的伪装白布，使地上积雪不能挡路，空中侦察不能发现。傅作义将军的这一正确决策和周密的部署，对我们取得红格尔图及百灵庙两次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会上，傅作义将军任命彭毓斌、董其武为绥东防守总、副指挥官；孙长胜，孙兰峰为绥北防守总、副指挥官。傅最后又勉励大家说：绥远为西北数省的门户，歼灭犯绥之敌，就是保卫西北。此次抗战关系非常重大，胜则奠定抗日基础，国家民族从此可以得到挽救；败则前途不堪设想。我们必须激励全体官兵，全力以赴，只能打胜，不能打败。

三、红格尔图战役

（一）日伪军进犯绥东

日伪犯绥前，其兵力大部集结于商都一带。商都在察境西部，接近绥境陶林县属的红格尔图。红格尔图是日伪犯绥必经之地（东北有土城子村，西北为土木尔台），是绥远东北的门户，为战略上必争之军事要点。

十一月十二日，日本侵略者命令民族败类匪首王英为前敌总指挥，率领石玉山、杨守诚两个骑兵旅及金甲三一个步兵旅和炮兵两个连等日伪军，向我红格尔图进犯。日寇指挥官和匪首王英的司令部设在土城子村。十一月十一日上下午日寇飞机数架在红格尔图我军阵地上空反复侦察。十二日日机三架轰炸我红格尔图守军阵地，并有日伪军一部正向我红格尔图方向行进中。

（二）军民同心协力打退来犯之敌

在日伪进犯我红格尔图之前，傅作义将军早已料到日伪势将向我绥境进犯，为加强保卫绥东兴和县和陶林县一带地区，除密令驻防集宁地区的二一八旅董其武旅长严加注视这些地区外，并着该旅四三六团团附孟文仲任兴和县县长，派兵一营归其指挥，又派该旅四三六团第三营营长赵帛铭任陶林县县长，负责该县防务。当时防守红格尔图我军，仅有董旅赵营一个步兵连，骑旅第二团两个骑兵连，另有当地自卫队长张存德所率之民兵百余名，由团附张著负责指挥防守。十三日夜，日伪先头部队同我守军发生前哨战斗，被我军击退。十四日上午八时，日伪军千余名，在日飞机大炮掩护下，向我军猛烈进攻。我守军奋勇抵抗，战至下午五时，被我军击退。十五日晨六时，日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亲自指挥李守信的伪骑兵第二师严宝山部，匪首王英的石玉山、杨守诚两个骑兵旅，金甲三步兵旅，兵力五千人，在日寇野炮、装甲车和飞机掩护下，向我红格尔图守军阵地更番轰炸，猛烈进攻，先后冲锋达七次之多，战至午后六时，终被我军击退。是日我守军英勇抗击，蒙汉军民戮力同心，战斗情绪极为高涨。父老兄弟亲密协作，帮助守军修筑工事，埋设地雷，抬伤兵，运子弹，送水送饭，激励守军士气。十五日晚，我骑兵第二团团团长张培勋亲率骑兵两连，星夜驰往增援，守军士气更为昂扬。十六、十七、十八连续三天，敌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我守军阵地猛攻，均未得逞。我军坚守阵地，官兵誓与阵地共存亡，个个英勇

奋发，不时跳出战壕，同敌拼杀。敌军死伤甚夥，狼狈逃窜。

（三）董旅抄袭敌巢敌军溃败

当战斗激烈时，傅作义将军亲往集宁前线指挥，向彭毓斌、董其武面授机宜。董即亲率部队出敌不意抄袭敌巢。为保守秘密，不使日寇察知，傅快速运兵，密令汽车队开赴卓资山、集宁两地集结待命；并密令驻卓资山的李作栋团，第二一一旅孙兰峰部驻旗下营的王雷震团，第六十八师李服膺部的周团，炮兵第二十五团的杨茂材营，分别由卓资山、集宁两地，星夜乘汽车秘密开往前线，并限于十一月十七日夜间十二时前，到达红格尔图西之丹岱沟一带集结待命。当夜十二时，董其武在十二苏木（红格尔图南）召开部队长秘密会议，下达攻击作战命令，要旨如下：令王雷震、李作栋两步兵团，各配属炮兵一连，于十八日凌晨二时，分别向红格尔图东北之打拉村、土城子（王英和田中隆吉巢穴）、七股地、二台子一带之日伪军进行包围袭击，一举而歼之；令骑兵周团秘密迂迴于打拉村、土城子以东地区，截击溃退和增援之敌，并担任追击任务；其余为预备队随指挥部前进。命令下达后，于当夜二时开始向敌袭击。这时敌方见连日攻击不下，也增加援军至六千余人，企图继续向我猛攻，夺取该地。此时我方增援部队赶到，向敌巢穴打拉村、土城子等地包围袭击，敌以事出不意，仓猝应战，激战至拂晓，敌不支狼狈向西北方向溃退。当我军向敌巢猛烈袭击时，土城子有汽车七辆，拼死仓皇东遁，日寇指挥官田中隆吉及匪首王英均在其中。

当我军勇猛冲击打拉村、土城子等敌巢穴时，我红格尔图守军也乘势出击，给日伪沉重打击。次日天明，敌机数架对我滥施轰

炸、扫射，我军利用白布在雪地上伪装，未遭损失。十八日上午七时，敌全线崩溃，我步骑兵追击至察境的统领地始行停止。

红格尔图战役自十一月十三日开始至十八日结束，共激战七昼夜。剿灭了日寇田中隆吉及王英指挥部，获敌汽车数辆，大车十余辆，二套军用马车一辆（即匪首王英犯绥时所乘之马车，我大捷后召开庆祝大会，江精卫、阎锡山来绥检阅部队时即乘此马车），其它军用辎重及各项重要文件甚多。是役毙伤日伪军数百名，俘虏敌步兵三百余名，缴获敌无线电台一部，台长、雇员各一名（均为日本人）及其随身携带的身份证明书、委任令、军人手牒等，其中最重要者为日关东军发给王英的电台联络表和电报密码本，为尔后我军侦知敌情起了很大作用。我方官兵及民众也有相当伤亡。此次战役中，正黄旗总管兼绥东四旗剿匪司令达密凌苏龙，亲率蒙族群众大力协助，并担任响导，对战役胜利出力不小。

红格尔图战役胜利结束后，傅作义将军为加强该地一带的防务及防止日伪尔后向百灵庙大批增援，特令董其武派李钟颐步兵团接替红格尔图及其附近地区防务，另派骑兵两连驻防土木尔台，以备必要时调用。余均返原防地，待命行动。

（四）敌加紧备战以图再犯

日本侵略者在红格尔图战役遭到失败后，田中隆吉和德穆楚克栋鲁普大为恐慌，深恐我军乘胜攻其老巢，遂急忙增强商都和化德防务。田中隆吉召集李守信、王英及日寇在伪军中的指导官十数人，在商都开紧急会议。会上王英大骂他的部下不争气，并将其团长赵大中枪毙。会议决定将王英的匪伪军重新加以整顿，将

作战不力的中下级军官均行撤换。一面令胡玉山、李振铭两部暂时担任商都防守任务，加强防御工事；一面令王英部的副司令雷中田率金宪章、石玉山、葛子厚，赵奎阁等部开往大庙一带集结，以加强百灵庙方面之防线；并令王英部的副司令张万庆率安华亭、王子修等部开往尚义、南壕堽一带积极备战，以图再犯。

（五）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军

红格尔图一战，把日本帝国主义者亲自指挥训练的匪伪军打得丢盔弃甲，一败涂地。匪首王英的伪军官兵本来是一群乌合之众，作战之前，尽管日本帝国主义和王英曾许以事成之后委以高官、给予厚禄，但红格尔图一役惨败之后，一些匪伪头目感到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不但升官发财事属渺茫，而且个人性命也时有所虑。再加日本指导官对他们蛮横无理，欺凌鄙视，早已愤不可忍。因而军心动摇，很想弃暗投明。其中不少人暗中设法与我军秘密联系，表示遇机即行反正。我军便进一步派员与之暗中接洽，晓以大义，欢迎反正来归，并发表告伪军官兵书，公布伪军投诚的赏格：军师长率全部携械投诚者，赏五万元；旅长率全旅携械投诚者，赏三万元；团长率全团携械投诚者，赏一万元；驾飞机一架投诚者，赏两万元；驾战车一辆投诚者，赏三千元……等。并设法将大批宣传品散发到匪伪军队中，从政治上瓦解匪伪部队。

另外，还向匪伪军大量印发悬赏匪首王英的布告和传单，并通令我全体官兵，生擒王英者奖三万元，击毙王英者奖万元。

自此之后，匪伪部队更加动摇，大批官佐、士兵脱离匪部纷纷来降，日寇及王英等为之惶恐不安，以致日伪之间，王匪内部之间，互相猜疑，互相防范。

日本帝国主义和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自红格尔图战役失败后，虽感形势不利，惊慌失措，但犯绥之心不死。一面加强商都、化德等地防务，一面从各地调遣部队，妄图再犯。同时令匪首王英所部在伪蒙古军的配合下，准备犯我绥北武川、固阳，进而袭取绥西河套；还令其副司令张万庆指挥安华亭、王子修等部，于十一月二十日向我兴和县进犯，被我兴和县长孟文仲率驻该县之部队和地方团队击退。十一月二十一日，日方飞机三架，飞我红格尔图上空投弹、扫射，被我军用步枪集中射击，击中其中一架的油箱，在飞逃到商都附近时焚毁，驾驶员日人被烧死。

红格尔图战役，不仅给敌以沉痛打击，使之不敢轻易来犯，而且为我军尔后作战打下胜利基础。因而红格尔图战役的胜利，实是百灵庙战役的先声。

四、百灵庙战役

（一）百灵庙战役前的敌我态势

百灵庙是绥远省乌兰察布草原上的一座有名的召庙，在绥远省会归绥城（现呼和浩特市）的西北约三百四十余华里处，地形险要，建筑宏伟，是绥远北部宗教、交通要地和德穆楚克栋鲁普蒙伪组织的巢穴。四周有山环绕，两旁各有小河一条（一为女儿河，一为百灵河）。山有九口，南通归绥、包头，东连察哈尔，西达宁夏，西北沿草地可抵新疆，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百里之内，尽是起伏不平的草原地带，人烟稀少，无水可吃，唯独庙内有水，因而是一个商旅交通汇集之地。庙内经常有喇嘛五、六百人，庙东是商业中心。自从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投靠日本帝

国主义，百灵庙即成为日寇侵华犯绥的根据地。

日伪自红格尔图战役失败后，深恐我军捣毁其这一巢穴，除派王英部金宪章、石玉山等伪军进驻大庙（百灵庙东约二百余华里），增强百灵庙外围之防御力量外，并令伪蒙军第七师穆克登宝部沿百灵庙山顶、山腰、山脚构筑坚强防御工事，积极备战。日本侵略者为了提高伪军战斗情绪，特派日关东军负责人××××（名字失记），来嘉卜寺（化德）召集日寇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匪首王英等开重要军事会议。会上除给匪伪等打气外，并决定再增派日本军官二百余人，补充各匪伪军中伤亡的日寇指挥人员。另外，还拟抽调伪满及日军三个师的兵力，由赤峰开往多伦、商都、百灵庙等地，配合各地匪伪军分头进犯绥东、绥北各地。

在十七日，傅作义将军即部署收复百灵庙之事。为不使日寇特务机关侦知我军行动，傅作义将军用以迷惑代秘密的手段，令驻小教场的孙兰峰旅，每天早上出发到归绥以东三十余华里的白塔一带，进行野外演习，天黑后返回驻地。一连演习数日，使日寇特务机关认为部队每天出动，是进行野外演习，不生猜疑。

为达出奇制胜，使敌迅雷不及掩耳，除由爱国商贩随时将日伪军的一些情况供给我军外，我方还派出情报参谋化装成商贩亲至百灵庙，将该地的地形及敌之工事构筑、兵力配备以及我军的行军路线、集结地点、攻击准备位置、攻击方向、目标和其它有关作战事项，作了详细侦察。给我军在行动与作战方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十一月二十二日，我方侦知日伪将于二十三日由察北用汽车百余辆运送大批武器、弹药至百灵庙，二十四日午后将陆续运送伪军五千余人到百灵庙，企图在日军官直接指挥下，由百灵庙向

绥北各地进犯。

傅作义将军得知这些情况后，即在总部召开营级以上秘密军事会议。傅在会上说：根据最近日寇和伪军的调动情况，日伪似有在近日由百灵庙向我绥北进犯之企图。我军应在敌未犯之前，以机智快速、先发制人之行动，出敌不意，奇袭敌巢，先将百灵庙收复，以歼击敌人，毁其巢穴，保卫我边防国土。要出奇制胜，就要抢在敌人前面。而在三百多华里的进军中，如何保守秘密，不使敌人发觉，怎样在零下四十二度的寒冷天气，不使士兵冻伤；一尺多深的积雪道路，如何快速行进，这就必须发挥官兵的智慧和才能，巧妙的伪装，严密的封锁，坚强的毅力，才能取得胜利。经过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即口授命令如下：（1）任命孙长胜、孙兰峰为前敌总、副指挥，指挥所部骑兵第二师三个团，第二一一旅两个步兵团，第七十师刘效曾步兵团，附山炮兵一营，苏鲁通小炮一队汽车和装甲车各一队。以出奇制胜快速果敢之行动，收复百灵庙。（2）各部队先秘密集结于百灵庙东南百七十华里附近的二份子、公胡同一带，尔后听从前敌总指挥部之命令行动。（3）部队情况及时报告。会议结束后，各部队长分返防地，秘密向指定地点集结待命。

十一月二十二日，各部队到达指定地点，集结完毕。孙长胜、孙兰峰即召集连长以上军官，将敌方兵力配备、工事构筑等情况简要说明后，即下达命令如下：（1）第二一一旅（欠四二二团）、骑兵第三团附山炮一营、苏鲁通小炮一队、汽车队和装甲车队为主攻部队。四一九团张成义部为左梯队，从百灵庙之南面攻击，直取该庙；四二一团刘景新部（欠第一营）为右梯队，从百灵庙东面攻击，并抽派一部先期至该庙东北通滂江之大道上，选择有利地形，伏击敌人，断敌归路。（2）刘效曾步兵团为佯攻部队，由百灵庙以

西地区,先行向敌袭击,将敌之注意力吸引到该团方面,使主力部队攻击容易,并与左梯队确取联系。(3)骑兵第一、二团绕出于百灵庙北地区,与步兵右梯队协同由庙之北面攻击,占领北山,控制飞机场,并追击败退之敌。(4)步兵第四二一团第一营(韩天春营)、山炮营、苏鲁通小炮队、装甲车队为预备队,位置于百灵庙南山东南大道以左高地附近。其它小部队随指挥部在百灵庙南山东南大道以左小高地附近。(5)各部队均须在二十三日夜十二时,到达攻击准备位置,向敌开始攻击,并互相取得联系,战斗进展情况,及时报告本部。命令下达后,孙兰峰鼓励大家说:战斗即将开始,这次袭击百灵庙是我军主动采取攻势,胜败关系极大。希望大家作战要同心协力,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战斗任务。既要奋勇作战,又不要疏忽大意。并将此次袭击百灵庙的重要意义,告知每个官兵,激起他们的爱国仇敌情绪,使每个人都能奋勇向前,主动杀敌,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不惜个人一切牺牲,同敌战斗到底。

(二) 我军收复百灵庙

十一月二十三日由黄昏到深夜,在从二分子、公胡同一带直到百灵庙的条条大路上,全体官兵个个斗志昂扬,情绪高涨,虽然气温在零下四十二度,积雪尺余,行进非常吃力,而各部队均于当夜十二时到达攻击准备位置,向各攻击方向及地点开始攻击。由于我军行动极为秘密,日寇及匪伪军事前毫无察知。百灵庙及其周围山上、山下虽有坚固工事,但无日伪军防守。当我各路部队进入敌前沿阵地时,日寇及匪伪军仍未发觉,及至我军将敌警戒哨兵捕获,听见我军枪声大震时,始从梦中惊醒,起而仓皇迎

战。匪伪军在日寇指挥官的胁迫下，胡乱进入阵地进行抵抗。

半小时后，总指挥部得知我军在各个方面均已打响，刘效曾团战斗非常激烈，已将敌之注意力吸引到该团方面，遂命令张成义团即向敌发起总攻。张成义团长领率全团官兵向敌猛烈攻击。正当我军向敌后纵深突击时，日特务机关长胜岛角芳拔出战刀亲自指挥督战，集中全部火力，拼死阻止我军突击，并向女儿山阵地增加轻重机枪十余挺，以炽盛火力阻止我军前进。激战达三、四小时，敌凭工事火力顽强抵抗，我军进展较慢。这时，离天明只有两小时的时间，如在拂晓前不能结束战斗，天明后敌人援军赶到，再加飞机轰炸、扫射，百灵庙将难以收复。总指挥部感到情况紧急，遂决定全力以赴，坚决在拂晓前全歼敌寇，以收复百灵庙。即令山炮营推进至百灵庙南山大道以东高地附近，占领阵地，拂晓前集中猛烈炮火，向女儿山之敌行摧毁射击，掩护我装甲车队及步兵攻击前进。而后延伸射程向庙内固守之敌猛烈射击，支援我步兵向庙内攻击。苏鲁通小炮队即推进至距女儿山八百公尺洼地附近占领阵地，拂晓前集中火力对女儿山敌阵地轻重机枪掩体行毁灭射击，支援张团攻击。而后推进至女儿山附近地区，向庙内之敌射击。令韩天春营长指挥装甲车队，并着该营第三连（张振基连）乘汽车六辆，协同装甲车队由百灵庙东南山口汽车公路，向敌猛烈冲击。

我袭击部队在炮兵、装甲车的协同支援下，向敌发起拂晓总攻。山炮十二门同时发射，向敌实行歼灭性射击，掩护装甲车及步兵攻击。苏鲁通小炮八门，用破甲弹向女儿山轻重机枪掩体及射击孔直接瞄准，实行摧毁射击，支援步兵攻击。短时间内，敌阵地即为我猛烈炮火摧毁。唯我装甲车及步兵在炮火掩护下由东南山公路向敌冲击时，第一辆装甲车的驾驶兵中弹身亡，第二辆

装甲车又被敌用手榴弹炸毁，驾驶兵张仰贤左臂受伤，阻塞了装甲车队前进的道路。但张仰贤奋不顾身，冒着敌人的交织火力登上第一辆装甲车，将阵亡的驾驶兵由车内移出，驾装甲车向敌阵地猛冲进去，继而我汽车六辆满载步兵也由最大的土山口冲入，敌遂不支纷向庙内败退，我军跟踪冲入庙内。这时刘效曾团、左右两梯队也均在我强烈的炮火支援下，向庙内之敌实行包围聚歼。张成义团长又选拔奋勇队杨天柱连突破庙前缺口，将前院后院割为数段。同时我骑兵也攻占北山，控制了敌之飞机场，将敌军后路切断。敌惊慌失措，无点可守。恰于此时，伪蒙军一批官兵二十余人在战场起义，调转枪口向日本指导官射击。胜岛角芳和伪蒙军师长穆克登宝，见我军已攻入庙内，援军又一时上不来，再行顽抗下去，势必为我军俘虏。乃急乘汽车数辆，由日本指导官等用机枪射击掩护，朝东北方向夺路冲出，狼狈逃窜。

正当我军向敌四面围攻，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总指挥部接到骑兵报告，从庙中冲出汽车数辆，直奔东北方向。这可能是日寇胜岛角芳等逃走了。遂令四二一团第三营第七连（鲁乐山连）急乘汽车五辆，带小炮两门，向逃敌跟踪追击。但因道路地形不熟，汽车速度又快，前车不慎陷入山涧沟渠，摔伤士兵十多人，后边的四辆车被阻隔不前，故未能追上逃敌，致敌逃奔而去。匪伪军因指挥官逃遁，随即全线崩溃，纷纷向我军投降。激战至二十四日上午八时，我军全歼日伪军，收复了百灵庙。

孙长胜和孙兰峰进入庙内，一面令部队清扫战场，一面向傅作义将军报捷。接着派四二一团刘最新部景彦清营附山炮兵一连，重机枪一连，驻庙防守，其余部队为避免敌机轰炸，均撤至二分子、公胡同原集结地附近休整。部队部署完毕时，已是二十四日上午。

这时日寇飞机三架飞百灵庙上空，盘旋投弹、扫射，因我军事先撤出庙外，并对庙内防空预作适当布置，故军民无伤亡。是役共毙敌三百余人，内有日人尸体二十余具，伤敌六百余人，俘敌四百余人；缴获步兵炮三门，迫击炮六门，步枪六百余支，无线电机三台，汽油五百余桶，弹药一大库房，白面两万余袋，以及其它军用辎重器材及日伪重要文件、军用地图及战马等。我军伤亡三百余人。对此役的俘虏，经电请傅作义主席同意每人发给白面一袋，银洋五元，释放回去。

（三）日伪军反攻百灵庙被击溃

自百灵庙为我军收复后，日本侵略者死不甘心，除连日用飞机向我绥东集宁及绥北百灵庙一带滥肆轰炸、扫射及侦察外，并积极准备反攻百灵庙。十二月二日晚，日寇胜岛角芳和王英的副司令雷中田率领日伪军四千余名，乘汽车百余辆由锡拉木伦庙（即大庙）向百灵庙急进，拟于十二月三日拂晓向我百灵庙反攻。

当时我军防守百灵庙的景彦清营长得知上述情况后，感到兵力薄弱，急电傅作义主席和孙兰峰旅长，力陈百灵庙不可久守，建议将庙焚毁，把部队撤回原防。傅接电后极为震怒，除对景彦清严加申斥外，并令孙兰峰即率所部前往坚守。孙兰峰到庙后将部队依地形及工事配备完毕，亲到各部队阵地视察，并告以务要速派战斗小组，加强警戒，防敌夜袭。时天将午夜，朔风劲吹，继而乌云密布，大雪纷飞，顿时山河尽着银装。孙兰峰认为这正是敌人偷袭的好机会。遂不时用电话与前方警戒部队联系。突接报告说：警戒哨兵在距庙二千多公尺的西山坡附近发现似乎是一

大群羊向东蠕动。孙听后感到：羊在夏天吃露水草，此时大雪盖地寸草不见，地冻天寒，天尚未明，哪能放牧？肯定是敌人伪装。马上命令各部队进入阵地，备准战斗。这时前方又来电话说：伪装之敌与我哨兵发生接触。孙即命令警戒部队阻止敌人前进，同时又令韩天春营的奋勇队张振基连，将皮衣翻穿，也扮成羊群，绕到敌后，占领西山东南以左高地，居高临下，予敌以前后夹击。并令山炮营集中炮火射击伪装羊群之敌，掩护张连进击。这时庙东南及西北之敌，也以炽盛火力，向我军阵地发起攻击，三方面均发生战斗。由敌之攻击情况判定敌之主力仍在正西方向，孙兰峰即令各部队分头迎击当面之敌，并令韩天春营长即率该营强袭敌之侧后，给以致命打击。从黎明至上午九时，激战达三个多小时。匪伪军虽有日寇各级指挥官亲自指挥，严厉督战，并把来时所乘汽车放回，自断后路，妄图背水一战，攻取百灵庙，但由于下级官兵士气低落，不肯卖命，因而战斗遂越打越消沉。我军乘机全线出击，敌不支纷纷溃退逃窜，以失败而告终。是役打死打伤日伪军五百余名，俘敌二百余人，并将伪副司令雷中田击毙。战斗结束后，孙兰峰防敌再来，遂一面向傅作义将军告捷，一面令各部队加强防务，严加戒备。对被俘的匪伪军，仍按上次的办法，每人发白面一袋、现洋五元，释放回去。

五、举国欢腾庆胜利

（一）全国各地纷电慰问抗战军民

傅作义将军接到捷报后，除电复孙长胜和孙兰峰加强戒备，

防敌再犯；并分电蒋介石、阎锡山报捷。此时傅认为日本侵略者和德穆楚克栋鲁普如果知难而退，就另作别论，如若恼羞成怒，可能还会发生重大战争，对此必须有充分的精神准备。

收复百灵庙的消息于十一月二十四日传出后，各地报纸纷纷刊发号外。全国军民无不扬眉吐气、欢欣鼓舞。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发来了慰问电。中共中央在贺电中说：傅作义将军发起的绥远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国民党中央一些要员也都来电祝贺、慰问。

各地人民发起了援绥抗日运动。国内外向傅作义将军和前方抗日将士祝贺与慰问的电信，如雪片飞来。上海、天津、北平、西安、武汉以及全国各大城市的人民团体代表，携带大量慰问品和捐款，纷纷来绥慰问，其中包括黄炎培、朱自清、曾昭伦等知名人士和著名学者。全国各地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还组织团体来绥做战地服务工作。太原女子师范组织的看护队二十余人，身穿士兵皮大衣，吃着士兵饭食，为伤兵服务；上海市文艺界著名人士如电影表演艺术家陈波儿，来绥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给了官兵极大鼓舞；著名音乐家吕骥写了一首《三十五军军歌》，亲自到部队教唱，并向军民教唱《义勇军进行曲》；著名作家谢冰心为一些战斗模范写过小传；山西太原西北电影制片厂导演石寄圃，特来绥远拍摄百灵庙抗战记录影片。此片在南京上映时，当傅作义将军骑马的镜头出现在银幕上，观众自动起立热烈鼓掌。

最令人感动的，是北平人力车夫王德志，将其在风雪严寒中两日辛苦所得车资一元八角，全部捐送慰问绥远抗日将士。还有浙江慈溪县南乡居民严陈氏，其夫在东北从事矿业，日寇侵占东北后，被日军惨杀。严陈氏闻绥远抗战胜利，痛心往事，仇恨日

寇，便倾其家产十二万元，捐助绥远抗战，以雪亡夫之恨，一时传为佳话。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派来包括南汉宸同志在内的慰问代表团，携带锦旗一面和给前方将士的慰问信，更加激励了前方将士。全国各地以及国外华侨和留学生捐赠款物甚多，据估计收到的现款和慰劳品合计约在五百万元以上。仅津、沪两地《大公报》代收的捐款，到一九三六年底即达二十三万元之多。收到的捐款和物资，据当时主管慰劳品的负责人之一的赵淑普同志回忆：“当时收到的慰劳品都存放在原省政府（现内蒙高级法院）对门的大四合院内。一般物品放在院内，堆积如山；珍贵物品放在屋内，其中有华侨和国内各地许多新婚夫妇收的礼品如银盾、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宝石戒指、珠宝、珍贵皮大衣，以及其它贵重物品等。”这些捐款及慰问品除提出一部分专门抚恤抗战阵亡将士家属及分发各地参战部队官兵、负伤官兵，另外还购买了二百多辆载重汽车，分发各部队使用，以备尔后作战之需。下余之款，除购置了一些必要的军用物品外，所余用于干部福利及干部子女教育等方面。

（二）傅作义将军发表

谈话鸣谢各方支援

绥远抗战胜利后，各方慰问函电中对将士军民热情称颂，尤其对傅作义将军倍加赞誉。为此傅曾几次发表谈话，略云：作义向来主张不惹事，不怕事，生平不说硬话，也不做软事。近来国人对作义同情援助，个人愧不敢当。我身为边疆大吏，守土乃我之天职；而躬冒炮火，侧身锋刃，则前线士卒较之作义尤为苦劳。概

自国家多事以来，各地袍泽情愫隐忧，爱国之情，谋国之忠，均十倍于作义。抗敌乃军人天职，忝首虚名，益增惭愧。全国慰劳之情，真挚热烈，尤其是学生青年不吃饭，不升火，并有愿至前线为国牺牲者，更为可爱可敬。由此肯定国家必能复兴，民族必能自救，其理由不仅是军人敢于牺牲，敢于打仗，而是全国人心不死。换言之，我人民虽可屠杀，而救国心理则任何人不能改变，凭此一片诚心，就能战胜一切侵略者。

傅作义将军还在报端发表鸣谢启事，略云：此次绥远抗战，迭蒙海内外爱国人士热情援助，既予物资补充，复荷精神鼓励，可钦可敬。但慰劳意义，非仅限于今日作战官兵，要在激励将来无穷斗志；非仅限于今日爱国热忱，要在唤醒将来全民奋起。目前大多数民众对爱国已有深切认识，确为国运一大转机。所谓目前抗战守土，窃恐不足以表明复兴。今之全国慰劳情绪，却表示整个民族精神，复兴之基即在于此。换言之，纵使前线战士肯流血牺牲，未必使谋我者即知斂迹。惟全国民众整个发挥团结精神与力量，始足使对方另作估价，知所顾忌。

六、伪军反正，我军收复大庙

（一）王英部旅长金宪章、石玉山反正

日伪军两次战役失败后，匪首王英部大部分官兵均感跟着王英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当汉奸，出卖国家民族，遭人唾骂；特别是我公布投诚赏格后，多数都想借机脱离伪组织。我军收复百灵庙后，金宪章、石玉山等见时机已到，遂于十二月八、九两日，先将

在该部的日寇指导官小滨大佐等三十余人全部处死，复将驻大庙的伪蒙骑兵第七师穆克登宝残部悉数解决，并将该部的枪械、弹药以及一切军用品全部缴获，率步骑兵全部开往指定地点集结，并于十日正式通电反正。

金宪章、石玉山两旅共步骑兵十个团，反正后，即开至绥北乌兰花一带整顿改编，傅作义将军按投诚赏格拨巨款犒赏反正官兵。日本帝国主义派飞机数架飞乌兰花附近向金、石两部驻地滥施轰炸、扫射，炸伤两部官兵五十余人。傅得报后即派汽车急往救护，于当日下午六时，将受伤官兵运回归绥医院医治，此举给金、石两部官兵以极大鼓舞。

（二）我军收复大庙

在日伪军反攻百灵庙为我击溃后，傅作义将军即决意收复大庙，彻底肃清大青山以北日伪残部，以绝后患。因而一面收容反正伪军，一面派孙长胜的骑兵第二师沿乌兰花及大庙附近，作肃清残匪准备。截至十二月九日夜，金宪章、石玉山两部全部反正，伪蒙第七师穆克登宝残部复被金、石两部缴械，匪焰一落千丈，濒临冰消火灭之时，傅即下令围攻大庙残余日伪部队。匪伪部队已是惊弓之鸟，稍一接触，即向草地败溃。我军除派骑兵一部跟踪追击外遂于十二月十日上午十时，收复了日伪进犯百灵庙的根据地大庙。首先开进大庙的是我军李思温步兵团。由于日伪军仓皇溃退，所有该庙中的辎重、弹药及一切军用品全部为我军缴获。

我军收复大庙，使日伪在绥北的根据地全遭毁灭。日本帝国主义在绥北一带多年苦心经营的根据地至此悉数被毁。收复大庙的胜利，不仅为军事上的胜利，也是政治攻势运用之成功。

(三) 王英部旅长安华亭、

王子修反正

安华亭、王子修原是王英匪部的两个旅长，在红格尔图战役之后，即派人密向我方接洽投诚。嗣后王子修又派其妻徐爱锦到张家口同我方联系。徐在返回南壕堑的当晚，适安华亭来访王子修。王当将其妻同我方联系的情况告知了安，安同意和王一起投诚，待机而动。

日寇在百灵庙惨败和金宪章、石玉山反正之后，正值西安发生“双十二事变”，日寇拟乘我国家多事之际，计划用日军一个师团配合伪蒙匪军再行进犯绥远。安、王二人认为时机已到，乃乘匪“大汉义军”副司令张万庆和日本指导官去嘉卜寺开紧急军事会议之际，于十二月十七日夜、十八日晨，率部通电反正，开至预定地点兴和县榆树乡一带集结待命。计两个旅共四个团，人数约二千五百余人，枪支二千二百支，子弹六十万发，以及其它军用粮秣器材等。

绥远抗战得助于蒙汉民众之力甚大。在红格尔图和百灵庙两战役中，当地蒙汉民众出于抗日爱国热忱，自动参加支前工作，供应给养；抬运伤兵，充当响导，保护电话线路，截击逃匪，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两次战役中，广大官兵以保家卫国，有我无敌之慨，英勇作战，奋身杀敌，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迹。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在归绥（今呼和浩特）举行了绥远抗日阵亡军民追悼大会，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和阎锡

山前来参加追悼。

“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反动政府对日寇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早已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绥远抗战，不仅是绥远人民的要求，也是全国人民一致的要求。这次抗战的胜利，使全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只有坚决抗战，才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只有坚决反抗侵略，才能制止侵略；正义的战争必将战胜非正义的战争。绥远抗战揭开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绥远抗战的胜利，一洗近百年来反动统治者对外战争史上几乎无不以屈辱失败而告终的污点，显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侮的伟大民族。对此，天津《大公报》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的社论中写道：

“绥远抗战之役，不仅取得中华民族史上光荣地位，且已作成中华民族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史迹昭垂，万世不磨。”

绥远抗战的胜利，是一次超出一般军事意义的胜利。它不仅说明对外作战必须善守，而且必须能攻；不光要靠军事，而且要与政治双管齐下，尤其是对待伪军上更是如此。

绥远抗战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压制广大民众要求抗日而形成的沉闷局面，激励了人民奋起抗日的斗志，对以后的全国抗战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靳书科整理）

回忆傅作义先生

王克俊

北平和平解放已三十年了，傅作义先生离开我们也五年了。傅作义先生在世时，我们每谈起北平和平解放时，彼此一句共同的话就是：我们这件事总算做对了，并且愈往后愈觉得做对了。傅作义先生病危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到医院看他，说：“毛主席叫我看你来了。”当时，傅作义先生神志已经模糊，周总理挨近他的耳边说：“你对人民立了最大的功。”傅作义先生神领地微笑点了点头。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傅作义先生的追悼会上，叶剑英副主席在悼词中对傅作义先生自长城抗战以至北平解放、抗美援朝，以及建国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作情况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努力，都作了高度的评价。追悼会上，在场的傅作义先生的亲属、同事、部下及多年的朋友，无不感激涕零。

傅作义先生字宜生，山西荣河（现属临县）人，生于一八九五年，正是甲午中日战争之第二年。从一八四〇年以来，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剥削。黑暗的旧中国，政治腐败，国敝民凋，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民族的深重灾难，在傅先生青年时期的思想中烙上了极深的印记。

现在我将傅先生的爱国思想和表现，尤其是北平和平解放及

以后情况忆述如下：

我和傅作义先生相处多年。我认为他是一个爱国者。傅作义先生为人忠厚、谨慎、稳健。他处事非常认真，乐于听取左右的意见，然后深思熟虑、审时度势，而决定一经作出，则坚决贯彻执行。所以他较能适应时代潮流和形势发展的要求，体察社会舆论和人民的需要，作出抉择。他又能在发现错误的时候勇于承担责任，而在胜利成功的时候却谦恭谨让而不自居功。在重大关键时刻，当牵涉到他个人以及与他关系很深的人的安危的时候，他也曾表现出犹豫、徘徊、顾虑的情绪，然而他终于能在各种复杂交错的矛盾中按照自己下定的决心，把握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向，顺应历史潮流而前进。

北平和平解放是中国人民革命进程中的一个伟大的事件。这个事件实现的经过也具体地表现了傅作义先生的这个特性，既有他的思想根源，又有其历史背景；既有时代的要求，又有现实的条件。所以，傅作义先生是在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政策的作用下，透过自己所经历的曲折艰辛走向人民的道路，看清了国家与民族希望之所在，终于摆脱了各种顾虑的缠绕，走上人民的道路，达到胜利的彼岸，使北平的和平解放得以实现。现在我拟分三个题目来叙述北平解放的渊源和复杂的具体经过：

一、傅作义先生爱国思想在各个时期的变化与升华；

二、关键时刻的决定，终于走上了人民的道路；

三、伟大领袖毛泽东和敬爱的周总理的一贯教诲、关切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作用。

一、傅作义先生爱国思想在各个时期的变化与升华

1、从忠于阎锡山到与阎锡山决裂

效忠阎锡山

傅作义先生是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毕业生，被分配到阎锡山部服役，开始当打井队队长（相当于排长）。阎锡山用人狭隘，偏信于五台、崞县的人，当时有道是：“会说五台崞县话，就能把洋刀挎。”傅作义是晋南人，但由于对阎表现尊敬、忠诚，能治军善守，几有战功，颇得阎信任，很快提升至师长。傅也引起蒋介石的注意。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件，蒋介石叛变了大革命。他梦想一统全国，便到处笼络人员。蒋初到天津，便约见傅和七十二师师长李生达（山西晋城人）。当时傅任天津警备司令兼第十军军长，蒋给傅、李各赠送了五万元。之后傅则把蒋的接待如实向阎报告，并把蒋的赠款如数上缴给阎。

长城抗战，险遭暗算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寇迅速占领了我东北三省，一九三二年又侵占了热河，一九三三年进而向长城各口进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民族的危亡，迫在眉睫。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在这个形势下，傅作义先生以朴素而强烈的爱国心和不愿当亡国奴的民族感，率部（三十五军）在长城对日寇进行了坚决的抗击。傅部驻守在怀柔一带，依山固守。战斗很激烈。有一天中，日寇连续五次冲锋，但均未得逞。最后，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一九三三年五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当时傅部虽然正奋战沙场，屡创日寇，但终于被勒令停战。在这种情势下，群情激愤，几经劝说，才把部队撤了下来。

为庆祝长城抗战的胜利，太原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会上傅报告了抗击日寇的具体经过，博得了全场的欢呼。人民要求抗日，但主张抗日必然会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仇恨、暗算。后来，阎锡山有一次举行了宴会招待傅作义，但阎并未出席。宴会上气氛热烈，大家频频举杯，傅周围不断有人向他敬酒。但是傅先生一生烟酒不沾，因此只是举杯示意，却滴酒未饮。宾主一再敬劝，这时傅邻座一位师长（杨效欧），为了圆场，把酒接过，代傅饮了。不料就因为这一杯酒，宴后三天，杨效欧便中毒身死。太原城内，一时盛传“杨代傅死”之说。傅只作不知，若无其事。

绥远抗战，初感毛主席的温暖

1936年8月，日寇策动德王、李守信、王英等民族败类侵犯绥远，进攻红格尔图 and 土木尔台等据点，这时傅任国民党政府绥远省主席，屡电蒋、阎，力主抗敌，收复失土。但当时蒋的态度是“攘外必先安内，”阎的态度是“不可轻启战端”。鉴于长城抗战的经验，傅作义先生不顾蒋、阎的不抵抗政策，提出“守土有责，

容不坐视”的口号，坚定地表示“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积极动员绥远军民抗敌。组织绥境蒙古政务委员会，团结蒙胞，粉碎了日寇的政治阴谋。并于同年十一月，奋起抵抗。集中全部兵力，先后由集宁、武川出击，击溃了进犯红格尔图之敌，收复了百灵庙、大庙子等战略要地，策动了伪蒙军及“大汗义军”金宪章、安华亭、石玉山和王子修等部起义，并杀死日本顾问及士兵数十人。

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对绥远抗战十分关怀。百灵庙战役胜利后，一九三七年一一二月间，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秘密派了南汉宸同志率代表团到绥慰劳并代表毛主席给傅作义先生赠送了胜利锦旗，接着又发动全国人民进行了援绥慰劳运动。各地的慰劳、捐献，持续了有半年之久。海外华侨的犒军捐款就达二百万元之数。傅用各地的捐款，购得卡车百余辆，装备了一个机动部队。傅先生对此内心非常感激，时刻不忘。但是在公开的谈话中，总还是把胜利的功劳归于蒋、阎的“领导”，以表现对上级的“忠诚”。

察战初捷，刘、李失机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向华北大举进犯。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傅作义先生衷心拥护、积极参加抗战。但是由于蒋介石坚持反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准备随时妥协投降，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因此虽有个别几个将领的坚决抗击，并不能改变国民党军队所担负的正面战场一溃千里，丧师失地的局面。千百万爱国将士，喋血沙场，满腔精忠，尽付东流！

当时晋绥国民党军队划为第二战区。阎锡山所属的部队组成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和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傅部的战斗序列为:傅直属的部队三十五军(实际上只有七十三师计两个旅)、汤恩伯十三军、李服膺六十八师、门炳岳骑七师、何柱国部骑二师和高桂滋部、刘汝明部(刘当时兼任察哈尔省主席),还有安华亭、王子修、石玉山等部。作战地区是平绥沿线和察省北部。

七月下旬,傅与在绥各部队主官商讨作战方针和部署,又亲到张家口与刘汝明协商。八月初汤恩伯部自绥东开赴怀来、南口,以制北平之敌。三十五军董其武二一八旅自集宁出发,奔袭商都。以骑二师配合安华亭部取尚义,王子修部取南壕堑,石玉山部取化德。刘汝明部自张家口进取张北。高桂滋部扼守自独石山口起以南的察热边境。骑七师置大同、丰镇、集宁及至卓资山以确保平绥线西段之畅通,并准备在刘部收复张北之后追击残敌。三十五军孙兰峰二一一旅的一个团随傅总部,二个团置于柴沟堡地区;六十八师置于大同、阳高、天镇地区同作预备队。采取以攻为守,在进攻中歼灭敌人,以巩固察省各据点的战略。傅总部设在一列火车上,在柴沟堡至沙城段上来回指挥战斗。

汤部在怀来以南、南口以西山区,首先与北犯之敌接触,战斗十分激烈,苦战十余日,敌未能前进。北平之敌屡次增援,均未得逞。董旅克商都,继而收复康保、宝昌、沽源,进展迅速,迫近多伦。尚义、南壕堑、化德等地也均告克复。这时如果刘汝明积极攻取张北,与骑兵配合歼灭该敌,挖除心腹之患,则可运筹全局,胜利在握。无奈刘汝明进展迟缓,拖延时日,南路汤部告急,傅亲到怀来与汤商讨增援事宜。但因敌又自热河分两路向察省增援,一路向多伦与董旅激战,董旅且战且退,复还绥境,

利用早已准备的工事，坚决抵抗，确保平绥线之安全；敌另一路向张北增援，使张北待歼之敌得救，两敌会合，反突破狼窝沟。在东条英机策划下，日寇同时在万全、孔家庄一带地区空降伞兵，与自张北突入之敌会合，切断平绥线，把傅部与刘、汤两部分割，陷傅总部与孙旅于孤立，南口守军亦腹背受敌。傅急命刘部自张家口向西，李服膺部自天镇、阳高向东进发，以配合歼击日寇伞兵。但是，刘汝明只口头承命，却按兵不动；李服膺亦行动迟缓，还假报军情，实际并没有和敌人接触。结果傅部孙旅首当其冲的一个团损失很大，谢兰思副团长阵亡。最后，傅命孙旅之袁团向孔家庄突袭，希能恢复平绥线路，终因兵力单薄，伤亡殊重，未能实现目的。至此，大好战况，反成危局。十三军因后方受到威胁，补给困难，自怀来沿太行山向山西方面自行撤走了。守张家口之刘汝明部与守独石口之高桂滋部亦各自撤走，脱离掌握。汤部转进后，南口之敌坂垣师团便伺隙沿怀来、蔚县、浑源、灵邱等县犯晋，以主力进犯平型关，另一部分犯茹越口，与阎锡山之第六集团军接触。傅不得已命孔家庄所部西移，傅总部撤至大同，令李服膺利用阳高、天镇间丘陵地带阻击敌人，以便尔后会合三十五军在大同以东与敌会战。李又未全力占领阵地，坚持抗击至规定时间，敌乘机突破，迅速逼近大同，致使大同会战，化为泡影。

回绥转晋？阎傅分歧

大同会战方案未能实现之后，傅理应转进绥远。绥远父老也迭电阎锡山，要求傅回绥主持军事。傅在绥省早已作了几年的抗日准备，在绥境筑有坚固的工事，在大青山一带，挖洞储备物

资，准备了武器、弹药和粮食，在全省的范围内进行了民众的发动，组训国民兵，适龄青年都进行了军事轮训。但阎以晋绥相衡，以山西方面军事为重作理由，命傅放弃大同，南撤雁门关。傅因不能回绥实现抗日计划，十分遗憾，愧对职责，在大同几次电请返绥，直到日寇迫至大同城下，还延搁十余小时，至深夜一点，在阎坚命下，只得率部（除安华亭部、石玉山部、骑七师及何柱国部留守绥东外）南下。孙旅驻怀仁、山阴，李师驻朔县，而傅总部设于广武镇。实际上阎另有图谋，在傅到广武后，阎即把傅调离所部，命至太和岭留在阎的指挥部内，名为参赞军机。当时周恩来副主席为中共代表正在此与阎谈判，傅因此有幸得以和周副主席会晤。

大同失陷后，敌在同蒲路沿朔县至阳方口之线向南进犯。傅总部转进至阳明堡。此时，董其武旅与王子修部已绕道凉城、右玉前来会合。雁北十三县相继沦陷，敌继而对阳方口和平型关分两路向晋北钳形进犯，主力在平型关。但第六集团军之独七旅却失守阳方口，使敌得以进占神池、宁武，逼近崞县、原平，同蒲路北段被敌占领。阎急令王靖国师在崞县、原平一带御敌。阎为使主力南移太原，急需修通从东山底到五台山台怀镇的临时公路，以接通到太原之公路。而平型关方面，郭宗汾与陈长捷两部在鹞子咀、六郎城与敌展开拉锯战，在此危急之际阎才又命傅率董、孙两旅接替杨爱源指挥平型关方面的战事。傅临危受命，得以回部，立即率部出发抗敌。阎得以解脱困险，安返太原。

在傅部即将开赴平型关之际，绥省平市官钱局（即省银行）经理王子才以避免资敌为由，派副经理陈善教押运装满资金的汽车，由绥远绕道运至阳明堡，向傅请示如何办理。傅严予斥责，并问明沿途敌情后，命其立即原车运回绥省，交由该局董事会保管，不

得资敌私用，以供绥远抗敌之需。陈走后，傅部即赴平型关。

傅接任的第一天，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敌后蔡家峪伏击敌人，重创该敌，斩获甚多，给郭、陈两部以有力的援助。郭、陈两部和董旅在平型关协同抗敌，又激战三天，予敌重创。詎料茹越口守军杨澄源师之梁旅防线被敌突破，梁旅长阵亡，铁角岭失陷，繁峙危急。傅遂以孙旅置繁峙附近一带以保公路安全，董旅掩护郭、陈两部向五台转进。

忻口战役，卫傅合力

平型关、茹越口、阳方口三敌会合，即图南犯，同时因山西兵力损失不小，阎请蒋派部队增援。蒋便命令卫立煌任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率第十四集团军以阻敌南下，挽回颓势。在此情形下，卫与傅利用忻口地形部署了忻口战役。主力是第十四集团军共四个师和一个独立旅，总预备队是傅部董、孙两旅、陈长捷部六十一军之七十二师及独二、独三两旅。王靖国部在崞县原平，本可掩护我忻口主力的集中，又可作反攻之据点，但王部拒敌坚持时日太短，我主力部队集中尚未完成部署，已被敌迫近侵占各个据点，使忻口阵线变成仅与敌对峙之态势。忻口战役虽未能如计划部署展开，地形又不险要，但由于参战各部同心戮力，不怕牺牲，敌终未能得逞。十月十三日，日寇以飞机、坦克配合开始疯狂向我阵地进攻，左翼之南怀化被敌突破，由此展开了对南怀化的激烈的争夺战。此时一面以方克猷旅加强左翼正西之1300高地，一面以董旅从右翼迂迴，强袭旧河北，威胁南怀化敌之背后，配合左翼郝梦龄部的正面反攻。是役毙敌五、六百人，缴获野炮多门。战斗正在持续发展，不幸郝梦龄军长、王家祺师长中炸弹阵亡，攻击计划受到影响，未

能收到全效。尔后敌又向左翼继续狂攻，灵山阵地与1300高地战斗十分激烈，孙旅两个团分别奋勇增援。至此，我全部预备部队均已投入战斗，但敌亦疲惫不堪，不得再肆猖獗，形成相持状态，苦战二十余日。激战中，卫、傅多次亲临前线。趁敌人炮火轰击之间隙，通过敌火网，到南怀化前沿阵地东侧之小山洞内了解情况，共同研究，决定作战方针，协同指挥作战。敌在我防线面前一筹莫展，遂改变战略，使用平汉线上之敌由正太路向山西进犯。不料黄绍竑指挥之各部与敌作战不力，未几日，天险娘子关竟然失守，寿阳相继陷落，日寇已窜犯至榆次，致使忻口苦战之功弃于一旦，傅、卫两部只得转进太原。

傅守太原，周恩来副主席赠

言恩义如山

为了部署太原守城，十一月二日，阎锡山在太原召开军事会议以决定守城部队和商讨守城的军事部署。守城之责，这时理应由熟悉太原形势的阎的直系部队——第六集团军承担，而且其他各部已苦战多时，均有待休整。但是，会议开了一整天，直到深夜，与会人员有的已躺在沙发上呼呼大睡了，而由谁守城的问题仍未决定下来。有些人却一个劲地推傅担任守城之责，或说：“我们有的是守城名将”；或说：“守城之责，非君莫属了”；阎则始终默不作声。面对这样的场面，傅作义先生十分激愤，拍案而起说：“好了，不要再讨论了。弃土莫如守土光荣！太原城，我守！”

阎立即表示同意。至于守城的部署，会上未作充分的讨论，

会议便结束了。

当时周恩来副主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会后，周恩来副主席与傅先生谈话时，对傅作义先生毅然率部守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表示十分钦佩，并语重心长地说：

“我愿代表中国共产党还有全民族诚恳地对你说一句话：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之深厚的伟大力量。请你保重！”深夜，傅回到总部，我向他呈阅电报时（我当时任傅部机要室主任），他即对我说：“决定由我们守城了！现在的形势就象是活人躺在棺材中，就差盖盖了。”稍停了一下，他又接着激昂地说：“困兽犹斗，我们为何不能与敌抗争？屈此国家危亡之秋，我们必须奋斗到底！”以此鼓励部属。傅先生还感动地告诉我说，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先生对我们深表赞许，并要我把周恩来同志当时的话立即记录下来。傅先生把这段讲话看成是恩义如山的赠言。

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傅还痛陈了几个月来，抗战失利的一些令人痛心的原因，列举战例，并控告了李服膺虚报军情，贻误战机的罪过。因此，在傅接受守城任务后，阎不得不宣布要审判李服膺，但又要求和傅一起共审。阎锡山无奈，只好对李服膺说：

“这事是你的过错。你的后事家属的抚恤安置由我负责，你就放心吧！”三日，阎在太原小校场铺了红地毯将李执行枪决。李服膺之死，阎爱莫能助，对傅悻悻不已。

经过忻口战役之后，卫、傅成为患难之交，关系甚密。卫立煌对傅很钦佩、同情，对太原局势甚为忧虑。阎处决李后，卫到傅寓与傅商谈甚久。他们正在深谈之际，我因敌情紧急入内见傅时，听到卫说：“我已把太原军事会议的情况，守城的部署和贵部历次参战的战绩，部队减员的情况以及阎长官处决李的经过均上报了。”

卫又征求傅对处理城内未及南运的武器弹药的意见，卫说“拨给一一吧？”用手比了个“八”字。傅点头表示同意，说：“用你的名义。”于是把这批弹药武器除留下守城所需外，以卫的名义拨给八路军。周恩来副主席发动群众，组织力量，迅速运出这批武器弹药。直至五日晚上，才转运完毕。这时敌人已接近太原城，各城门均已封闭，至晚十时许，傅接到电话，才知道周副主席还未出城，即派人开城门护送离去。

守城部队计有三十五军之两个旅和杨维垣旅、王子修部，城外配合部队为陈长捷六十一军、郭宗汾部和高桂滋部、冯钦哉部。城外部署如下：以高、冯两部扼守东山。东山至为重要，俯瞰全城，可以扼正太路，可以顾北郊。陈部驻守北郊，北郊有兵工厂，是重工业区。郭部驻守西北郊。城内部署如下：董旅置于大小北门及西半城，其一个团置于北门外之工厂区。孙旅置于小北门（不含）及大、小东门一带。杨维垣旅、王子修部位于新南门与大南门区域。为了统一指挥，成立了郊区指挥部和军民合作委员会。作战方针是依城交战。方法是沿城筑工事，挖壕防守，与城外相呼应。

六日凌晨，敌人开始进攻，首先狂攻东山。高、冯两部尚未全部进入阵地，与敌人一触即撤。敌人得了地利，俯瞰全城，更为得势。陈、郭两部与敌人激战一日后，至夜也先后撤退了，董旅置于城外的那个团也只得转进城内。结果，城外据点全部丧失，成为孤城一座。敌在六日对城内进行了一整天的狂轰滥炸，七日凌晨，以炮群集中轰击一点，轰塌了小北门的东北角城墙，孙旅以沙包急堵，抢筑工事，坚决抗击，坚持了数小时，终被敌突破。敌乘机扩展，占领了兵营和大、小校场；之后又利用校场空运部队入城。不久，敌人又夺得小东门以北城墙，营长李登瀛阵亡，孙旅转为巷战，逐房逐屋与敌人争夺。董旅在城西北据城墙与敌战斗。八日，敌与孙、

董两旅全面展开巷战。战斗延伸至精营、霸陵桥、粮服局及傅总部（原阎之绥靖公署）后门外之东缉虎营。至晚十时，城内近半已被敌人占领。一直威胁到傅的总部。战斗坚持到夜十二时，傅才下令分路突围。此时只有大南门尚未失陷，傅随总部人员从大南门出城。城外纵深十几里都有敌人的火堆，环城马路上来回开着敌人的坦克、装甲车，突围的人员零散地乘夜色穿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向西涉水过汾河，入山步行了七天到中阳集中。傅刚到中阳时，心情很沉重，想到太原城的失陷，自己军队的损失，以及阎之态度叵测，非常难过。在与蒋、阎、卫等方面取得联系后，傅向蒋、阎报告了情况。不久接到了蒋的慰勉电，并通知可以到隰县见阎。阎亦来电召傅至隰县会晤，这时傅的心情才稍为宽展。后来，卫告诉傅说，当蒋得知太原守城经过后即电阎对傅表示嘉许，并提出如阎对守城问题有意见要交“中央”处置。因此阎对傅未以失守太原加以追究。蒋的这次关照，在傅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阎傅会晤，整编傅军

翌日，傅与我和二个卫士即冒雪骑马出发，行程两日，到达隰县与阎会晤。阎同意整顿部队，补充装备，但要到临汾再具体商谈。次日阎便走了。我们随又赶到临汾。刚到临汾，蒋来电任命傅为二战区北路军司令，任卫立煌兼南路军司令。在临汾，傅与阎谈了二十余日，阎同意给三十五军如下的建制：由原董其武二一八旅扩编为一〇一师，辖三个团；七十三师仍补足，辖两个旅，计四个团；另新补给两个团（独立新十团和炮二十五团）。在部队的整编、补充问题取得具体结果后，蒋又来电，任命傅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

官，仍兼二战区北路军司令。

傅作义先生感于所经历战斗的教训，时刻忆念着在太原城内最重要的时刻，周恩来副主席给他的赠言，又联系到中国共产党当时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一定程度上领会到“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全民族革命战争的全面抗战之所必需”的意义。他决心仿效八路军重建部队。他到临汾时即令其驻西安办事处为部队招募一批爱国青年。后来，在西安和晋南各地招到了一批大、中学生。这批学生成为傅部的一股新鲜血液，其中有几十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自西安到晋西北参加部队途经延安时，还听到了毛主席的报告。傅与部内的几个人商议，要以这批学生为骨干，建立部队的政治工作系统，在部队中进行爱国政治教育，以适应抗日战争发展新形势的需要。

与阎谈完整编、补充计划后，傅离临汾，自公路经蒲县、隰县、石口，孝义到汾阳，准备把部队集中到柳林、石楼整编。傅到汾阳，即行整顿部队，并下令为部队赶制臂章。傅决心要使自己的部队有别于那些不抗日却使人民遭殃、纪律败坏的部队，要求三十五军官兵都戴上统一标志。当臂章发下，一夜间三十五军便都带上了红底黑字的臂章。因为这个标志，更由于傅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在部队内逐渐建立起倾向进步的政治工作，以致后来傅部被国民党反动派说成是“粉红色”的部队。

傅在汾阳约停留了一周。为了以后相机收复太原，傅急于了解太原城内的敌情。当时驻汾阳的独立旅旅长傅存怀向傅推荐了一个人叫郭秀峰（共产党员），说郭在太原城内关系很多，建议请郭帮助了解太原情况，并建立电台联系。傅欣然同意，给郭配备了一部电台，令我编好密码并派了一个报务员随郭潜入太原。郭进城后住在柳巷（原并州日报社附近），给傅发过多次情报。

一九三八年春节前，傅在柳林整训部队。这时由西安等地新招的一批学生三百余人亦已到达。傅亲自和他们讨论如何建立三十五军的政治工作，政治人员的责任和待遇。进行了十天左右的集训后，随即分派到各个部队中去。确定：军、师、旅设政治部和政治主任；团派政治主任，下设干事若干人；营派政治教导员，连派政治指导员。政治人员的待遇上下一律，每月二十元。政治人员只管部队中的政治工作，不参与签署军事命令。傅坚持军事命令只由军事主官下达，但事先可让政治人员了解。

重振军威，回师绥南

春节过后，傅部即自柳林出发，经方山穿越吕梁山到达古交，总部设在窑儿头，准备进取太原。而这时阎计划退居晋西南一隅，但日寇继续沿公路进犯，占汾阳并企图沿隰、蒲之线南下。阎大受威胁，来电命傅掩护。于是傅部南下攻文水、开栅，几次与敌激战，毙敌甚众，并截获敌一批辎重。日寇对傅部的出现十分紧张，经汾阳向西窜扰，占离石、大武。傅部迂迴反击，董其武一〇一师全歼大武之敌，孙旅攻离石，虽创该敌，但未克城。这时为了策应徐州会战，傅部回师向北挺进。傅部由大武出发，经三交到临县时，曾再次派小股部队向太原方面作试探，在古交叉与敌打了一仗。之后，傅部经兴县、保德、河曲、偏关，直指绥南之敌。先是七十三师孙兰峰旅为主力收复了清水河，接着克和林格尔，以后改用董其武师为主力一直攻到归绥南面二十里处之一间房、昭君坟一线。这时孙旅又在和林格尔西之前厂圪洞，全歼了日寇企图对我背扰之岩田搜索骑兵联队，缴获战马四百余匹，歼敌殆尽。傅部本拟穿过归绥，插到大青山区域开展抗战，但是由于所

派的一个团未能如计划在旗下营彻底破坏铁路，虽与敌激战两天一夜，未能阻止由北平增援之敌。董其武师受到北平与包头方面来援之敌的夹击受挫，郭团长受伤。于是改变原订部署，回师清水河。包绥之敌紧随于后，平鲁之敌又犯清水河县之大双墩企图抄我后路，孙旅、王子修部与驻绥的骑二师何柱国部配合，击溃该敌。董师与自后套驰援之骑七师在关河口合击自包头来犯之敌，亦击溃之。自归绥南犯之敌主力，甚为猖獗，直犯偏关。傅部为诱敌深入移至偏关南之楼沟堡，集中兵力在店子湾、吴城之线敌人必经之道伏击该敌，大捷，歼其一部，余敌溃退。傅总部经三岔口巡检司移驻河曲，此后傅属各部分驻在阳方口、神池、利民堡、老营、偏关之线，不断袭击敌人。

励军图强，努力抗战

傅先生仿效八路军，在他的基本部队内建立政治工作系统的措施，对于部队的思想、作风、纪律和士气的提高，战斗力的增强，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和军民关系的改善，起了很大作用。基本做到官兵一致，军民合作，团结抗战。在上述晋西北和绥南各次对敌作战中，部队素质为提高，证明了傅先生采取的这一进步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加以这时傅部是活动在这样一个区域：东面北面是敌人，而西面陕北，南面岢岚一带都是共产党八路军的根据地；阎锡山则是鞭长莫及，无法控制。因此这一措施的贯彻执行，更有利于傅作义先生及其所部人员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革命因素的影响。在傅部中，官兵的服装、伙食标准上下一律，大家同甘共苦，生活融洽。干部中学习的风气很浓，士气高昂。在部队中，能够看到来自解放区的革命书籍，进步的

墙报，抗日的歌声，十分活跃。这个时期，同共产党的关系十分密切、融洽，部队中共产党员团结无私、艰苦朴素、英勇作战的楷模作用，给部队以深刻的影响。一九三八年秋，中国共产党中央还派了南汉宸等几同志组成一个代表团到河曲，访问了三天，使傅部得到党的更密切的帮助。中国共产党还把傅部政治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向傅作义先生交了底，共有七十余人。傅先生也对共产党作了保证，欢迎这些同志在部队工作。傅先生当时说：

“这些同志同我是在同一战壕中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我完全保证他们的安全。”在晋西北这样一个贫瘠的环境里虽然部队的补给十分困难，生活艰苦，但对于傅作义先生和傅部的进步却是极为有利的。

图穷匕现，彻底决裂

和傅部的情况相反，阎锡山先是退至乡宁、吉县，以后又继续后撤，跑到陕西宜川。阎偏安晋西南一隅，虽然迫于形势，表面上也同意搞新军，但另一面却加强对日秘密往来，搞妥协投降，而在内部则更进一步加强封建法西斯的控制。阎建立了“铁血同盟会”，自任会长，用烘炉插誓等腐朽反动的封建法西斯方式控制内部。被他不满或被认为不受控制的人，便用贴黄表或“赐”一两大烟，一支手枪的方式加以迫害剪除。傅先生虽然一直对阎表示尊重、服从，在二战区可以说是有战必傅打，有城必傅守，这是傅先生出于爱国抗日之热忱，只要是战局的需要，无不欣然承命，从不避艰险，不顾所部的得失，不计个人恩怨。但是，对于阎搞的这一套腐朽东西是十分反对的。这时傅先生率部在晋西北和绥南坚持抗战，在部队中厉行进步的政治工作，不参

加阎的“铁血同盟会”，也反对阎派人到所部中成立“分会”的要求，日益使阎感到不满和感到鞭长莫及，无法控制。因此，傅和阎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日益尖锐起来，这个矛盾又和蒋对阎各部属进行分化瓦解政策交织在一起，更加速了矛盾的激化，最后导致了傅与阎的决裂。

一九三八年秋（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到河曲之后），国民党政府在陕西武功开了个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宣布要正式组织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并确定了傅部的补给路线（自西安经甘肃平凉、宁夏之线到绥西）和编制。会后，傅部高级人员会议曾对此进行过讨论，估计到傅终将为阎所不容，并研究过对策，分析了在河曲坚持抗日和到八战区赴任的两种前景。到八战区是“中央”的正式任命，军政统一，补给条件可以改善；但在河曲，友邻地区都是共产党八路军根据地，虽然条件艰苦，但未尝不是一条前景光明的出路。会上议论纷纷，未作定论。

果然，武功会议后不久，阎锡山便阴谋迫害傅作义先生。一九三九年一月初，傅先生在河曲收到阎的一个电报，电令他到“克难坡”开高级军政会议，要傅到神木上车赴会。实际上我们侦知阎策划的是开“讨傅大会”。面对这种严重情况，与阎锡山公开决裂是不可避免的了。我见电后很着急，立即把阎电并附上自己的一封意见书送交傅先生，详述了自己对情况的分析和留河曲或赴绥两种前景的估计。傅先生看信后立即找了我，笑道：“克俊，你把我当成昏王了。好吧。照你的办，由你负责，指定必要的人员，明早我们便出发。”次日清晨，傅先生一行八人骑马秘密从河曲出发，踏着冰过了黄河，向哈拉寨走去。这时，我明白他还是决计入绥到八战区赴任。我们穿过伊克昭盟行程八天，晚上到了五原。路上谈笑间我向傅先生问及一九三五年在太原“杨代傅死”的

事，傅先生却只淡然一笑，说：“我不知道。克俊，以后要你不听这些话。”抵五原后，随即电其留驻河曲的副军长、参谋长及董、孙等各部队长把部队（一〇一师，二一一旅，含原独新十团）、七十三师中原随傅的王雷震团、炮二十五团、王子修部）开拔入绥。七十三师余下部分仍给阎留下。

和阎锡山封建集团的彻底决裂是傅先生在抗日战争初期思想的第一个变化。

2、蒋对傅部的利用、分化、瓦解、以及 最后傅与蒋的决裂

（1）蒋、傅间分化瓦解与反分化、

反瓦解矛盾的发展

历史现实的教育，使傅作义先生认清了阎锡山的面目，并坚决与之决裂了。但是，由于当时他思想上把抗日胜利的希望寄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结果选择了到八战区赴任。

一九三九年春，傅到五原正式组建第八战区副长官部。这时傅的战斗序列确定为：除由河曲带来的各部外（三十五军之一〇一师、二一一旅〔后扩为新编三十一师〕，独立新十团〔后扩为新编三十二师〕和炮二十五团），还有宁夏马鸿宾部，门炳岳部（骑七师后扩编为骑六军），游击旅（游击司令马秉仁）、新四旅（石玉山部）、五旅（安华亭部）、新六旅（王子修部）（这三个旅实际兵力均各为一个团）以及马占山部和阴山敌后的鄂友三部，绥南的乔汉魁部（地方游击队），还有白海风骑兵旅。作战区域是原绥远省

全境。

抗日建国讨论会

傅部到了绥西之后，虽然在对日抗战方面取得胜利，在军队补给方面也有了改善，但在政治方面情况却大为复杂化了。反对蒋介石的中统、军统特务控制与瓦解部队的“政治斗争”也日益强化起来。此时，国民党绥远省临时政府自榆林迁回陕坝（现杭锦后旗）；国民党的省党部也加强了，派来了书记长，中统、军统人员不断增加。这里还有早在后套的阎锡山的屯垦军。他们走私贩毒，对当地残酷盘剥，无所不为，风气极坏。

傅先生在绥西，继续贯彻、发展在柳林、河曲时期建立的进步的政治工作，以此作为建军、治军的根本。

一九三九年六月至八月，傅先生在百川堡举办了三个月的“抗日建国讨论会”。“抗建会”旨在合力抗战建国，人人献计献策。傅先生也借此轮训干部。所有傅的基本部队的党政军干部都分期分批参加了讨论会，以达到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团结一致，共同抗战之目的。

抗建会一共举办了三期。成员以傅部队的官佐为主，行政方面也多数是跟傅的干部。第一期搞得很好，成员中有不少共产党党员，国民党省党部的人只是少数。共产党员在这期讨论会中起了骨干作用。傅先生很钦佩共产党军队的革命精神与作风，羡慕其作战勇敢，纪律良好，因此十分重视爱国思想教育部队，十分重视在部队内建立新型的民主的上下关系、官兵关系。提出废除打骂制度，实行说服教育，无论是官还是兵都有向他直接通信、反映情况和提出建议的权利和义务，而他保证必定复信，有所答

复。傅先生在会上发言时常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的部队，不分官兵，不分上下，都是为抗日建国服务的，都要为抗日建国而奋斗牺牲。为抗日建国服务，总得有一个头头。我既不是什么副司令长官，又不是什么钧座，就算个‘工头’吧！”因此，傅的部属在谈话中也常常称傅先生为“工头”，道说“工头”的长短。在傅部中没有旧军队中那套繁缛森严的礼节和称谓。除了简单的军礼外，上、下级之间相处很随便、亲切。讨论会上关于抗日建国的问题，人人畅所欲言，大会小会，饭前饭后常常展开激烈的辩论。辩论的情况是一边倒，抗日、民主的势力占压倒优势，国民党省党部的人一开口说话即遭到批驳。抗日的歌声（唱解放区的歌）、壁报、简报亦十分活跃。生活上自傅先生起，上下均穿一样的布军衣，大家围在一起吃大锅饭，官兵融洽一致，处处是民主，抗日的高昂气氛。这种场面同阎锡山部队的凋敝、萎靡的政治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抗建会”每天有“朝会”，每天早上出操完毕，必得有一个干部和一个战士登台讲话，分析战势、国情，提出抗日救国的办法。共产党员的干部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宣传抗日，令人口服心服；省党部派来的几个人穿着黑制服，讲话言之无物，遭到大家的冷遇。第一期讨论会的情况引起国民党中央的指责，先后派了国民党中央委员苗培成与傅接触，随即又派来张彝鼎、苏寿余等十余人来作政治部的正、副主任和干部。

第二期讨论会斗争就更激烈了。苗来后，即要求傅清除傅部内的共产党员，建立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政治部（傅部内一直不设国民党特别党部），并要求任张、苏为第八战区副长官部的政治部主任、副主任，连红色的三十五军臂章也不准再带了。这是在后套地区傅和蒋矛盾、分裂的开始。和苗谈判的结果，师旅以上政治部

主任由国民党中央政治部委派，团以下仍由原来的政工人员担任，政治部的秘书长周钧以及各科室亦仍为跟随傅的人。但是，傅的这一让步，使大部分共产党员表示不能再在傅部工作了，要求离开。在国民党中央的压力下，傅先生不得已只好送走了部内大部分共产党员。其中重要的、公开的共产党干部（如潘纪文等同志），傅先生均派车和派专人，护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团以下的共产党员则发给路费，提供交通工具，指定安全路线送回延安。这时，部内很多人才了解这些为人所钦敬、楷模的同志的身份，分手时莫不依依不舍。傅先生还费尽心在部内留下了一些共产党员（如杨子明等同志），直到北平和平解放。

第三期讨论会的主要教育内容和前两期相同，特点是着重军事训练。这期军事干部占多数。傅先生常说：“官不离兵兵有主，兵不离阵阵必胜”。严格要求干部在战斗中必须“身先士卒”，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在军事训练中尤其加强二百米内的防演习和五百米内用几种武器打坦克的训练，空室清野、撤离、反攻的训练等，使部队在作战技术上也有很大的提高，破除了对敌人的机械化、现代化武装的迷信。经过训练，干部、战士很有信心，说：“敌人的坦克不可怕，飞机更不可怕”，能以最简陋的步枪对付敌人现代化的坦克的进攻。这期讨论会结束时，成立了新编三十二师。

抗日建国讨论会确立了军、政、民一体的领导体制。实行全民总动员，团结一致，共同抗战。整编了地方部队，克服了阎锡山早在后套搞的屯垦军和一些地方军对当地人民的盘剥和危害，扭转了其遇敌就跑的恶劣风气，严肃了纪律。对国民党中央的骑兵军则加强联络，明确指挥系统。

在抗建会达到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傅在自己的部队内开始搞

了一些较好的工作制度和条例。如：军政干部条例，军政干部考核办法等，其对军政干部的要求是，艰苦朴素，热诚积极，工作负责，要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为整体而奋斗牺牲。由此发展并实施的制度、措施和办法，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这些是傅先生在河曲接受共产党民主抗日的进步主张的进一步发展。

频繁激烈的战争，紧张艰苦的生活，连年在荒漠地区纵横驰骋，傅先生的部队若没有这样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工作，是不能坚持抗战，持之以恒，立于不败之地的。抗建会后，旋即进行了持续数月的三次大战役。正如傅先生后来所说：“……所部官兵，连年转战，实极辛劳。塞上荒漠，冬尤苦寒，运输给养，皆为不易。而官兵全体……（均能）踊跃奋发，甘受一切穷困劳苦以与暴敌相周旋。战斗意志，愈久愈强；作战技术，愈穷愈进。士兵等在今日，已绝不畏敌人飞机、坦克等威胁，并可用各种方法，以摧毁敌人摩托化之工具。至于临难不苟之精神，勇于杀敌之意气，则殊多可歌可泣之事实。”（见傅作义先生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三日致蒋介石的公开辞勋电）这都是和傅先生百川堡抗建会政治、军事训练分不开的。傅先生的部属直到现在依然深深怀念这个时期的生活，特别是抗建会中民主、进步的政治气氛，民众的热情、奋勇精神，给他们的教益和滋补，使他们终于能认清历史潮流，与人民一道前进。

袭击包头和绥西大捷

傅部一到五原，立即引起日寇的注意，因而即加紧对后套进

犯。日寇进攻的路线大体分两路，北路自包头沿公路经大佘太从乌布浪口进犯，南路从包头南沿黄河南岸西进，攻击目标是马七渡口。敌人这样的钳形攻击不断加强。开始，马鸿宾部守乌布浪口，但日寇两次进攻则后撤至三盛公（即现巴彦淖尔盟磴口县）。傅部不断反击，经过约半年的拉锯战，南路傅部推进至距包头三十里的昆都仑召（现包钢所在地），敌人则龟缩在包头城内以及附近几个孤立据点内。

日寇不甘失败，一九三九年下半年，继续加强对后套的进犯，屡次沿上述南、北两路来攻，并疯狂轰炸五原，一次傅先生几乎遇难，随身的一名卫士牺牲了。敌机的滥炸，总部无法办公，因此转移至乌兰淖，但是，五原仍设临时指挥部。与敌相持、拉锯、推磨。南路始终巩固，北路虽有些损失，阵亡两将，（游击队队长赵伯铭和政工干部李冰泉。李系一〇一师三〇三团政治主任，高台梁战役壮烈牺牲），但敌亦未能取得进展。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日寇南犯长沙。为牵制日寇，蒋介石命令傅先生进攻大佘太。为了使策应发挥更大效力，有力地打击华北敌人的有生力量，解救南危。傅先生决定不打大佘太而全力奔袭包头。自此开始了持续数月艰苦悲壮的包头、绥西、五原三个大战役。战斗一开始，国民党中央派来的政治部主任等便都跑到石嘴山去了，与之成鲜明对照的是，傅部的干部与政工人员，在战斗中始终起着带头作用，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成为部队的中坚。

包头战役

此役的作战方针是：突然袭击，以少胜多，迅速解决战斗。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傅表面上佯作在五原过元旦，让本地剧团大

事准备元旦的庆祝演出；又先将大军集结于河套大门，大作防御工事，以迷惑敌人。然后，秘密神速地自五原南急转向东，全力奔袭包头之敌。部署如下：以孙兰峰新三十一师担任主攻，董其武一〇一师担任扫清昆都仑河至包头之间守敌并打援，袁庆荣新三十二师阻击固阳、大余太方面之敌。在各部队到达预定的攻击位置之后，突袭部队出敌不意，突然围歼城外守敌，随即向城内发起总攻。十二月二十一日凌晨，总攻开始。这时正值隆冬，气温零下摄氏 38° ，天寒地冻，枪栓冻得拉不开，战士十分着急。有人跑来问道：“怎么办？”傅先生急道“尿尿，尿了再打”。部队迅速攻入包头城内，一举尽歼守敌各要点。这时天色未明，傅先生正在城郊昆都仑河边的五分子村总部外高处察看军情。当前线捷电传来时，在傅总部从枪声中也能听出城内已转入巷战。傅先生当时十分激动，向着城内振臂高呼：“中（华民）国万岁！胜利万岁！”总部的人员也纷纷走出来，同声高呼。严寒的原野上，沸腾着热烈的胜利欢呼声。我军将士，以雷霆之势突然出现，使敌人惊惶失措，损失惨重。但是由于骑六军未完成在磴口与萨县之间破坏铁路线以阻止平津方面援敌之任务，我军在歼灭守敌有生力量之后便撤回五原。在战斗中傅亲临前沿指挥，有一次他离开总部到孙师督战距敌不过二百米，几乎被敌包围。在撤出包头时，有六个战士在城外一个娘娘庙为掩护部队阻击追敌，坚守到底，全部壮烈牺牲，后被誉为娘娘庙六英雄。此役来往行程八百里，历时月余，歼灭包头之敌两个团，击毁日坦克四辆，又阻击由固阳方面来援之敌毁敌汽车八辆，毙敌百余，其中两名骑兵联队长丧命。事后军委会下令奖励是役有功人员。

绥西战役

日寇企图报复，叫嚣要“膺惩傅作义”，妄图依仗其军事优

势一举扑灭傅部，一面狂轰滥炸，一面仍分由南、北两路扑过来。另外，还有狼山后的两个伪蒙师自千里庙口对我后方进行袭击。一九四〇年一月底，傅总部刚回到五原，敌人便开始了对五原的疯狂进犯。我部在乌布浪口和五加河折桂乡桥进行抗击，激战几天后，且战且撤。以后，傅总部转入黄河南沙漠区内的圣旦格尔庙。部队化整为零，坚壁清野，开展游击战，与敌推磨周旋。这时，环境虽然变得十分险峻艰苦，补给很困难，但是经过了一个月的不断战斗，实行了毛主席倡导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十六字方针，予敌重创。一个月內，击毁日寇卡车四十余辆，击溃了由千里庙口进犯的两个伪蒙师，肃清了后套西部之敌，收复临河，形成了自五加河以北的四意堂、五原以西的五分子桥、新公中、蛮可素、郝敬桥到黄河边的对峙线。傅先生很善于指挥运动战。早在河曲时期，傅先生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极为推崇，一有空暇，便研读毛主席的讲话、著作和共产党、八路军的文件，特别注意研读毛主席的军事著作。一个来月的绥西游击运动战，收获很大，消耗了敌人，保存了自己，扭转了战局。

正当傅部化整为零在沙窝中坚持抗敌，相机收复五原，彻底粉碎日寇对绥西进犯的时候，蒋介石发来一个电报，任命傅为第八战区代司令长官，要傅即到兰州赴任，部队在石嘴山收容。当时，部队内多数有资历的高级人员都主张部队后撤，傅去赴任，说这是蒋的关怀。但是，部分年轻干部认为这是蒋吞并异己的一种手段，“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之”，只有不离开自己的部队，坚持打击敌人，才能壮大自己，相机收复失地。后一意见正合傅先生的主张。傅先生谢绝了蒋的任命，坚持在绥西抗日。

收复五原之役

一九四〇年三月初，傅总部踏冰过河，到了黄河北面一个只有三、五人家的小村落亚马赖。傅在这里召开各部队的主官会议，为收复五原作准备。这次会议对包头战役和绥西战役的得失，部队的教训和指挥官的功过奖惩等进行了总结和民主评议，并讨论了收复五原的部署。

当时，五原守敌有一万余人。在旧城驻有乌古廷（伪蒙军总司令兼伪五原行营主任）、鲍贵廷（副司令兼参谋长）率的两个师（计四个团），在新城驻有汉奸部队王英、安恩达的两个师和日皇族水川中将和大佐以下日寇军官、宪兵八百余人，而这时傅的三十五军已不足三千人了。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我采用了掏心战术。在民众协助下，出敌人不意，直插城内。傅以三十五军为主力以及游击旅的一部，并动员了一个屯垦旅（兵力七百一八百人，团长贾晏如）加入战斗。部署如下：以新三十一师安春山团（只不过百余人）组成突击队，准备好浮桥渡渠。其任务是：沿黄河东进，然后向北突入城内占领五原南门的一座学校（这是敌人的后勤补给仓库与合作社）；新三十一师其余部分以及贾晏如部和游击旅，统由孙兰峰指挥从敌人的间隙插入新城；董师先占领梅林庙，然后，随总部驻守梅林庙并相机支援；新三十二师通过梅林庙进攻旧城；此外要求门炳岳部监视奎可素方面的伪蒙六师（穆克登宝部）；刘春方骑兵团监视五加河北的伪蒙八师（宝音格勒德尔部）。此外，部署了王子修、安华亭与石玉山三部在五原以东、乌梁素海和四柜一带，准备截击溃逃之敌。会后，部队立即迅速行动，分几路秘密神速地猛扑五原城。

战斗在三月二十日夜十二时打响，激战到次日晚，城内的敌人全部解决。傅先生亲临前线指挥，指挥部就在一条水渠沿上，当攻城部队陆续打出了表示攻城胜利的三颗信号弹时，傅先生高兴地鼓起掌来。克复五原之役，击毙日寇水川中将以下日伪官佐级军官计四百余人，俘虏日兵三百余人，获大小炮二十多门，汽车五十余辆，城内敌仓库的物资使我军得到了一次极大的补给，补回了在包头、绥西两役的损失还有余。五原战役的胜利，大长了中国军队的士气。在攻城的战斗中，团长贾晏如，营长赵寿江不幸阵亡。赵营战斗异常英勇，大部殉国，克城后仅余十一人耳。赵屡立战功，勇敢能战，由于安华亭和石玉山演了个“华容道”，有意纵敌，让乌、鲍、王、安只身逃掉了。自此，由于整个战争形势的发展，敌人再无力发动进攻了，只在乌梁素海东面西山嘴上建立据点。以后这些据点也只能换驻伪军了。

“这一个除夕夜最好！”

三大战役持续数月，在沙漠中与敌人周旋、拼杀，条件十分艰苦。傅先生运筹指挥，和将士一起辛苦辗转，许多情景我至今仍铭难忘。

一次，傅部在沙窝中与敌人周旋，在一个叫小站的地方的小树林里休息，遭到敌机轰炸，傅先生被落在附近的一个炸弹埋了起来，大衣被弹片穿了好几个孔，身边的马也惊跑了。卫士赶忙前去护卫，只见傅先生毫不理会，就势躺卧在沙窝边，置之泰然。我们被他这种镇静情绪所感染，不知谁想起今天正是除夕，于是大家议定赶移圣旦格尔德庙过夜。敌机过后，我们继续前进，渐渐天已完全黑下来。在茫茫沙海中，竟迷失了方向，转来找去，不

见目的地。这时又刮起狂风，风卷黄沙，打得人睁不开眼，脸上也冻出疙瘩，部队十分疲惫。傅先生命令就地休息。战士们从沙窝中采来马棘、干草点火取暖，比赛谁点得快、点得旺盛。聪颖的战士又发明了一种“火炕”：在快燃尽的干草、马棘草上面盖上黄沙，躺在上面睡觉暖烘烘的，十分舒服解乏，有如农家的火炕。篝火熊熊，映红天际，大家围在火堆旁吃锅巴、睡“火炕”，祝贺节日，情绪热烈。傅先生十分高兴地说：“一生没有过这样的除夕夜。满山荒沙满山火，比外国人的圣诞节还美。这一个除夕夜最好！天明一看，圣旦格尔庙原来就在前面那个大沙梁的后边。

在组织三大战役期间，傅先生处置军机、检查部队，督促补给，每天往返几十里至上百里路，十分劳累紧张，早上吃上一碗泡面糊，随即出发，一天跑一、二个点。黑夜回到总部，第一句话总是“给我喝口水”。连续一百多天的跋涉，傅的鞋底磨穿了。勤务兵天天缝鞋，鞋还总破。傅先生怨勤务兵缝得不好，勤务兵埋怨他穿鞋太不当心。后来实在破得没法缝补了，傅先生只好用麻绳绑住，继续穿用。那时傅先生和大家一样，身上也长满了虱子。有一个时期，部队每顿吃的都是豌豆，偶尔勤务兵把豌豆碾成粉做给傅先生吃，便算是“特殊照顾”了。

在紧张的战争中，傅先生从不避艰险，不怕牺牲，在生活中和战士们保持一样水准，艰苦朴素，忍饥耐苦。从这当中也可以见到傅先生的人品和风貌。

给蒋介石的公开辞勋电

傅先生率部在后套坚持抗战，英勇杀敌，艰苦卓绝。部队的

伤亡要靠自己救护安置。部队的给养和装备补充要靠自己战胜敌人去夺取。不要说衣被粮草，在荒漠中连吃水都很困难。但是对于部队的生存，国民党中央从未过问，从未给予任何的支持与补给。当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正热衷于对日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对内则大搞摩擦，破坏抗战，于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春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收复五原后，四月中，傅总部迁回陕坝。这时，作战时跑掉的国民党中央原来派到各级的政工干部也陆续回到了部队。

傅先生在陕坝得了伤寒病。隐蔽在陕坝北十多里的一个小村庄中养病，以避免敌机的轰炸。虽然在三次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但是想到阵亡的将士，伤残的官兵，联想到国民党中央的腐败无能和对本部的压迫和吞并的企图，傅先生常常在病中暗自流泪，十分痛心。傅先生记忆力极强，对部队排以上干部、警卫连所有战士，均能叫出姓名。病中，傅先生常常呼唤阵亡将士的姓名。病愈后，他命用白布把阵亡将士的姓名、年龄、籍贯、阵亡时间一一写上，挂在办公室墙上，整整布满了三间房，以志祭奠怀念之情。

五原光复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慰劳。四月六日，蒋介石也来电，宣布授予傅以“青天白日”勋章。对此，傅先生于五月二十二日发表了辞勋呈文，公开予以辞绝。辞勋呈文义正词严，寓意深刻。明里推诿功微，不敢拜领，实则对蒋的对日投降妥协政策的不满和对蒋不择手段地吞并异己的企图的愤懑，希望借此唤得国内外舆论的支持。

傅公开辞勋之后，蒋为了缓和傅的不满，几次来电嘉勉慰劳以示关怀、安慰，并邀傅在病愈后到渝商议部队的整编和补给问题。五月中又把傅接到渝养病，答应给傅三个军的建制（除原三

十五军外，成立暂编第三军，并把傅的骑兵扩编为骑四军），此外，还给了一个小炮营。当然，实际上蒋只是给了番号，并没有给增加枪械，后来（一九四四年）蒋借口整编部队，又把骑四军的番号取消了。在整编部队时，傅把安华亭与石玉山两部人员编入暂三军，对安、石二人，令其复员。

“挖墙脚”与反“挖墙脚”的斗争

收复五原之后，傅一直着力在医治、恢复部队的创伤，安置孤残。对敌只在相峙线上有零星的战斗。这个时期对敌斗争的特点：加强了争取伪军的工作，例如，对乌布浪口、西山嘴的伪军允许他们下山打水，而他们需及时给我军提供日寇行动的情报；同时也加强了敌后大青山及绥南地区的游击活动。

傅部在绥西的四年多当中，政治上与蒋的斗争却成了一个主要的议题。这个时期，傅与蒋的矛盾时紧时缓。蒋在表面上给傅部扩充的同时，通过中统、军统和省党部、三青团、政治部等各方面的势力，联合起来加紧对傅部进行渗透、瓦解和控制。这时，除了原在政府部门中的中统特务和由蒋派到傅部政治部中任职的人员外，又以缉私队名义派来以马汉三为首的一伙军统特务；以截抄和监听日寇的电报、电台和抄收国际电讯为名，派来第五工作队，实际上是专门监视傅的通讯联络并兼对付中国共产党的。一九四一年又要求成立三青团绥远分团部。部队干部绝大多数是年青人，因此傅很重视三青团的建立对部队可能产生的影响，所以荐举自己当时的一个亲信为筹备主任，但结果还是大权旁落。三青团绥远分团书记赵仲容投靠了蒋帮，他在绥远分团内安插了很多亲信，使绥远分团实际落到中统手中。蒋的势力以三

曹富章率队进城后，在事先按排好的三元合店大院，和其他附近商号院内分散居住。曹富章只知在自己住处设岗放哨，而对住在东西营盘的清军巡防队官兵的武器没有收缴。对五门亦未接管。这是曹富章等人失败的主要原因。他们只打算明天接管城防，但没想到当天发生突然变化！当时，郭鸿麟是同盟会驻包头地下工作负责人，惟恐曹富章中了樊恩庆的诡计，但郭、曹二人素无直接联系，又不认识，只好等待明天接管后，再去找曹富章商谈各项问题。

樊恩庆第二天在大行正厅（现东河区马号巷）陈设酒菜，并用红布事前包好假印一个，放在匣内，摆在香案上，表示“诚心交印投降”，待各项布置妥当后，又让王子寿亲去三元合店请曹富章等二十三人前来赴宴。待曹等二十三人到达大行大门外前，樊恩庆伪装谦恭，拱手作揖，表示欢迎。曹富章等进屋落座后，樊恩庆双手捧着假印匣，低头弯腰、恭而敬之，递交给曹富章手中。曹接印后，便认为大印到手，更加放心。大家落座后，樊恩庆手提酒壶，按照席位给每人斟满一杯酒，邀大家干杯，樊恩庆为了解除曹富章等人怀疑酒中有毒，首先一口喝尽杯中之酒，并向大家亮了酒盅底，以示酒中没有毒。曹富章等人也同时一口喝光。樊又给大家斟满了酒，又请同饮。当时曹等人也同时喝光。这时樊又斟满杯中酒后，借口外出方便，溜出门外，这是预定下的阴谋诡计暗号。隐藏在空房内的清兵看见樊已出来，一涌而出，奔向正厅向曹富章等人开枪射击，曹富章等人，手无寸铁，虽拳打脚踢，混打一时，但仅约十几分钟，起义军二十三人均被樊杀害。

曹富章率领的进城士兵，也被樊军秘密包围，这些官兵听到枪声时，立即飞奔出来，与清军巡防队格斗，但因地形不熟、东冲西闯，伤亡过半，逃到城门时，五门紧闭，只有越城而跑，各自分散，幸存者甚少。这就是曹富章起义，不到两个月，因警惕性不高，遭致失败的简略经过。

得更为系统、内容也更加丰富了。这对于增强内部的团结，激励全军的斗志，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促进和发展当地的生产，密切与地方的关系等等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套制度当时叫做“整体干部办法”，曾集中刊登在一九四三年傅部的内部刊物《贯彻》第五期上，详细的内容在下面再作介绍。实施这套制度，均由人事室掌握，所需的干部均由人事室管理（这套制度的实施也得力于仍留在傅部中的共产党员的帮助。这时傅部从总部机关以至连队，尤其在傅部自办的子弟学校——奋斗中学和奋斗小学的教、工中，都还留有很多党员在工作）。这套办法深得部中绝大多数干部、官兵的拥护。因此实际上，蒋任命的张彝鼎的政治部被傅的人事室不声不响地逐步架空，取而代之了。

傅先生的反措施日益加剧了蒋对傅部的不满和歧视。为了加强控制，蒋又下命令禁止各部队自编密码，密码要由其伪中央“统一”编发。为此，傅先生派我到重庆与蒋机要处主任毛庆祥交涉，我以确保军事通讯的保密性为理由，据理力争，毛庆祥理屈词穷，最后只得仍准许傅部自编密码。我们屡次破译蒋方监视傅部的来往电报，但是傅部的密码蒋方却无法捉摸，十分恼火。

矛盾的发展，导致了一九四三年六月蒋派其人事大员杨司长（名字记不清了）到绥西干涉。杨特别抓住《贯彻》第五期的内容，开会指责我们是自提口号，自立办法，妄欲自成系统，自树一帜；说什么你们要搞的这些办法，“中央”都有相应的规定，质问为何不按“中央”已经有的办法来办。会上，傅先生看了看我，我便起立与杨辩论。我说：“你说要按中央已经有的办法办，中央的办法，你们那些办了？你们说党向国家负责，你们是如何负责的？我们前方打仗负伤了没有战地医院；战死了，眷属

当时包头镇人口据传说已达两万多。商业比较发达，水陆畅通。特别是内外蒙古，各种皮毛畜产品进入包头市场，换取生活用品。而平、津、武汉、太原商品也源源而来，因此人称“塞外小上海”。包头不久改为设治局、大行也改为商务会。因地方行商往返出境常被土匪抢窃，为了保护地方治安和行商安全，由商务会组织了保商团，向绥远都统衙门购买大枪二十支，这个保商团成了包头社会上唯一的一支武装力量。

辛亥革命成功后，虽然推翻清朝统治阶级，但换来了军阀混战，日伪统治，国民党反动派剥削压迫更加残酷。直到一九四九年“九·一九”以后，包头人民才得到彻底解放。

的环境中，部队要有中坚，我曾向傅先生建议在内部成立一个称为“同志会”之类的组织。傅先生说：不行，公开的不要有核心和层次，以利团结，在后套干部来源十分困难，应当力争团结所有的干部努力奋斗。而且，又不要被人（指蒋）说我们有小组织。所以，第二句提出“我们向党员负责”，傅先生解释其意为：“我们向党员的义务负责”。

在《军政干部条例》中，对干部明确提出的要求是：“四有”、“四为”和“四要”，大致内容如下：

“四有”是：有热忱爱国思想，有奋斗牺牲精神，有“民主”平等作风，有三责任心（对国家、整体、职务的责任心）。

“四为”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为整体。

“四要”是：要积极工作，要艰苦朴素，要团结互助，要学习进步。

总口号是：同生死，共患难，有福大家享，有难大家当。

还提出了要做到“五个一致”，即：生活一致，作风一致，官兵一致，军政一致，军民一致。

条例中还规定：“严禁烟、赌、赃”。这一条实施非常严厉，以极刑处置。经常发起突击检查。

傅部的经费，由傅总部按国民党中央给的编制总额领出餉项，然后由傅总部自己按照部中实际的任命发下。因此在傅部内，未由国民党中央任命的“黑官”很多，傅用这个办法可以直接任命干部，保护受“黑名单”迫害的干部。为了解决抚恤、家属安置、子女教育等问题，还设立了干部福利互助社，有互助基金。傅用这笔经费兴办一些福利事业：办军耕农场以解决家属、伤残、救恤的安置问题；办军鞋厂，自己织胡麻布打鞋，还有皮革厂、奋斗造纸厂等以解决一些日用品的急需；办子弟学校——奋

因历受边疆大吏的压迫掠夺，蒙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亦有不少人挺而走险，加入匪帮。

（三）宣抚西蒙的经过暨拟具对乌、伊两盟善后的办法

一九一三年春季，西路防务司令孔庚奉令自包头撤防后，当时绥远方面亦未派军前来填防。因之，地方空虚。初则三五成群，劫案迭起；继则明火执仗，掠夺财物。著名匪首卢占魁乘势聚众而起，号称汉蒙独立队，附合者日众，声势浩大，已有万余。他们以富农地主巨商为对象，专事绑票勒索。官军以剿匪为名，实则以子弹与匪作交易，致匪势蔓延，汉蒙同受其害，而蒙旗遭其荼毒尤甚。如乌兰察布盟达尔罕旗之百灵庙，其地蒙人谓之为巴图哈拉噶。清代，该旗札萨克被封为贝勒，因呼之为贝勒庙，蒙语为贝勒伊合苏木，遂转音而误为“百灵庙”。该庙建筑宏伟，最盛时，喇嘛有数千名之多，为乌盟各旗宗教信仰之圣地。卢匪猖獗时，窜扰该庙。而该旗蒙兵仅有百余，因寡不敌众，被匪盘踞多日，不但抢劫一空，且遭其焚毁。乌盟之五当召，即广觉寺，蒙人呼之为巴第噶尔苏木，常驻喇嘛数百，亦为绥区著名之庙，被匪劫去牲畜，损失亦巨。除伊克昭盟准噶尔及达拉特两旗兵力雄厚，匪不敢犯外，其它各旗则无不受其扰害。北京政府袁世凯为了羁縻蒙古，安慰边民，故于一九一四年八月，派塔旺布里甲拉为西蒙宣抚使，代表大总统慰问蒙旗民众，宣布政府“德意”，调查蒙旗损害情形，以便抚恤；并将西蒙应兴应革各事宜及善后办法，亦由该使妥拟呈复，俾便采择施行。

宣抚使经费，规定为三万五千元，期限六个月。使署编制设有参赞、咨议、秘书、翻译、调查、书记、会计、庶务、办事员等职；因绥远不靖，派骑兵一连为卫队。塔王于一九一四年十月，由北京出发。当时火车仅通山西阳高县，由该县赴绥远须起旱而行，八九日始到达绥远城；塔王当与都统潘矩楹洽商进行宣抚事宜。由都统署通知西蒙各旗札萨克王公来绥开会，商讨蒙旗遭受匪患情形暨善后事宜。计先后到绥者有乌盟盟长、四子王旗

解、控制的目的。以后，军统方面派到后套的“防毒教官”，因蛮横殴打傅的译电员被国民党中央调回，“第五工作队”也因对傅部的密码无法对付，只好撤走。一九四四年，美组织对华救济总署，在绥远要成立分署。傅先生在部内让公开推选，在张彝鼎落选之后，又让当选者把分署之职让张去当，这样便把这个空头政治部主任也送走了。

虽然如此，蒋、傅间暗中的斗争仍然很尖锐。一九四四年，蒋以整编部队为名，将傅部军力人数减少，原给傅的骑四军的番号也被取消了。此外，蒋仍继续加紧对傅部内高级人员的拉拢。例如一九四四年，蒋调董其武到重庆陆军大学将官学习班学习，这期间傅调任董为榆林邓宝珊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在张彝鼎调走之后又任董接张兼政治部主任。及至董在渝学习毕业，见何应钦时，何有意问道：“你知道对你的新任命吗？”董答：“知道。”何则挑拨说：“为什么不让你任实职呢？”董答：“我相信傅先生是有全盘安排的。”何很不高兴。董临别要求何给予轻武器的补充，何给董二挺轻机枪，以示颜色。傅对部中任要职的人员的掌握是很清楚的，严防蒋方用拉出去和打进来两手瓦解部队。因此，这个时期傅部内要职的任免、变动是很经常的，而且这些变动常和对蒋的斗争有关。不可靠的或确被蒋方拉过去的调出了一批，也新吸收进来一批。新进入傅部人员中既有中统，也有来做工作的共产党员。对于由大后方招来的干部，也一律先通过训练团的审查、教育，然后量才使用。

（2）蒋对傅的利用和傅对蒋幻想的破灭

东 进 “受 降”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决定了日本的投降。

八月十五日这天，全国各地，鞭炮齐鸣，最后战胜日寇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经过了八年艰苦的抗战，傅先生自然也欣喜异常，使他更为兴奋的是实现一统绥远全境，按他的“理想”整建绥远的夙愿可望实现了。

八月十一日，蒋任命傅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并命令傅部自陕坝开拔东进“受降”。傅在大青山的游击队（鄂友三部）也下山向归绥进发。傅部十五日接收包头，十八日进驻归绥，稍事巩固之后随即分兵绥远各县“受降”。傅以奉蒋之命，又自恃国民党政府绥远省主席和十二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以为唯其正统，自应“受降”，实际上是无视八月十日中共十八集团军总部的命令，无视绥东解放区存在的事实，因此，理所当然地要受到人民解放军的反击。

在八月十一日离开陕坝前几天，有一个卫××到陕坝求见傅。卫曾是抗日初期傅总部的副官处主任，一九三七年傅部在察抗战时期，卫曾因贻误军机，恐受处置，从柴沟堡到了陕北。卫此次来到陕坝，说是奉中国共产党有关领导之命来见傅的。但他这时由于不明了傅总部内人事更替的情况，当他把自己的使命托一位他自认为是傅身边亲信的人士传话时，消息走漏被中统特务知道了，因此傅不可能接见他。到包头后，傅先生告知我此事时，我曾忧虑地说过：“不要弄成了先礼后兵。”傅对派卫联络表示不满、怀疑，说：“怎么是他来呢？一句话也没带来就走了！”此事我们一直感到很遗憾。可以设想，如果当时此人办事得力，至少有可能达成某种相互合作的默契。到了绥东我们也曾派人出去，希望能和绥蒙政府的负责同志接头，但未能如愿。

由于傅部进占包头、归绥，并分兵绥东各县，激起解放军的反击。傅自知力量单薄，又经过抗战八年的苦战，傅亦希望能有个

和平安定的局面，以利人民的休养生息，因此迅速将自己的主力部队缩回，集结归绥，另一部集结包头，以求自保。傅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所谓东进“受降”，实际上是对绥东解放区的进攻，却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错误地通电毛主席反诬中国共产党打了第一枪。在此影响下，当傅部在绥包被围，面临被歼的境地时，全军上下感到极大的痛苦。其后，解放军对绥、包撤围，到四六年二月底在旗下营南北线形成对峙。三月军调执行部三人小组到归绥。为了保存实力求得暂时的安定，傅接受调处。军调执行部集宁小组中共代表之一、绥蒙军区派驻国民党十二战区的联络员是潘纪文同志，是老朋友了，曾几次提出起草一个彼此逐步和解的办法，但除只达成原地停战和彼此释放被俘人员的协议外，并无进一步的结果。

罪恶的一页

一九四六年八月底左右，傅派周北峰陪潘纪文来绥后，陈诚来到归绥。陈诚此次来绥是在蒋已经公开发动对解放区全面大规模进攻的时候，这时蒋十分需要利用傅部在华北予以合作。蒋的美国顾问魏德迈在一九四四年曾到后套访问，观看过傅一〇一师卫景林团的攻防演习，非常赞叹惊异，因而蒋在这个时候感到傅部对他有用。一九四五年蒋便特意给傅拨了四门美国一〇五野炮以示对傅部的重视，为以后的关系，埋下伏笔。陈诚此次来绥的目的是命令傅与东路北平方面的李宗仁协同夹击张家口，从此傅便走上一条反共反人民的反动道路，帮助蒋介石实现一统中国的迷梦，把一支爱国的倾向进步的抗日军队引上了绝路。

傅部于九月五日进犯卓资山获胜，十三日倾巢出动，孤注一掷，尽绥包之全部兵力，狂攻集宁，接着十月十一日又攻占张家口。

傅部侵占张家口，对国民党反动派来说，似乎是军事上的一个大胜利，南京蒋政府为之狂欢不已。在侵占张家口的第二天，蒋介石即悍然宣布召开伪“国大”，从而在政治上暴露了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真面目，但这既是华北反动势力嚣张得势的顶点，也是它们失败的转折点。而对傅来说，却使他开始察觉自己和蒋介石一样，成为人民仇恨的众矢之的，使他开始意识到这是自己还不愿意承认的政治上的失败，思想上陷入了极大的混乱苦恼之中。

张家口的教训

蒋帮的一片狂欢叫好声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傅部队的强烈的憎恨、敌对情绪（这与抗日时期人民的赞助形成鲜明的对比），引起了傅先生的深思。到了张家口之后目睹种种事实，促使傅先生对自己的道路和对蒋介石的面目慢慢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首先，傅先生及其高级军政人员开始痛苦地察觉到：部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部队，政工人员绝大部分仍是当初建立部队政治工作时期的人员，同时在主观上也很注意加强部队的纪律、作风和军民合作的工作，但是部队所到之处，群众不是如抗日战争时期那样的热烈欢迎和密切帮助。相反每到一处，人民群众却躲藏不见，逃避一空，则是严密封锁消息，跑来欢迎和“诉苦”的都是地主豪绅，而人民群众对解放军却是踊跃帮助、积极支援。部队宿营时，必须处处戒备，建立立足点和夜间联络网，否

则就要遭受夜袭。这种情况，越深入到解放区，感受到的威胁越大，时间越往后，越无法应付。

其次是不堪容忍的歧视。蒋嫡系部队装备、服装、生活待遇等各方面都较傅部优越。这些部队的军官趾高气扬，视傅部为“土包子”，而打仗时，却总是让傅部在前面，他们在后面跟着。对此傅部中官兵十分反感，意见很大，“有后娘养的”之感。

再者，亲眼看到蒋介石不顾一切地搜刮财富。傅占张家口后，随之闯到张家口的蒋中央“敌伪财产处置委员会”，找傅商谈要求拍卖敌伪在张家口的工商企业，把资本拿走。傅把他们推开，“你们先与我的秘书长王克俊谈吧”。傅对这种做法极为不满，对我说，这不真成了“刮民”么！这是要失民心的。我和这些人周旋了一个来月，坚决反对他们这种行径，谈判破裂了，那人又去找傅，傅说：“我认为我的秘书长的意见是对的。”此人无计可施，只好走了。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蒋与美签订“中美商约”。以后又签订的“中美航空运输协定”等卖国条约，出卖军事基地，出卖国家主权。蒋公开如此卖国，公开勾结投靠美帝，对傅先生的爱国心震动很大。傅先生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认为蒋“丧权辱国”。傅对蒋、美军事勾结，对美帝装备蒋军的情形甚为注意，但是傅知道美帝这些援蒋的军事物资从来不会有他的份的。当时美帝的“联合国中国战区”的第二任参谋长，蒋的顾问，以及一九四八年十月底来华的史培尔曼（教会人物）等，也曾直接对傅拉拢，表示要单独直接给以美援装备，但傅总是严肃谢绝说：“我们国家是个整体，我只是个地方的军政负责人，你们还是按我国的体制去办才好”。

面对一系列严峻的事实，傅先生思想陷入较大的混乱、苦闷中。他在自己的心腹人员中间多次提出这样的问题，要求大家研究考虑，他问道：“我的很多有地位有学问的好朋友，还有很多的青年学生都纷纷向共产党那里跑，这是什么道理？”他又说：“我们在陕坝搞干部条例，提出过“四有”、“四要”和“四为”。大家记得“四为”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为整体。现在我们为什么要打仗呢？是为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人民去打仗呢？我们这样地打仗，受害的是那些人？我们为少数人打仗，却还要受他们的气。”傅先生还提出“战争的前途何在？”等问题，要求部属深思。

彷徨与失望

虽然在思想上有了上述的一些变化，但是这时傅还幻想蒋或许能有些改变，也许能进行些改良、改革。解放军在张家口留下的书籍、文件很多，很完整，傅部接收后，有的人主张集中烧毁；有的人主张集中保存，组织研究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作风。傅十分赞成后一主张，指定由我负责进行，并要求对书刊、文件作出摘要、写成报告向他呈阅。傅先生详细地看了研究小组送的摘要、报告，他认为应汲取的或重要的地方都用红笔圈出，划上记号。他一有空就研读毛主席的著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一九四七年傅在张家口时期仿照这些文件，根据自己的政治工作经验，为部队写了一本《为人民服务》，制订《行政人员要则》和《组织人民办法条例》。傅还多次给蒋写信进言，主要内容都是建议蒋在国民党政权中要实行改革，说“要统一、建设中国，需要参照八路军这一套去做”。信中提到重要处时都用红笔书写。

这当然是对牛弹琴，蒋一概不予理会。为了掌握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傅一向很重视收听新华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广播，遇有国内外重大事件，对有关的专题评论文章都要亲自阅读研究。当然，这些正如他在解放后一次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发言中说到的那样：“过去我也读过毛主席的书，但是那时立场不对，各取所需，学不到点子上。”但是，他注重学习、研究的态度是帮助他在饱受苦闷痛苦的经历中完成思想转变的重要因素。使他能不囿于自己的历史地位和政治环境，在客观形势发展的推动下，终究能得出正确的认识，跟上历史潮流而前进。

然而，蒋对傅的方针却是自始不变的。这就是：既要利用又要千方百计地排斥、控制、瓦解、消灭。傅侵占张家口之后，蒋即给傅增加“独立第七师”的番号，不久又给一〇五军和一〇一军两个番号，由傅筹建，名义上是给傅扩充军力。可是不久（一九四七年春），蒋即以东北战局不利为由，要抽调傅旧有的两个军使用。调暂三军到东北支援，调三十五军到河北保定以南、以西“扫荡”，傅只得应允。但三十五军只抽出两个步兵师一个骑兵旅，暂三军也只抽出两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暂三军到了东北后，蒋介石即要求留在东北使用。傅深知经营一支部队不易，坚决不干，才把暂三军撤回。自此，对蒋的手法又得了一个教训。并且从两次出军参加对解放军的进犯过程中，更进一步感到人民对蒋发动的反革命内战深恶痛绝，看到蒋嫡系部队的骄横凶暴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黑暗，无可救药。

傅先生希求抗日胜利后能出现团结合作，共济时艰，从而实现国家统一、和平复兴局面的善良愿望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贪污腐化，自私自利，政治黑暗，穷兵黩武，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腾，生产凋敝，民不聊生。四大家族的种种祸国殃民

的罪行和蒋介石卖国勾结美帝投靠、制造战争的阴谋和野心日益暴露的过程，使傅先生这个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初步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由对蒋的依附，抱有幻想变为失望、苦闷、徘徊并有所觉醒。但是，要下决心与蒋决裂，毅然加以抛弃，要从蒋的战车上挣脱出来，走上人民的道路还要经过一段艰难的历程。

与 蒋 决 裂

一九四六年底，蒋把“战区”改称“绥署”。李宗仁北平行营下辖保定绥署（原孙连仲十一战区）和张垣绥署（即傅十二战区）。一九四七年底蒋撤消保定绥署，人员合并到张垣绥署。此时，李要与蒋支持的孙科竞选副总统，蒋、李矛盾加剧。因此不久，在十二月间，蒋到北平召李、傅等开会，又撤消北平行营，成立“华北剿总”，任傅为“总司令”。对此任命傅是很不愿意的。会后，傅回到张家口曾对我说过：“我们不能到北平去。”这一方面是因为傅深知，蒋的部队是不会听他的指挥的，而自己的部队却被更牢地绑到了蒋的战车上；但更主要的是，这时傅已经觉醒到“绝不能做蒋介石的殉葬人”。

但是，“华北剿总”一确定，象一匹被套上了笼头的马，傅不得已还是带了谋参长等少数几个人到北平上任。一九四八年一月，蒋为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空前规模的冬季攻势所震惊，召傅到东北参加军事会议。在此之际，傅的两个军（三十五军与暂三军）被吸引向保定方向南下，结果三十五军在涞水被歼两个团，死一师长，军长自杀。傅部受到一次严重的惩戒，傅从东北赶回，对此次兴兵南犯，十分生气。

傅到东北开会回来后，才把自己的总部全部迁到北平。此时傅的战斗序列为：十六军、十三军、六十二军、六十七军、九十二军、九十四军、三十五军、一〇四军（原暂三军）、一〇五军（原暂四军）、独立第七师、骑四师、骑十二旅、骑十三旅，后又扩增八十七军、一一〇军、青年五军、一〇一军。共分为李文第六兵团，石觉第十三兵团，孙兰峰第十一兵团。一九四八年十月，蒋为援锦又组织第十七兵团，任命侯镜如为前敌司令。作战区域为冀、察、热、绥及晋北。

傅这时处于一个十分矛盾的地位。身处蒋介石集团的高级指挥职位，而内心却极不愿意继续为蒋所驱使。这个矛盾终于爆发了：一九四八年二月，傅主持召开“华北剿总”的会议，研究军事工作。傅提出总部有权使用战斗序列的整个部队，但陈继承反对。陈是“剿总”副总司令兼北平警备总司令，军统特务头子。陈表示国民党中央军的行动必须通过他，有的部队只有他才能使用（青年二〇八师），而且对傅的嫡系部队的使用他也要过问，态度十分骄横跋扈。傅对陈的权力不予承认，而陈坚持，如是争吵起来。傅无奈只得休会。会后，傅向蒋坚决辞职。傅先生气愤地对周围的几个亲信人员说：“想靠中统、军统两条绳索来捆绑我的手脚，要我充当地主豪门的鹰犬去咬沿门乞讨的苦百姓，我是不干的！”傅三次电蒋辞职，蒋竭力挽留。最后，蒋说：“你若能荐举一个如你一样的人才，可以接受辞呈。”傅说：“陈继承可以。陈继承已经掌握了军事、人事、警备、舆论……，完全可以胜任有余。”蒋了解矛盾的激化是因陈引起的，不得不撤去陈，并允由傅荐举人选代之。傅荐举十六军副军长周体仁接替北平警备司令，风波表面上才平息下来。

但是，自此傅先生内心已对蒋完全失望，决心与之决裂，开

始部署相机圆满完成整部走向人民道路的艰巨转变。

二、关键时刻的抉择，终于走

上了人民的道路

傅以坚决的态度，迫蒋撤换了北平军统头子陈继承的北平警备总司令之职后不久，又撤掉了几个身踞北平市政府内要职的中统、军统特务（如民政局长，军统特务马汉三，社会局长、中统特务温崇信等），暂时削弱了中统、军统势力对北平的控制。

一九四八年五月，傅在北平成立了河北省政府，以扩大自己控制的范围。

六月，蒋命令傅总部把新闻处和民事处合并为政工处，指派张彝鼎为中将处长（张即一九三九年蒋派任第八战区副长官部政治部主任者），傅坚决拒绝。蒋旋又委派赵仲容（赵即陕坝时期在傅部中“挖墙脚”的三青团绥远支团书记）为处长，傅又坚决拒绝。为了防止蒋再指任人选，傅同时电蒋请调王明德（即我，当时任傅先生的秘书长）为处长，顶住了蒋安插亲信的企图，并把政工处由总部的外面迁到总部内办公。对于傅的这一任命，蒋没复电批准，但也没有再另委人选。

七月间，蒋要给傅扩四个军，给了番号。傅先生曾再三研究过其意图所在。联系到一九四七年在张家口，因为接受了扩两个军的命令，结果自己的部队三十五军和一〇四军被分别调往河北和东北。鉴于这个教训，傅决定四个军的番号不要，作了如下的处置：除把原保定绥署孙连仲留下的部队一个师和一个旅扩编为一一〇军，荐举李世军为军长外，其余蒋所给的编制平均分给所

属各军，各增一个补充师。这样，既有利于傅协调所指挥的中央各军头头的关系，避免蒋对他生疑，又可防范以后蒋可能抽调他自己的部队的企图，从而打破了蒋的阴谋。

对于过分嚣张反动的蒋嫡系部队，傅则把它调离北平，以减小身边的羁绊，如将蒋青年军二〇八师调驻唐山市即是一例。陈继承任北平警备总司令时，该师只能由陈使用（以后蒋把二〇八师扩编为八十七军）。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全国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声势浩大的反蒋斗争更加高涨，北平学生运动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但是遭到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七月发生了“七·五”惨案，北平参议会议长许惠东勾结当时驻西苑的二〇八师殴打向其请愿的东北学生，打死学生八人，伤三十六人。八月十九日又包围学校，阴谋逮捕进步学生。九月，二〇八师和所谓“为人民服务队”又镇压学生示威游行。这支极其反动的部队，实际上是陈继承被撤后陈给傅埋下的一颗定时炸弹。在蒋拼凑援锦兵团时，傅趁势将二〇八师调走。此外又把分散在平郊活动的“为人民服务队”全部集中到其总部（在傅的总部后面，北平西郊八里庄），派自己多年的政工人员张绍武任总队长，以约束其活动。

四月，国民党政府搞选举，李宗仁要与孙科竞选副总统。蒋为了控制选票，密令重新登记国民党党员，令傅把部队中的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限期上报，由中央审查，重发党证；凡不登记者，则取消党籍。在傅的部队中，只有国民党的党员（因为蒋任命军官必须是国民党党员），但没有国民党的组织，故蒋的这个密令傅便交由政工处令我处理。该怎样处置呢？傅先生对我说：“交给你了，你就看着办吧。”我明了傅先生的意图，便借口军务繁忙，拖延时间，应付上面的催促和下面一些人的询

问，始终未办。自此，傅部内的国民党党员均自然脱党。不再是国民党党员了。

此外，为了加强自己的内部，傅扩大了干部训练团和河北省的干部训练团，所有上面派来的或招来傅部或河北省工作的人员，均需先在训练团集训，通过审查，才能补充到部内。

但是有些蒋的命令，傅仍照样执行。例如一九四八年春，蒋命令袭击河间县，傅则如命派了鄂友三骑十二旅出击。该部沿途残害人民，又犯下了一笔罪行。

一九四八年十月，解放军对锦州发起进攻，蒋介石慌忙飞到北平策划援锦。不出所料，蒋打的如意算盘是调用傅的主力并命傅去指挥援锦之役，因为若能如愿，则可解救东北危局，若失利，则可把其在华北的嫡系部队拉走。蒋提出要傅把他的干部家属移送福州，让福建作为傅的后方基地；又说尔后作战，必要时可先撤至青岛，相机再海运华东南。蒋以此为诱饵，让傅去援锦。但是此举对傅来说则是一次生死攸关的抉择。面对蒋这一阴谋，傅表示先派人作些准备。他派了“华北剿总”的副总司令宋肯堂到天津查看公路、港口情况，又派了杜建时（天津市市长）设法查看援锦的道路，还派一个步兵师（十七师）和一个骑兵师（骑四师）到迁安、丰润、玉田、三河、武清等地转了一圈（为此林彪迟迟不敢南下北宁路，说傅部已到山海关附近，要求杨成武兵团先进击大同一带作为他南下的前提。但是毛主席洞察秋毫，说傅作义精明得很，不会援锦的）。至于蒋要傅亲自指挥一事，则再三辞绝，推说此事关系国家前途大计，自己资浅能鲜，不堪重任，只有委座德高望重，以统帅地位亲自指挥，才能奏效。蒋介石不得已只好亲自指挥并调用蒋自己的嫡系“精锐”兵团，由海路援锦。

蒋介石这次来平，还曾在“华北剿总”总部的小礼堂，召集当时在平的军以上的高级军政人员“训话”。蒋对与会的军长都叫不出姓名，会前要求把到会人员的座位图画好放在他的席前，为此会议推迟了一个多小时。蒋在“训话”中无耻地说什么“戡乱必胜”的关键在于以美苏为主要对立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美苏必战，苏俄必败，美国必胜，美国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等等，妄图鼓励士气。但适得其反，这个讲话又一次使傅先生看到了蒋介石一心投靠美帝国主义的面目，认识到蒋介石不可能是实现中国独立统一的人，而是为了四大家族利益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的傀儡。蒋走后，傅向我和参谋长李世杰二人问道：“你们看这个讲话怎样？”我们二人都认为坏极了，直言道：“这是中美勾结的继续与发展，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继续，身为国家总统，怎能讲出这样的话！”并感叹地说：“这个人连属下的军长也不认得。”傅先生痛愤地说：“我们就为这样的人，为几个家族而战吗？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才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前门拒狼，后门引虎！”

拒绝援锦是傅决心脱离蒋集团的第一个大胜利。但事情并没简单地过去，作为条件，蒋命令傅组织部队袭击石家庄和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平山西柏坡。傅一面暗自思忖对策，但表面上仍如命派了蒋嫡系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配备骑四师（师长刘春方）和骑十二旅（鄂友三部）出发，但各部均由政工处加派专员为监军，以便随时掌握。对于此举，部属也有犹豫。九十四军在渡新骆河时，军长郑挺锋听到了其弟（郑庭笈，中央军一军长，在东北被俘）的广播讲话后，托辞母亲病重，坚决辞职离去。刘春方亦几次来电，以解放区军民防守严密为由，对此举“谏请钧座考虑”。此时此刻，正是蒋援锦“王牌师”在塔山阻击战中被

歼，锦州已解放，廖耀湘兵团亦将就歼，辽沈战役已近尾声之际，蒋介石为宋美龄、孔令侃因囤积物资、捣乱金融与蒋经国发生冲突事，竟弃军飞沪调停去了。此时此刻，也正是傅作义先生决断走向何方的关键时刻。

关键时刻的决定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夜十二时许，傅先生把他贴身的卫士、勤务都指令远离，对其勤务兵说：“你倒好一杯茶，去叫王克俊来，便没事了，不必在内候命。”我知有要事，急到他住处。傅让坐下，说咱们谈谈。我问谈什么，傅先生却反问道：

“你说要谈什么呢？”我想了想，肯定是到了要作决断的时刻了，便道：“是否要谈自张家口以来，咱们屡次谈及但没有谈透，而今需要作出决定的一件事情？”傅说：“对。现在左右没有别人，你有什么看法都可直说。”接着傅先生说了很多，说到他一向很要好的朋友现在都主张和平谈判，许多很有才干的进步人士都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以及最近郑军长辞职等等事情。说到蒋近日急急飞向上海为的是什么“要事”，傅先生感叹地说：

“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我们不能再盲目地信赖他了。”傅还谈到对战争前途、人心向背的看法，以及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之不同等等。在对话中我们还谈到一九四五年蒋要缩编傅的部队，而近来又慷慨予以扩编；蒋一再要傅以福建为安置干部家属的后方基地，还封官许愿；又从蒋对待张学良和卫立煌的毒辣，说到必须走自己的路（傅与张、卫甚厚）等等。谈话自然集中在一个老问题上：“我们的前途何在？究竟谁是真正能使中国独立统一复兴的人？”这次谈话的结论是：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拥

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毛泽东才是国家民族勃兴希望之所在；目下必须当机立断，脱离蒋介石国民党集团，走人民的道路。因之傅先生问道：“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又问。“刘厚同从天津来了，你跟他谈过没有？”经两人交换意见，最后作出了如下三条决定：

1、由我次日再去和刘深谈。然后拟一电文交给傅先生。

2、天明即下令九十四军与骑四师、骑十二旅撤回。

3、关于方式和时机，认为需要待解放军围城之后，利用内外力量的配合，才能圆满地实现整部走上人民的道路的目的。

最后，傅先生决然地说：“我是准备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的：第一，几年来，我不断对部属讲“戡乱、剿共”的话，而今天秘密地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们的思想若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如果做得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决我。但是，只要民族能独立，国家能和平统一，咱们还希望什么呢？”我答道：“我虽是个军内文人，但还深知‘士为知己者死’。我王克俊有一颗头，绝不畏艰难险阻，定要不辱使命地去完成此事。”傅先生关心地说：“你的行动一定要注意安全。”我回答道：“我相信，无论是军统中统或其他反对此事的人，不会有愿舍其命而为蒋效力的。只要无私，就可以无畏。我会相机行事的，请你放心。”这次谈话就此结束。

这就是傅作义先生在关键时刻的决定。这是傅先生受侮于陈而迫蒋去陈之后，在各种矛盾的覆盖下极其秘密地进行的实际行动的开始。

次日，我即找刘厚同先生商谈此事。刘是傅多年契友，特自天津来平。（傅以前在天津任警备司令时，与刘过从甚密。日寇

入侵华北后，傅给刘留了一部电台及人员。在以后长城抗战、绥远抗战等时期，刘常用这部电台提供日、伪军情或提出参谋意见，此台直到抗战胜利前不久才被敌破坏。后来知道刘的女儿是民青成员，是地下党动员刘来见傅的）。刘与我的意见没有原则分歧，但在具体做法上未获一致。刘主张不管三七二十一，发一个起义通电便行了。我说这是辛亥革命时代的办法，现在的情况比以前复杂得多。我认为这样做不可能达到使北平千年文物古迹不毁坏，人民生命财产不致涂炭的目的，甚至连傅先生的生命安全也难保障。最后商谈的结果，是先设法通过地下党给毛主席发出电报联系。我拟就电文便交给了傅先生。电文不长，内容是表明要求和谈，不愿再打内战，为了国家和平统一，请求派南汉宸先生来谈判，并报告了傅在北平能控制的空、陆军数量。郑重表示：过去幻想以蒋介石为中心来挽救国家于危亡，拯人民于水火之中的作法，已经认识到是彻底错误的了。今后决定要以毛主席和共产党为中心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后来知道此电由傅先生的女儿傅冬菊（地下党员）通过党的地下电台大概在十一月十七日发出了，但未获回音。傅于是又要傅冬菊去请地下党负责同志面谈，傅冬菊得到了地下党负责同志同意见面的答复，并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但届时又没有人如约前来联系。

大概从这时起，傅冬菊便经常来到傅先生身边，她以父女之情使傅先生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缠绕中，心情上获得很多安慰，排解不少忧虑。

自此，直到解放大军围城前，我们一直处于徘徊、焦急、苦恼之中，一直苦于不能直接和共产党、解放军方面沟通。虽然此时也时有被释回来的被俘人员，他们也向总部说明解放军的情况与希望，但是没有带来可以肯定的、负责方面的表示。这个时期

通过各种渠道给我的电话也特别多，但多数是无头电话，听说我不在便挂上了。有的电话还指定时间地点要求见面，但常常却扑空见不到人。也有见到面的，但谈的又只是要求找工作之类的小事，摸不清其底细。在傅部早先留下的共产党员，他们只想了解动态而无积极的表现，使我们感到也许是他们的关系已旧了，不能依靠。总之，找不到恰当可靠的能担负重任的人选。

为了寻求联系和作出表示，傅释放了一些所俘的解放军人员，还说服中央军青训队放人。

为了掌握部队状况，与此同时，我请示了傅先生，向凡由傅直接指挥的师旅以上部队派驻政工专员，要求认真了解该部情况，具体说，其任务是：1、部队中官兵对当前时局的认识；2、部队中的官兵关系、干部关系；3、部队官兵对傅以及对总部有什么意见。而真实意图，是要摸清各部队到了关键时刻能否接受傅的决策，可能会出现什么障碍等问题。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准备工作。约经月余，便陆续收到了调查报告，也了解到一些部队中解放军开展的争取工作，我即综合报告了傅先生。

十一月初，傅先生到南京参加辽沈战役后蒋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蒋为抓紧傅的力量以期挽救残局，会上正式宣布任命傅为东南军政长官，并通过何应钦转达要把华北军队经海陆两路全部南撤之意，并说所有军队均归傅指挥，撤退军队的船位已经准备就绪，听候使用。在会上，傅先生以一个主战派的角色出现，主张坚守华北，如此等等应付了一番。傅的这个表态，正中蒋介石下怀，蒋当即表示尊重傅的意见。会议结束，傅得以平安返回北平。这次会议使傅先生更清楚地看到蒋的图谋，看到了南京政权已是丧尽军心，丧尽民心。败象毕露，无可挽回，更加坚定了走上人民道路的决心。

三次派人出城联系

人民解放军在十二月上旬，紧接着东北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之后，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由长城各口进军华北，出敌不意地完成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的对平津诸敌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战略部署。十二月十三日解放大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使傅部与蒋介石嫡系建制的部队分割于平津两地。

当时城内布防情况大致如下（我因负上述的特殊使命，对城内详情了解就不细了）：以鼓楼、天安门为轴线，以东为石觉十三兵团及其所指挥各部；以西为李文第六兵团，傅的三十五军的暂十七师、骑四师与一个补训师还有警卫团为总预备队，并兼负保卫傅总部——中南海之责。德胜门一带为傅的赵树桥师，西直门、复兴门至广安门一带为一一〇军和傅的孙英年、刘坚一等师，安定门外黄寺一带为青年五军，傅的骑四师（刘春方）在永定门先农坛设防。城防及城内治安由郭宗汾（“华北剿总”的副总司令）为首以及李文、石觉、李世杰（傅的参谋长）、梁述哉（傅的副参谋长）、楚溪春（河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等人负责。

十四日我们派人出城联系。傅总部联络处处长李腾九荐举其弟李炳泉（傅办的《平明日报》记者，地下党员）出城联络。我便与傅先生商定，派《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李炳泉为代表，配备了一部电台连同报务员、译电员和司机共五人，乘一辆吉普车，由我亲自把他们由广安门送出城外驰往平山，希望能见到毛主席。使命是谈判从张家口起，平、津、唐全线和平解决。至十六日他们却折回来了，说路上一再阻拦，要他们与平津前线联合

司令部联系。次日我又亲送他们自西直门傅的孙英年师防地出去。他们先到了程子华部（四十纵队），然后转到三河平津联合司令部。三、四天后，由我到德胜门外接他们回城（以后几次进出城防，多数走德胜门，在此驻防的赵树桥师长都作了妥善安排）。这次联系的结果是：给傅留下两个军，要求傅把蒋嫡系军师级的头目逮捕起来，宣布起义。听完报告后，傅和我均感到此方案无法实施，因为城内中央军的兵力是傅自己的部队的十几倍。次日，傅先生单独接见了李炳泉，详细询问了解放军负责人的意见，并说明了实施此方案的困难。

第二次出城，十二月二十四日左右，候少白（傅先生的一位老朋友）荐举张东荪（燕京大学教授）前往谈判。因从未与张有接触，故傅先生亲自接见张，观察定夺。最后决定由周北峰陪张出城，仍由我经西直门送出。数日后他们从德胜门回来，带回的结果是：给傅留一个加强团作保卫，其余部队改编，但没有如何实施细节。

不得已，又组织了第三次出城：一月四日左右，傅派飞机将其在绥的副总司令邓宝珊接来平，约十日左右，仍由周陪同，还有刁可成和邓的随从一名又由我亲自经德胜门送出城，骑马到了解放军联络站，然后转到联合司令部。十七日，他们发回报说，除周留下外，邓和其余二人陪同四野作战处处长苏静即日进城。我和崔载之到德胜门迎接。苏静同志傍晚到了，进城后安置住在东交民巷傅的联谊处（原日本大使馆）。十九日，傅先生同我、崔载之、阎又文等几人到联谊处看望苏静同志。见面后，傅先生即表示十分感谢并向苏静同志表示慰劳。最后傅对我们留下的几个人说，你们一起具体商议一个可行的办法，并指定崔负责联络和照应。当天苏静同志和我们在一起即拟出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实施

方案，协议共有十四项，条文如下：

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认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

一、自本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起双方休战。

二、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

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二十二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约一月后，开始实行整编。

四、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护仓库部队以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

五、北平行政机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公营公用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现状，不得损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六、河北省政府及所属机构，暂维现状，不得破坏损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七、金元券照常使用，听候另订兑换办法。

八、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

九、保护在平领事馆外交官员及外侨人员财产之安全。

十、邮政电信不停，继续保持对外联系。

十一、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俟后重新登记审查。

十二、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

十三、人民各安生乐业，勿相惊扰。

（以上各条刊载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平明日报》）

第十四条未见报，内容是：军统、中统特务分子必须进行登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当日晚上，我又向苏静同志送交了傅先生草拟的起义电稿。深夜，当我驱车返中南海途经南池子时，竟遇到特务的枪击，幸好冲了过去。

在傅同解放军进行磋商和平解决办法之际，蒋介石有所察觉，四次派人来加紧拉拢傅作义。第一次：约在李炳泉出城未回之际，蒋派其军令部长徐永昌来平劝说，大意是要求傅率部分两路南撤，一路自海路由新港撤到青岛，一路由陆路经河北、山东到青岛，尔后再候命南撤。傅以实际形势不可能做到为由，予以回绝。第二次：徐永昌去后不久（隔了一、两天）蒋又派其军统二厅厅长郑介民来平。除谈了徐永昌所谈的内容外，还表示在平的军统人员可以密切配合南撤，说什么“我的所属人员听傅总司令的指挥就和听蒋委员长的指挥一样”。傅先生亦以形势不可能作答。第三次：不久，蒋又派蒋纬国赍其亲笔信来平。蒋信内容大致是：西安双十二事变上了共产党的当，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他生平一大教训。现在你因处境又主张与共产党合作，我要借此一劝，特派次子前来面陈请亲自检察面陈之事项。事后傅先生告诉我，蒋纬国“面陈”的是：只要傅由津海陆两路撤至青岛，则有美军援助南撤；还说什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蒋要任命傅为东南军政长官。傅亦婉言拒绝。最后一次是美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及尔来平，对傅表示：今后美国要抛开蒋介石完全支持傅，美海军将在沿海援助南撤。傅先生答道：我们是一个国家，你们要给援助可到南京政府去说。我是个地方负责人，不能直接接受。白及尔一再强调今后将抛开蒋要直接支持傅。最后傅先生严正地回答道：我是个中国人。我相信中国人能解决好我们中国自

己的事情，毋需外人来干涉。白及尔讨了个没趣，败兴而去。

以上四次美蒋来人都是在天坛的临时飞机场降落的。

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夕

蒋介石无计可施，最后于一月十七日晚，给傅来了一电，大意说：相处多年，彼此知深，你现厄于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要求一件事，于十八日起派飞机到平运走十三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要一周，望念多年之契好，予以协助；并催傅即复。傅让人拟出“遵照办理”的电稿后，立刻叫我看蒋的来电与要发的复电。我问准备如何办？傅踱了几个圈，良久未答。于是我由他桌上取了一张便条纸，草拟了一个发给解放军平津联合司令部的电文，说明蒋电的内容，并要求城外解放军部队在飞机来时以祈年殿来确定目标，炮击天坛临时机场，阻止着陆。傅看后说，为保密起见，还是用你的名义发好。我即把电文上款改成“周北峰兄请转联合司令部”，落款改为“弟王明德”。改后傅先生看过笑了笑，手略挥了一下，示意“可发”，我当即交机要室译发。十八日，正是邓宝珊等人陪苏静同志进城的那天，我和崔载之正在德胜门外躺在壕沟中候接的时候，果然飞机来了，接着城外对天坛的炮轰也开始了。我顿觉如释重负。猛烈的炮火使飞机始终未能着陆，如此四、五天，终于粉碎了蒋最后企图飞机运去这个嫡系“精锐”兵团及装备的梦想。

自十二月初解放大军围城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动与组织下，城内学生运动更加高涨。各界“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保存北平千年的文物古迹，避免百万人民的生命涂炭”的呼声更高。市政府前几乎天天有游行请愿的群众。同时地下党还发动

知名人士出城和解放军接触。这些舆论与运动给傅先生走上人民的道路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对于要求出城活动的人士，傅先生都一一接见，并派人安全送出、安全接回。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康同璧（女）、何思源等二十余人出城和解放军联系活动。傅派人把他们送到城外解放军的联络站，住了一天，又把他们接回。因为何思源先生这时参加了进步的活动，特务立即对他进行暗害，在他的住处安放了炸弹，致使何的女儿惨遭炸死，何本人亦负伤，幸免于死。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平津战役中采取先打两头，放下中间的英明步骤，在傅的思想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战局的发展方向早在毛主席的深思熟虑之中。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从十二月下旬开始，十二月二十二日围歼了新保安之敌三十五军军部和两个师；二十四日攻克张家口，全歼守敌第十一兵团一〇五军和骑步等师；随即又歼怀来南窜的一〇四军两个师，共计九个师。至此傅的直属部队大部均被歼了。傅大半辈子从事军事，对于自己部队的损失，心情很沉重，思想斗争更加激烈。当时跟随傅先生的总参议张濯清先生来安慰他，傅先生却若有所思地说：军队的被消灭，我和你们同感沉重。但从全局看，向未来看，这未始不是一种战场上的移交。车到山前必有路，也未始不是我们新的政治生活的开始。”反倒安慰其部属了。这时正是美蒋迭次来威逼利诱的时候，自己主力部队的丧失，在客观上帮助傅更坚定自己的方向，顶住了美蒋的拉拢。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在天津守敌拒绝放下武器之后，人民解放军发动总攻。次日陈长捷来电话告急，说：“城中各处战斗激烈，宜兴府着了火，……”傅先生即答复他说“赶快派人和解放军联系，并立即救火”。仅二十九小时的激战，天津守敌全部解决，天津解放。毛主席关于平津战役的部

署，作战方针以及一系列的措施，对敌人实行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真是摸透了敌人的内部规律。针对各敌的区别，使敌人战、守、逃的幻想皆归破灭而陷于欲战不能，欲守无力，欲逃无路之境，剩下的只有就地被歼或就地和平解决一途。毛主席的军事战略、策略与指挥的卓越、非凡，使当时在敌方身处指挥首脑地位的傅先生及其周围负实际责任的一些人，在其觉悟日益提高的基础上，对毛主席更感崇敬，莫不折服。至此，内因与条件皆已成熟，瓜熟蒂落，北平就要解放了，而傅先生以及我们这些跟随他多年的部属也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归宿。

历史新篇章的开始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傅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办法》的条文。与会者有李世杰、梁述哉、张濯清、郭宗汾和蒋的两个兵团司令石觉和李文。傅先生先叫我念十四条条文，然后征求意见。石、李不表态，却狡猾地说：“我们说不出什么意见，只是克俊你的部下有意见。”我笑道：“我一个文职，何来部下？”两人说：“我们部队的政工处长不都属你政工处管的人吗？他们有意见。”他俩以此作梗，以为得计。这时，正好到了开饭时间，傅先生应机说：“先吃饭吧，饭后再议。”我乘他们用饭时的间隙，立即让人分头电话通知师以上政工处长十五分钟内必须到勤政殿集合。有关人员如时到齐后，我即宣读了十四条条文，问有何意见。大家绝大多数赞同，但不出所料，只有石、李两兵团的政工处长提出意见，要求能放他们走。我当即作了处理，严肃地答复道：“不愿留下要走，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要保证你的部队不出事，把工作做好，不伤

一人，不放一枪，不缴一物，遵守纪律，圆满实施十四条的规定之后，我保证请傅总司令把你们送走，保证你们的安全。”二人无言，表示满意。散会之后，我回到傅处，这时各人用饭已毕。傅先生见我进来，问道：“是否继续开会？”我对他笑了笑，傅先生便对众人说：“好吧，继续开会吧。”石、李还是坚持饭前的话。于是我笑道：“没有问题，各处长均赞同。”随即让卫士要石、李部政工处长的电话，两人不知何意，我说：“请二位直接问各自的政工处长。”两人表示诧异，我便将他们用饭间的事在会上复述了一遍。傅先生说：“好嘛，好嘛。”石、李也就说：“既如此，也就不必接电话了。”傅先生再问李、石两人，才答道“同意条文，但也要求能走。”傅先生当即说：“可以，可以走，我给你作保证，但条件一样，要把事情办妥。”于是十四条正式下达到各部，二十二日正式见报。

二十一日，周北峰来电说他陪陶铸和徐冰、戎子和三同志于当日下午从朝阳门进城。我去迎接，但候至傍晚没有接到。我回到联谊处，得知他们已经到了。原来他们与十三军的张参谋长联系，由周北峰陪同进城了。当晚，陶铸同志和傅先生又进一步研究了城内部队开出就编的日期、次序、地点和整编计划，同时磋商了双方成立联合办事处的各项细节，以及处理军队改编、军事、后勤、工矿企业、军政机关移交等等事宜。按照这次确定的计划，城内原有部队改于二十六日开出城外各指定地点候编（原订为二十二日）。傅派其第三处长雷立法与平津前线联合司令部作战处长苏静于次日协商了具体实施办法下达部队照办。傅的骑四师刘春方部首先开出，暂编一〇四军军长安春山副军长王建业部殿后开出。

二十八日，我陪着傅先生还有原北平市长刘瑶章和卫士一人

乘车自复兴门回到新北京傅的原来总部。沿途进城的解放军和民工，络绎不绝，路上虽然十分拥挤，但很有秩序，举目一派热烈欢畅、繁忙紧张的景象。我们的车停停走走，但沿途未碰到任何阻拦和讯问。

一月三十一日，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北平，这个古老的名城从此翻开了它历史的新篇章。至此，平津战役胜利结束。此役除塘沽守敌五万余人由海上逃跑外，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军队五十二万余人，创造了著名的“北平方式”，成为以后和平解放湖南、四川、云南、新疆的范例。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徐冰准备了车辆接叶帅进城，组织联合办事处。按事先的协议，主任委员是叶帅，副主任委员是郭宗汾，委员之中，解放军方面为陶铸、徐冰、戎子和，傅作义方面为周北峰、焦实斋，其他人员还有崔载之等。联合办事处的任务是办理部队的改编及傅部军政干部的处理以及各部队、机关、厂矿、企业等完整的移交。在二月里部队的改编工作基本完成，在联合办事处举行了部队指挥权移交的仪式。平津前线联合指挥部的负责同志均出席了，还有部队师以上干部均参加。平津前线部队负责人叶帅、聂帅、罗荣桓、薄一波、林彪等都讲了话，大意是说，部队改编顺利，和平解放方式好，傅将军操劳不少；并指出改编就绪只是新的开始，今后部队民主运动中，干部的改造还要经历一个过程，大家要消除顾虑，协同进行。傅也讲了话，说部属过去跟着他走错了路，应由他负责，今天终于走上了人民的道路，望大家忠诚老实，勤勤恳恳，服从上级指示，完成当前的使命。

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一贯教诲、关切

和党的政策的伟大作用

树有本末，水有源流。推本溯源，北平和平解放得以实现是有其久远原因的。从纵的方面来分析，可以说早在一九三六年冬傅作义先生率部克服百灵庙毛主席派慰问团来绥时就播下了种子；而经周总理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傅先生决定守太原城时赠言勉励，使之萌发。接着数十位共产党员帮助傅先生建立部队的政治工作，更使它滋长繁茂。虽曾一度误向，追随蒋帮，几毁前荣，但幸迷途知返，更有毛主席的英明战略战术的决策和运用，终于结出了人民革命胜利的硕果。从横的方面一个侧面说，北平和平解放前，由于傅先生的家眷分在重庆和兰州，这就成为他在主要矛盾解决之后思想上的郁虑，因而影响到在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许多原来设想的主动要做得更好的事情都顾虑重重，而被动未做，或做了一些也不够圆满，引以为憾。然而他的这些为我深知的内忧、顾虑与憾事，终于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气魄和周总理的一贯教诲、关切和党的政策的伟大作用下，都先后消释了。

一九四九年二月（大概是中旬），陶铸与周北峰同到西郊傅先生住处，给傅先生和我各赠送了一套《毛选》（东北版），还有《曾国藩是刽子手》以及一些关于党的政策的书籍，随后华北局又赠了几套《干部必读》，这对我们在一起学习、启发思想有很大的帮助。

二月二十一日，出乎我们的意料，陶铸同志来通知说毛主席要

接见傅先生和邓宝珊先生，并允许傅先生带一名随员。回京后，傅先生以极其感激崇敬的心情，详细地把这次难忘的接见向我讲过”。他和邓宝珊先生于二十二日乘飞机到石家庄后，换车来到西柏坡。当晚毛主席便亲自来到住处看望他们。一见面，毛主席亲切地双手握住傅先生的手愉快、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家，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说到对原傅部人员的政策时，毛主席说：“我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傅先生说：“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呢？”毛主席说：“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其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嘛。这些人我们以后还要用哩！”说到绥远问题，毛主席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的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对于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但主要的是要过好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以后土改关、民主改革，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等就好过了。”毛主席的这些亲切教诲，使傅先生感到极大的鼓励，疑团顿释。

毛主席第一次接见傅作义先生时所说的话，很快都一一实现了，这使傅先生对毛主席的敬仰和敬佩、感激之情，油然而增。

3月间，潘纪文同志自绥来京，常来见面。旧友重逢，极为融洽，思想启发帮助颇多。

3月下旬，原傅部被俘的将级人员全部放回。傅在西郊原住处接见了他们，向他们传达了毛主席接见时讲的话，并说：“过去我把你们领到错路上去了，由我负责；今天总算是走到正道上来了”。

了！”傅先生勉励他们从今以后，一定要很好地听共产党的安排和好好工作。使傅先生尤为感动的是，党和毛主席对张家口、新保安、怀来、天津等地解放战争中的被俘人员，也一律予以宽大处理，陆续全部释放，送回北平。华北局和军区又安排了专列车把他们转送到绥远。这些人多数以后参加了绥远“九·一九”起义。起义后，有的还被任命为由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干部，尔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的行列。

与此同时，根据北平联合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同志指示，派解放军的张科长并以傅先生原总部的政工处副处长由竹生、第一处管干部眷属的科长、经委会的会计等前往天津，对原傅部所属各部队干部眷属，子弟学校，拨粮拨款，计口发放。临走时，陶铸、戎子和同志接见了去津人员并讲了话，要求务必把这一件事搞好，以巩固北平和平解放成果和利于绥远起义。最后又分别拨车把一些眷属送到归绥和北平南郊黄村，以使他们家人团聚。

党和毛主席对在北平和平解放的原傅所属军政人员、干部，在处理上均实行既往不咎、宽大处理的政策，采取团结、教育、改造、使用的方针，按起义部队待遇，自起义之日起，军人即为人民解放军干部，即为革命干部，其家属即为革命军人或革命干部之家属。这是在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十四条条文中没有的。所有受编干部均按部门先住入招待所，按照（一）继续工作，（二）参加学习，（三）回乡生产三项志愿自由选报。凡志愿回乡人员发给路条、路费及所带财物的证明，此外还发给“参加北平和平解放有功，回家后给予土地房屋使能参加生产”的起义证明。凡志愿工作或参加学习的人，也都按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给予极大信任，分别做了妥善的安置。其它机关、工厂、企业、事业单位的旧人员，在接收过程中也大体上做了同样的处

理。接着，部队进行了民主整军运动，扫除了反革命遗迹，参加了南下或解放西北的光荣任务，以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的行列，逐步使整个部队解放军化。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先生自感要对解放战争时期的罪责负责，表示愿意承受人民的惩处，请求投案。毛主席不但不咎既往，反而分别多次地在共产党员和群众中替傅作义先生做工作，而且一直给予最大的信任，对傅先生各方面均关怀备至。

一九四九年三月，党中央迁到北京。毛主席在香山又一次接见了傅先生，教诲、关切殊多。三月二十五日下午，毛主席在西苑检阅人民解放军，邀傅先生参加了仪式。看到用缴获的美国机械化装备武装起来的强大的人民武装，傅先生深感快慰。这天，傅先生又收到毛主席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电的复电，在电文中，毛主席又一次对傅先生给予很大的鼓励。电文是毛主席亲笔写的。一九七七年傅作义夫人刘芸生已将其交李金德同志复印了。据我当时看过今天能回忆起的。毛主席在复电中有“贵将军在北平和平解放中，不无劳绩”。在复电末尾有“贵将军并愿为人民服务，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等语。

傅先生一直以自己未能组织隆重的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的仪式以及人民联欢活动引为憾事。为了表示自己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激心情以及对就要诞生的新中国的热烈情感，傅先生在西城（小酱坊胡同）住处宴请在京的党政领导同志，当时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欣然出席。傅先生又宴请了在京的民主人士。这些活动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傅先生当时的兴奋愉快的心境。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随邓宝珊先生于四月间到北京饭店与罗荣桓同志协商后，又由李井泉、张友渔、潘纪文等同志和我及

周北峰、阎又文等几次研究讨论绥远和平解放问题。六月中，华北局派我赴绥，不久，潘纪文、鲁志浩等同志也带了一批工作人员来到归绥，帮助董其武先生组织绥远起义。当时绥远局面很复杂，由各地流入绥远的人员也很多，特务横行，土匪猖獗。因此我在绥给傅先生发了一个电报，说绥远的问题“非钧座亲来不能处理”。傅先生于是把自己的意见及我的电文通过华北局报告了毛主席。在我回京汇报后，八月初的一天晚上，薄一波同志通知我说，毛主席要接见傅、我和阎又文三人。在中南海丰泽园东屋，我们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一面和傅先生握手一面说：“你好，宜生先生。”当傅先生把我和阎向毛主席介绍后，我幸福地和毛主席握着手，毛主席说：“哦，你就是王明德？你就是去绥远回来的？划界线这件事，反而给董其武他们造成困难了，国民党不给经费了。”接着对傅先生说：“宜生，你去解决，你们也一同去，都去，去帮助，都有好处。”让傅先生亲自到绥远，解决绥远问题，体现了毛主席对傅先生的最大信任、最透彻的了解和周到的关怀。北京军区安排了专车护送傅先生入绥，并带了一大笔现款给邓宝珊、董其武部作军饷，从而顺利地实现了绥远“九·一九”起义。当傅先生到了绥远，蒋介石、李宗仁还梦想拉拢他到南方去。在此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傅先生在重庆的夫人及子女等因此得以离渝到了香港，几经转折终于回到了人民的首都北京。而在兰的家属也得以到了绥远。毛主席的这一英明周到的安排，不仅使绥远起义能顺利地实现，也对傅先生的眷属拯救于险境，得到新的生命。

对毛主席亲切的关怀，傅先生都深深铭记心间。解放后，全国第一届运动会在天坛举行时毛主席亲临观看。中途，毛主席走到傅先生旁边说：“宜生，到外面走走吧。”傅先生陪着毛主席

走出会场，走到祈年殿时，毛主席风趣幽默地指着祈年殿上的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为阻止蒋介石派飞机运走他的精锐武器和一批亲信干部，而被城外解放军炮火轰坏、解放后修复的一角说：“宜生，你看这一块我们补得好不好？”傅先生以感激的心情会意地笑了笑。阴历五月初五日傅先生的生日。一九五一年阴历五月初五这天，毛主席又特意叫薄一波同志“请华北的几个人来吃饭”。进饭时，毛主席谈笑风生，风趣幽默，使傅先生更感觉到温暖和亲切。饭后回来，傅先生对我说：毛主席真细心，真伟大，令人钦敬之至！

周总理代表共产党和毛主席，更无时不给傅先生周到、细致的关怀和谆谆的教诲。每年春节，周总理必偕邓颖超大姐到傅家看望。甚至在一九七三年周总理已患癌症，这年春节仍亲自前来。尤为令人感动的是，一九七四年傅作义先生确诊为癌症，周总理手术后十分虚弱，还是毫不顾自己，又亲到傅先生住所对他进行安慰。是年四月十八日，傅作义先生病危。周总理又一次到北京医院去看望，当时傅已神志迷糊，我们敬爱的总理就挨近傅的耳边说：“毛主席叫我来看看你啦，说你对人民立了最大最大的功！”傅先生会意地嘴唇动了动。翌日下午一时四十分，傅作义先生即逝世了！李金德同志立即打来电话，我同董其武急至北京医院太平间。看到傅作义先生遗体安详如睡，我们先向遗体三鞠躬致敬。这时，我想到我们同傅多年所经历的坎坷曲折的历史道路，今天总算得到了光荣正确的归宿。然后环绕遗体，抚摸其手和头部，顿时哀痛至极，感到神若失而心欲碎，愿多留反急离去！当晚我犯病入院。二十二日正式向遗体告别时，我因被医生劝阻未去，不料这竟成为永诀了！但是二十三日傅作义先生的追悼会，我力争出院去参加了。追悼会由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带病主持，由

敬爱的叶帅致悼词，对傅的抗日战争和北平和平解放以及解放后傅的政治活动与工作均作了极高的评价。凡与会的傅的亲友和旧日部属莫不感到对傅和自己都是一种殊荣！

解放后，傅先生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信任和重用，解放初正式发表的给傅先生的职位便有七项：全国政协特邀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水利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等。

党和国家不但对傅先生如此关怀备至，即对于一般起义人员也按照一贯方针妥善安置，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给予关怀，使能各得其所，各尽所能，对人民做出贡献。对于原傅部人员的安置、上访尤为重视。周总理曾亲自委托薄一波同志召集有关部门处理他们在生活上的困难问题，并指定专人（平杰三，高登榜和我）处理他们的信件。受惠的干部莫不感激鼓舞，竭力工作，为人民服务。

有了党和人民的关怀，傅先生对其原所部的干部的安排也就放心了，解放初，傅先生便把原所部的干部互助社的福利基金三百余万元，除用了其中四十万元以集体名义作为抗美援朝的爱国公债外，在一九六二年困难时期全部上交给国家，国家清还回的公债款，在他最后入医院前一天，傅先生也坚决全部交给国务院了。

解放后，傅先生以满腔的爱国热忱为建设新中国和保卫新中国而奋斗。一九五〇年，他坚决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当时存在一股“崇美、亲美、恐美”思想，在共产党内外都曾有人反对进行这场伟大斗争。傅先生以他亲身的阅历说明美帝的军事力量并不可怕。他坚定地相信有毛主席的英明军事战略部署，有我革命军队的高昂的士气，什

么美国王牌军队都不在话下，并提出要求让绥远的两个军参加抗美援朝。这个请求立即得到了党和毛主席的批准。这个行动，既利于加速绥远地区解放区化的进程，而且经过民主运动、“三反”、“五反”的补课和抗美援朝的锻炼，这支部队也完全解放军化了。

参加革命后，傅先生担任水利部和水利电力部部长，多年来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努力贯彻执行党的有关方针、政策。他在工作中很重视亲自做调查研究工作，为掌握第一手材料，经常下去视察工作，跋山涉水，不辞劳苦。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淮河、海河等许多水利工地，几乎都有过他的足迹。那里发生严重的洪水火情，他都亲赴抗洪抢险第一线。傅作义先生通过工作，在深入群众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和共产党的伟大。他常说：我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能够亲身参加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虚心向工人学习，向农民学习，觉得非常幸运，非常兴奋。

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问我国。在欢迎宴会上，周总理向尼克松介绍了傅先生，说道：“这位就是傅作义将军，他为中国人民立了最大的功劳。”傅先生把党和人民给自己这样高度的表彰，作为自己继续前进的动力，更加兢兢业业地学习、工作。他一向十分关心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宴会后，便把自己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骤、方针、政策问题的见解写了一封致尼克松的长信，通过中央转达，为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尽了一份力量。

二十多年来，傅作义先生关怀祖国的统一，始终关怀台湾同胞和台湾各方面的故旧，盼望台湾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傅作义先生在他长期的经历中，能不断思考斗争，而于关系到国家、民族、

人民的前途利害的关键时刻，理智地分析了主客观的因素，为祖国的和平统一、繁荣昌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寻找到一个人生真正意义的结晶和归宿，也为他的部属带来了回到人民怀抱的光明前途。傅先生生前，在谈到他所走过的道路的时候，无论在文字上和口头上经常都讲以下的话：“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国家遭蹂躏，民族受压迫，人民受欺凌，是我们中华民族痛苦耻辱的一百多年。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先进人物，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先生，都曾经从各自阶级的感受出发，努力来解除这个痛苦耻辱，但他们都失败了。但是我们亲爱的祖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大陆解放仅仅二十多年的短短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把一个贫穷落后、受外强欺压的旧中国，变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从而愈来愈认识到自己确实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现在，傅先生故去已十年了，他在世时常以自己衷心警悟的真理向台湾当局频频忠告。傅作义先生走过的光明大道，也是今天的台湾当局应当走的，而且最终必定要走的光明大道。希望你们记取傅作义先生的忠告，也走回归祖国的光明大道吧！

（一九七九年）

红格尔图抗日战役前后

李 忠 孚

绥东红格尔图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充任傅作义部三十五军二一八旅军需主任（旅长董其武担任前线副指挥），参加了这次战役。但时隔多年，许多事情已记不清楚了，特别是敌人方面的材料，知道得更少。在撰此稿前，我曾访问了当时参战的有关人员以及王子修夫人徐爱锦女士，获得不少帮助。稿成后还送请董其武先生审阅过，但仍恐有不妥的地方，请身临其事者，惠予补充和纠正。

绥东红格尔图抗日战役，发生于一九三六年冬。“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我东北四省，步步深入，向华北扩张，并把侵略矛头指向西蒙（伊、乌两盟及阿拉善、额济纳两旗），首先妄图夺取绥远。为此，出卖祖国、出卖民族利益的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就成了日本首先拉拢豢养的对象。

德王是一个反动、狂妄的野心家，他以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和苏尼特右旗札萨克的地位，乘“九·一八”事变，国家灾难频仍之秋，大肆活动。开始打着“蒙古自治运动”的旗帜，操纵百灵庙“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其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下，利用蒋介石反动政府对日妥协投降的政策，大搞分裂祖国的勾当；

继而在日寇扶植下，又在化德成立“蒙古军政府”和“蒙古军总司令部”，搜罗蒙古青年，扩充军队，充作日本的侵略工具。一九三六年九月，他把从各盟旗搜罗的蒙古青年编成伪军六个骑兵师，连同李守信从热河带来的三个伪骑兵师，合编成两个骑兵团，一个警卫师和一个炮兵团。德王亲任蒙古军总司令并兼第二军军长，辖伪五、六、七、八师，李守信任伪副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辖伪一、二、三师和伪新编第四师。第九师为警卫师。每师一千二百余人，共一万二、三千人。另外，日本驻化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还从冀东伪组织挪出经费八十万元（有说一百八十万元），收买了汉奸王英、王子修、安华亭、石玉山、金宪章、葛子厚、赵奎阁等背叛祖国的地方团队和土匪杂牌队伍，约六、七千人，编成所谓“大汉义军”，在商都设伪司令部，王英为总司令，雷中田为副司令，归田中隆吉直接统辖。

一九三五年夏，日本根据《何梅协定》，逼令蒋介石取消了绥远省党部，并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建立特务机关——“羽山公馆”（在旧城西菜园胡老虎两个大院内），派羽山喜郎为特务机关长。羽山到绥后，进行了许多捣乱、破坏活动。傅作义将军对此采取了相应的办法，很大程度上削弱和限制了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由于日本特务机关的故意制造事端，到处破坏捣乱，激起了军民更加高涨的反日情绪，这就为红格尔图战役，创造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当时绥远的形势十分艰危，而内部情形又极复杂。蒋介石、阎锡山对傅怀有戒心。傅在这种环境中，外受日伪压迫，内受阎蒋排挤。但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矛头指向绥远时，傅作义受全国人民高昂的抗日情绪影响，采取了坚决保卫绥远的抵抗政策，成立了指挥部，积极准备抵抗日军的侵犯。

一九三六年十月，日本帝国主义完成了对绥远入侵的军事部署，令李守信伪蒙古第一军部署于尚义、兴和等县边境，德王伪蒙古第二军部署于土木尔台至百灵庙之线，调王英“大汉义军”集结于商都附近，号称大军四万。并派伪蒙古军司令部代参谋长王宗洛（特克希卜彦）联络王英的“大汉义军”，协同作战。部署就绪后，于十一月二日再次开始向红格尔图发动进攻，并企图由百灵庙与兴和两翼配合，一举占领归绥。日本驻化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直接指挥作战，命令王英“大汉义军”为前锋，李守信伪蒙古军第二师为预备队，王英的伪司令部进驻红格尔图东北之土城子村，以副司令张万庆为前线指挥，主攻兵力号称四万余人，日寇还派飞机六架和炮兵配合行动。战斗爆发后，十一月五日，德王以“蒙政会”的名义，正式发出向傅作义兴师问罪的通电，指责傅作义破坏蒙古地方自治，借作掩饰。

红格尔图是陶林（今察右中旗）县境的一个小村，位于陶林县城东北一百六十华里处，居民百余户，是绥远东北的门户，也是敌伪从绥东进攻绥远省会——归绥的捷径，为商都通百灵庙的中间点。原驻有晋绥军骑兵第一师之卢、林两个骑兵连防守。战事发生后，卢、林两连协同当地团队八十余人，在该团张团附指挥下，深沟高垒，奋勇抵抗，日伪屡次猛攻均被击退。在敌人四面包围补给断绝的情况下，连日作战，弹药已感不足，人民便搜集土火药，自制地雷，埋在阵地前面，炸死不少敌人。在敌伪飞机、大炮协同配合猛烈攻击下，军民坚守七昼夜，敌伪终未得逞。傅作义将军得报告后，密召驻平地泉（即集宁）之骑兵第一师师长彭毓斌，步兵第二一八旅旅长董其武到绥，面授机宜，任彭毓斌为前方总指挥，董其武为副指挥，指出这次作战关系重大，只能胜，不能败。为保守军事秘密，避免绥远的日本特务机

关侦知，采取快速运兵法，省垣部队，一概不动，密派汽车队分赴卓资山、平地泉两地听候使用，但未说明任务。彭、董两指挥官返防后，于十一月六日晚，电话命令各参战部队于十一月八日夜到达红格尔图南之丹岱沟一带集结待命，亦未说明任务。参战部队计有董其武旅驻卓资山的李作栋团、孙兰峰二一一旅驻旗下营之王雷震团和阎锡山的第六十八师李服膺师驻大同之李钟颐团、骑兵第一师的周团、炮兵二十五团张潜团的杨营。分别由卓资山、平地泉两地乘汽车快速开进前方（王雷震团和李钟颐团先乘火车到平地泉后改乘汽车）。于十一月八日夜十二时，彭、董两指挥官在红格尔图南的十二苏木召开了各部队长军事会议，宣布了作战命令。决定先打红格尔图东北之土城子（伪王英司令部所在地），王团从土城子西面进攻，李团从东面进攻，李钟颐团作预备队，均配附炮兵，骑兵担负切断、搜索和追击任务。拂晓前开始进攻后，敌人顽强抵抗，战斗激烈。红格尔图守军，乘势出击，天明后，敌机轮番轰炸、扫射助战。九日上午十时许，我军王团先攻进土城子，敌人不支，全线仓皇溃退，敌机掩护其退却，红格尔图遂先解围。我军乘胜追击至统领地，已下午二时，步兵停止追击，骑兵继续搜索。这次战役敌伪伤亡甚大，极为狼狈。俘获战利品很多，汉奸王英自乘的大马车也顾不上带走，被我缴获，而我军也有伤亡。战事结束后，由李钟颐团接替防守红格尔图，卢、林两连，调离休整。

红格尔图战役前，日本帝国主义原打算以伪蒙军配合飞机大炮，壮大声势，向红格尔图猛攻，压迫绥远省会，然后从百灵庙、兴和两翼包围，一举击退傅作义部队，唾手夺取绥远。不想如意算盘打错，战争一开始就遭到傅部坚强抵抗和迎头痛击，吃了大败仗。田中隆吉和德王，对此甚为恐慌，深恐傅军乘胜进

击，急调军队，加强商都和化德的防务，以巩固其老巢。调王英“大汉义军”的石玉山、金宪章、葛子厚、赵奎阁等部，开往百灵庙；王子修、安华亭部开往尚义、兴和南边之南壕堑，积极准备，以图再犯。

红格尔图战役的结果，促使王英的“大汉义军”分崩离析。

“大汉义军”全系汉人，来源复杂，士兵不肯为汉奸和日本帝国主义卖命。红格尔图战役失败，军心更为动摇，而这些汉奸头子们，本想依靠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其势力，卖国求荣。可是充当日伪军后，日本军官对他们蛮横无理，如同对待奴隶一般，也渐萌脱离意念。红格尔图战役失败，进一步促使他们下定脱离日本主子的决心。因而在百灵庙战役之后，终于发生了王英“大汉义军”的王子修、安华亭两部，在南壕堑一带同时反正之举。其经过是这样的：在一九三六年秋，王子修住张家口时，曾与其同乡翟中玉（翟当时在张家口经商，王子修在张宗昌主山东时曾任鲁东民兵总司令，其时翟是王的部下）秘密商量，如有机会即脱离伪军，返回祖国。翟为其反正竭力奔走。一九三六年十月末（红格尔图战役爆发前），王子修的夫人徐爱锦（任王部军医处护士）到张家口为部队购买药品，翟告她说，王子修秋天谈的事，已与绥远省政府驻张家口办事处处长刘云峰谈过，于是偕徐见刘作了进一步的商谈。红格尔图战役结束后，王子修、安华亭两部开到商都南壕堑增防，徐返南壕堑防地后，把和刘云峰商谈情况告诉了王子修。王说：“现在看来，势在必走，我们既要弃暗投明，就不能多讲条件，你休息两天再去，一切由你完全负责。”次日晚，适安华亭访王，两人围着烟灯，安说：“咱们就这样窝囊下去吗？”王乘机问：“怎么，还要变变？”安说：“当然啰，当汉奸挨全国人骂，还受鬼子气，怎能长此下去呢？”王见安有心思变，便

说：“现在有点线索，请你嫂子谈谈。”徐爱锦遂把在张家口与刘云峰见面的情况告诉安，安即说：“走傅的路，我很同意，早已考虑过，因没有适当机会，未能进行，现在既有引线，就这样办，咱们要一致行动，要怎样都怎样，但是要特别谨慎，切不可泄漏风声，否则大事不成，反受其害，此事越快越好，免得夜长梦多。”安、王商定后，徐又到张家口同翟再见刘云峰，把安华亭一同反正是事告诉了刘。刘即向傅请示，徐住交通旅馆等候。这时张家口谣言很多，日本特务人员暗地活动频繁，刘恐发生意外，让徐搬到他的办事处暂住。过了几天，傅指示让徐亲到绥远面商，刘派人陪徐到绥。傅派蒙旗指导长官公署参赞石华岩和徐商谈。商定：编安华亭为新编第五旅，王子修为新编第六旅，在南壕堑反正，由傅派人会同兴和县长孟文仲联系办理并进行补给等等。计议妥当后，徐带任命状返回南壕堑防地复命。安、王两部遂继石玉山、金宪章之后，在南壕堑反正。至此，王英“大汉义军”土崩瓦解。

收复百灵庙的回忆

令 狐 里

一九三六年冬，我正任职傅作义部三十五军二一一旅司令部中尉通讯排长，收复百灵庙时又被指令为旅司令部直属部队（警卫排、通信排、小炮排、无线电台、宪兵队）的指挥官和战地执法队长，对于收复百灵庙资料的整理与回忆，作为我来说，当属义不容辞，兹就记忆所及并访问了和我同时参加该战役的一些同志后，写了这篇回忆，供史学研究参考，并请知情同志指正。

一九三三年夏，日寇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签定了所谓“塘沽协定”后，日寇到处设立特务机关，豢养民族败类，组织傀儡政权和军队。在冀东、察北六县落入日伪之手后，矛头立即指向了绥远。日寇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和卖国投敌的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共同策划了一个得到日寇关东军批准的侵略方案。傅先生针对这一险恶的阴谋及绥远当时的处境，本着“不惹事，不怕事”和“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方针以及祖国河山寸土不让的决心，遂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和十一月八日，击溃了日伪对红格尔图两次猖狂进犯，取得了绥东抗战的辉煌胜利。

在红格尔图战斗胜利结束后，傅先生在前线指挥所又下令绥

东参战部队，大部从前线后撤，同时电令在绥远的骑兵第二师师长孙长胜，步兵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转饬所部，开始行动，作好收复百灵庙的军事准备。

袭击百灵庙的作战部署

百灵庙位于原绥远省归绥（即呼和浩特市）西北三百三十多里处，地虽偏僻，但系国防战略要地，是乌兰察布盟素负盛名的召庙，为绥远省北部主要屏障之一。它是一个环山有水的盆地，共有九个口子可以出入，俗称九龙口。庙的正北八里许处即伪“蒙政委员会”所在地，西北七里有敌飞机场，伪蒙古军第七师穆克登宝部，分驻在东南口子以南以北的各个营房，还驻有不少日本特务人员，守备相当森严。敌伪数年苦心经营，使百灵庙成为他们进犯绥远的主要桥头阵地。

日伪迭次受挫于红格尔图后，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即增派日本军官二百余名，加强对伪军的控制与指挥，并拟派兵增援百灵庙、锡拉木伦庙（即大庙）以等待时机继续犯绥。但在敌人增援兵力未到之前，我军又先敌一着，开始了收复百灵庙的军事行动。截至十一月二十日，山南部队即已转入山后，而山后部队大部都正在开赴指定地点的运行中。就在当天正午，傅作义将军由平地泉返回归绥，征尘未拂，立即招集孙长胜、孙兰峰等到军司令部告以新的情况谓：“敌以汽车装载大批军队，由后草地向百灵庙增援，计其行程二十四日可到庙，我应利用这一良机，在敌增援部队未到之前，先期歼灭守庙之敌，进而打击其增援部队，以收各个歼灭之效。”袭击百灵庙的命令下达后，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参谋长袁庆荣于十一月二十一日首先命令驻在武川的四二

一团刘景新部，在二十二日拂晓前，由武川开拔，向百灵庙东南二份子（距武川约百余里）进发，准备在行军途中由汽车接运，命令四一九团派步兵一个连，在二十二日拂晓前，到达归绥车站北的麻花板村集结，负责掩护炮兵，随旅直属部队乘汽车前进。该团其余部队在二十三日晚，由驻地小教场乘车直开东达乌素待命。随军出发的旅部各个单位人员，统归旅副官长孟昭第指挥，留守人员归副官主任史清选负责。前进时旅直属部队一一特务排（即警卫排）、通讯排、无线电台、小炮排、宪兵队统归通讯排长令狐里指挥。旅指挥所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凌晨五时，由归绥新城吕祖庙街乘车出发，到归绥车站北端麻花板村会合炮兵掩护队，旅直各部，按行军序列向绥北武川进发。行至蜈蚣坝顶，天已大亮，黄昏前到达了二份子。是夜三十五军副军长曾延毅亦进驻武川，负责接受报告，传达意图，指挥作战。

旅指挥所于当日下午四时许到达二份子后，先用空车返回接运途中部队，在当天下午六时许，各部队都已到达集结地点，休息吃饭，各部队长齐集旅指挥所接受命令，当时到会的有骑八团团团长刘应凯、补充第一团团团长刘效增、四一九团团团长张成义、四二一团团长刘景新、炮兵营长李春元，在孙长胜师长、孙兰峰旅长主持下，根据既定方案，逐条研究，缜密计划至夜十二时，最后决定了军队区分及集结地点和集结完毕的时间，同时下达了战斗命令，要旨如下：

一、百灵庙现有敌伪三千余人，尚有大批敌军正向庙方增援。

二、我军以收复百灵庙，歼灭守庙敌军为目的，向敌围袭。

三、刘应凯团长指挥骑兵纵队，以一部由庙北标高1634迄西北大道间，对庙北之敌围攻，主力先解决蒙政会及其附近之敌，

并负责追击被我击溃向东北逃窜之敌。

四、刘效增团长率左纵队，左接骑兵纵队，右至标高1651对庙西南围攻。

五、张成义团长率中央纵队，左接刘效增团，右接标高1644对庙东南围攻。

六、九十一团第三营谢兰思营长，率右纵队左接中央纵队，右接骑兵纵队由庙东北角围攻。

七、刘景新团长指挥预备队，先派一营协助中央纵队，对庙东蒙古营盘之敌先行袭击，尔后仍改为预备队，位于庙之东南待命。

八、炮兵李春元营长，指挥炮兵队，协同主攻方面之步兵，在庙东南选择阵地，击灭顽抗之敌，在战斗前归预备队刘景新团长指挥。

九、小炮队以能掩护东方主攻之战斗并对庙东南口预期出现之敌得以阻击，于庙东南口选择阵地，准备射击，在战斗前归预备队刘景新团长指挥。

十、各部队均于二十三日晚十时前到达攻击准备位置，夜十二时开始接近庙敌行动。

十一、在庙那面进攻之部队，到庙附近仍应停于那面，拂晓前完成包围，天明开始进攻。

当晚十时前后，二份子指挥所接到各部队报告，均已按指定地点集结完毕。

袭击百灵庙的战斗

二十三日夜晚，由二份子到百灵庙一百多里的地面上，覆盖着

没脚脖子的厚雪，在此广阔原野上，仅有的一条车马通行大道，也被大雪覆盖，再加上朔风劲吹，雪花飞舞，我军行动又在夜间，无法认路，只有依靠“指北针”和响导们刨检牛粪马粪来识别方向。当时最大的耽心，就怕弄错方向在拂晓前找不到敌人，所以每向前推进一段，都要用指北针来对照方向。为了不透出光亮，取亮方法是以两三个人用皮袄顶在头上围成帐篷式样，挡风遮雪，来书写文件和收发电报。我记得傅作义将军从归绥来电不断询问前方进展情况，孙兰峰旅长、袁庆荣参谋长总以正在向前推进作答，实际上这两位战场最高指挥官，还正在忙于弄清方向的措施中。当时的联络方法，除用电台外，就是利用传骑。第四二一团的骑兵连长刘丰初奉命派出的联络骑兵，都不能及时返归，一个连的战士即将派尽，仍无所获，不仅刘连长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就连旅长孙兰峰、参谋长袁庆荣，虽在塞北隆冬之夜，也都急得头上冒气，脸上淌汗。直至在庙周围发出机关枪声和手榴弹声，大致判知各部队的位置时，大家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放下了一条心，总算弄清了方向，找到了敌人，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愉快劲儿。旅长高兴地大声喊着：“小炮赶快发射信号表示位置！”小炮当即向空发射了红绿两色信号弹各二十发，表示旅的指挥所位置。向庙方推进之我各纵队，也相继发出了表示自己位置的红色信号弹，开始了全面行动。霎时间，庙的周围，山上山下都象开了锅似的，机关枪、手榴弹声响成一片。就在此时，我四二一团先头部队第三连，受到百灵庙东南山口守敌轻重火力的阻击，中尉排长蔡玉庆及先头的装甲车司机均受重伤，战士伤亡三十余名，前进受挫。我中央纵队之四一九团团团长张成义指挥的第一营营长张惠源，在四二一团三连张振基连的协助下，也击溃了蒙古营盘之敌，第二营吴烈昌营已经占领了南山

的第一层山，同时也接到了骑探回报，侧后并无敌情，接着即见正西、东北各处发出侧后无敌情的火光信号。

二十四日午夜一时，环庙山中正在激战，我四一九团已由第二层山头进至第三层山头，左右纵队亦皆有进展，总预备队也在逐步向前推进，与我四一九团取得了联络。二时至四时各部入山已深，敌我枪声炮声手掷弹声，响彻深山原野，四时以后月沉夜暗，全线战况至为混沌，被我遮断围困之敌，成了我军前进的障碍，也使战场形势形成了犬牙交错的状态。六时前后，张成义团长指挥第三营的两个连的预备队，扫除了一、二营后的残存顽抗之敌，继续向两营中间推进，候机决战。此时孙长胜和孙兰峰两位指挥官，已伤炮兵竭力向前推进，并命四二一团刘景新团长，率领预备队一个营和装甲车队向东南角推进，支援张团战斗，以求决战。旅指挥所尾随预备队向前推进。

二十四日早晨七时，天色已亮，战斗更为激烈，除主攻方面的四一九团在我炮兵掩护下，继续向纵深发展外，左、右纵队亦都与敌展开搏斗。张团一营的机关枪连长田培育、五连中尉排长杨质俭先后牺牲。为了争取时间，预备队刘景新团长指挥张振基连，再次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向敌猛冲，最前面的一辆装甲车被敌击毁，司机一名受伤一名阵亡。在此紧急关头，孙兰峰旅长乃集合所有预备队，满乘汽车，仍以装甲车为先导，继续沿东南山口向敌突破，直捣河西敌人在召庙内的主要阵地。其余各部，均以火力支援我军的继续突破，并迅速摧毁了河东敌伪各个营房之敌，占领了河东各个高地，控制了战场全局。激战中，装甲车司机张仰贤，在车被击毁，左臂受伤的情况下，奋不顾身拉出另一辆车上司机的尸体，继续开动马力，向敌冲锋，终于胜利地完成了突击的任务。

日寇长期派驻百灵庙的特务机关长胜岛角芳和伪蒙古军第二师顾问烟草谷，还有伪蒙古军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极力拼死挣扎，妄图挽回败局，拔出战刀，亲自督战，并把他们认为是畏缩不前的一名伪军官，当众劈死，但也无法扭转战局。最后不得不抢先登车，向东北方向狼狈逃去。此时遥望庙北，“蒙政会”已经起火，估计是我骑兵纵队正在攻取“蒙政会”。

时至九时三十分左右，我张成义、刘景新两团长，各率所部，追击残敌已抵庙前，少数敌人仍欲依庙顽抗，在我大军威迫下，终于非歼即降，至十时前后，我前敌指挥官孙长胜、孙兰峰皆抵庙内，分别命令部队把守要路，占据山岗，追捕残敌，清扫战场，并把胜利的喜信电报归绥指挥部。当时已经得知乌兰花和大庙以东均未发现敌情。在此刚刚赢得胜利未曾喘一口气的同时，又接到了傅作义将军从归绥发来的电报，命令进入百灵庙的孙长胜、孙兰峰两位指挥官，按照预定计划，除留步兵一个营附无线电一台，协同骑兵两个连，作为守庙部队外，其余部队立即撤出百灵庙，各回原地，集结待命。

日伪反攻百灵庙

百灵庙本系日伪政治、军事的重要战略要地，被我收复后，必将使日本帝国主义和德穆楚克栋鲁普几年来苦心经营、尚未脱胎的所谓“蒙古王国”彻底破产，日伪自然不甘罢休。所以就在我军计划收复百灵庙之始，即判知其必将反攻和报复，为了诱敌上钩，在我军收复百灵庙之当日，即将大部兵团撤出，以示空虚，引其来攻，以便就歼。果然二十八日晚，有汽车百余辆满载敌步兵，运至大庙后，车又东返，同时王英率其刚整顿补充后的

骑兵，亦由商都以北绕过土木尔台，经草地边沿，积极向西窜进。当傅作义将军与骑兵司令赵承绶、十九军军长王靖国，通过分析研究，判定敌伪对百灵庙将采取分进合击的策略后，傅先生遂部署如下：

一、骑兵二师师长孙长胜，率领该师三个团附山炮两门，进驻乌兰花，另以四二〇团（团长李恩温）附炮兵一连，乘坐汽车，随时准备支援骑兵战斗。

二、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指挥四二一团、补充第一团和炮兵两个连，小炮两门，除四二一团现在百灵庙内的一个营外，其余随时准备进入庙内。

三、四一九团附炮兵一连，在后厂汉次老为伏兵。

四、独立第七旅的两个团由卓资山开驻武川、哈乐各一个团待命。

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两天，王英已窜至陶林以北民地边沿黑山子一带。十二月一日拂晓，大庙又到汽车六十余辆，满载步炮部队，连同汽车均亦驻庙，判断敌人即将开始行动。此时，绥远指挥部命令孙兰峰旅长，率领预定部队当夜入庙；孙长胜师长率领该师之七、八两个团，迅速推进到乌兰花，该师之第四团由集宁经灰腾梁、大滩向乌兰花急进，截击王英向南窥窜。果于二日晚，百灵庙发现了敌情。

孙兰峰旅长指挥四二一团、补充第一团及炮兵部队进庙后，加强侦察，分配任务，在三日（旧历十月十九日）凌晨三时，即与反扑之敌展开了全面战斗，直至下午五时，孙兰峰旅长综合敌情认为：敌之一部经我射杀，伤亡过半，闻风丧胆，已无斗志，即决心当晚出击，命令刘效增团抽调精壮士兵四个连为袭击队，四二一团以原有之骑兵连，再将旅、团、营之马匹悉数集中，共

计五十余匹，编为一队，汽车两辆载兵四十余名，合编为追击队，分由骑兵连长刘丰初，第七连连长鲁乐山率领，均于晚七时出发，协同补充第一团的袭击队，对据守顽抗各点之敌痛击、围歼，并不失时机地追捕逃窜之敌，使其无一漏网。经我各部出击围歼，敌伪除就歼或投城外，尚有一部乘车东逃。正在这时，发现有敌骑百余，在我东面阵地前约七、八里处，以炽盛火力，掩护敌人的逃跑。经我袭击队与追击队协力配合，将敌击溃后，残敌亦向东北逃窜而去。我步兵追出四十余里，汽车追出六十余里，在一蒙古包里又逃出敌人二十余人，被我们当场击毙五名，余均逃散。在返回途中，鲁乐山连长所乘汽车一辆，被敌机炸毁幸未伤人，时已上午九时十分。

在二十四小时的激烈战斗中，彻底粉碎了敌人反攻百灵庙的企图，进一步歼灭、瓦解了敌伪部队，雷中田这个极力为日寇效力献媚的民族败类，也在这一战役中被击毙。

击溃王英匪部于乌兰花地区

十二月二日，在百灵庙我军与敌交战的同时，王英率部两千余众，窜至武川东北三眼井村一带，并继续向我库伦图村进犯。我骑兵第二师师长孙长胜率领七、八两团，星夜赶至乌兰花，马未停蹄即继续东进，至三日与敌先头部队遭遇于南厢村红房子一带，立即展开激烈战斗。通过数小时的猛烈战斗后，敌骑惨败，向正北四子王府以东逃窜而去，这次战斗日伪遭到严重损伤，我骑八团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为使敌人不能继续增援百灵庙，我军仍对逃敌猛追，始终与敌保持胶着状态。时至四日拂晓，傅先生在归绥指挥部根据东西（百灵庙与乌兰花）两面敌人受重创的

情况分析，认为敌之骑兵必将聚集于乌兰花以北草地一带，候机蠢动，正好给我军以聚歼的良机。遂令四二〇李思温团，立即开赴乌兰花归骑二师师长孙长胜指挥；命令四一九张成义团，由后厂汗此老推进侦察，在其以北民地边沿部署，待机歼敌；命令独立第七旅旅长马延寿，率所部两个团向乌兰花推进；命令三十五军副军长曾延毅进驻乌兰花就近指挥作战，相机进行策反工作。

时至六时，我独立七旅马延寿部，指挥所属两个团在乌兰花以北向敌紧追，我孙长胜师长率领该师及四二〇团，在黄草洼一带（四子王府以北）将匪截断。此时得悉王英指挥部驻小六号，经我军夜间围袭后，王英仓皇失措，仅带少数弁护卫队弃车乘马，落荒狼狈而逃。

收复大庙，金、石战场起义

通过绥东红格尔图、绥北百灵庙之战，大大地动摇了敌伪军心，特别是伪军中的中下级干部和士兵，既受屈辱于日寇，又受唾骂于国人，内心的自疚不可言喻，寻机反正，回归祖国的念头日深；再加我方入夏以来，深入进行策反工作，所以败退至大庙之敌，立足未稳，七日便有石玉山战场起义，八日金宪章率部来归，并将日本派在军中的顾问小滨大佐以下二十九人全部处死。驻在大庙伪蒙军第七师的残余部队亦尽被歼。我骑二师师长孙长胜命令李思温四二〇团相机进入了大庙。金、石两部即向乌兰花以北集结。十二月十日正式宣布收复大庙。曾延毅副军长亲自对反正部队点验讲话。从此绥北绥东日伪军一时远遁，消声匿迹了。傅作义将军本想乘胜收复商都，遂托阎锡山派驻绥远的联络参谋贾毓芝电阎请示，阎复电制止，并另派中校参谋赵世珍来绥密告

傅作义：“商都不属晋绥管辖，与百灵庙原属绥远不同，我们若攻商都，诚恐日方有所借口，会对晋绥不利。”傅作义对此，只好作罢。

汤、门挺进绥东，安、王同时反正

蒋介石为了掩盖国人耳目，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援绥抗日的压力下，不得不做出一些抗日姿态，遂于十一月下旬，派汤恩伯的十三军和门炳岳的骑七师，到达了大同、丰镇一带，以示加强绥境的防务。傅先生循汤之意，将绥东重要防区，交给十三军担任。詎于十二月十三日传来了西安事变的消息，为了防敌乘机再来向我进攻，遂令汤、门率部挺进至绥东前线南壕堑一带，以重兵威迫王英的残部，遂使王英匪部的安华亭、王子修两个旅长率部两千余人同时反正，开至兴和接受点编。

举国欢呼，庆祝胜利

百灵庙的收复和绥远抗战的全面胜利，大大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在举国欢腾纷纷莅绥庆祝胜利声中，全国各阶层人民，热烈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援绥抗日运动。特别是毛主席、朱总司令也发来了贺电，并派南汉宸同志来绥慰问。在隆冬零下三十余度的北国草原上，欢聚一堂，共庆收复失地的热烈情景，迄今仍然记忆犹新。

长城抗日战争中的怀柔战役

苗 玉 田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兵，侵占我东北三省。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对日军未加抵抗，率领几十万军队，从富饶广阔的东北原野退到关内。日本侵略军唾手而占据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曾几次发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宣言，深得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但蒋介石一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忍辱妥协，不抵抗政策，幻想依靠国际联盟的调停，使日本交还东北三省。日本帝国主义不但不接受国联的调停，反而最后退出国联，对中国进行更加肆无忌惮的侵略，进攻山海关，占领热河省，并向长城各口分路集兵，进一步把魔爪伸向华北。

此时全国人心激愤，舆论哗然，无不同声谴责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不抵抗主义。全国人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号召，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工人、学生及各界同胞请求中央政府对日宣战。蒋介石为了缓和舆论的谴责，逼迫张学良下野，张不得已乃引咎辞职。派亲日派何应钦继

张学良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负责华北军事。何应钦和蒋介石的主张是一致的，作为抵抗，暗作曲从。不久即与日寇在塘沽签订了停战协定。

一、傅作义请缨抗日出兵绥远

“九·一八”事变之后，傅作义即砥砺军民，共赴国难，经常在军民集会上发表抗日救国、反对妥协一类的主张。在学校和社会的各群众团体中，鼓励组织各种抗日宣传讲演，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以激发广大军民的抗日爱国热忱。在部队中，更以抗日救国教育为宗旨，从各方面向部队官兵进行抗日救国思想教育，如每日早晚点名时，让官兵高喊：“保卫祖国，誓雪国耻，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等口号。在军事训练中，完全以日本军队为假想敌人。如在进行刺枪教练时，绑扎草人，并在上面写上日寇字样，每天官兵均以愤怒之杀声，对之连刺数十枪。练习实弹射击时，靶板上也画着日本鬼子，对之进行瞄准射击。举行各种攻防战斗演习时，完全以日寇为假设敌人。按日军之惯用战术，拟出各种情况，举行演习，以此种种来激发官兵同仇敌忾和誓死抗日情绪。这是傅作义当时对于抗日所持的态度和决心。

一九三三年一月间，日本侵略者开始向山海关进攻。张学良、阎锡山联名声言抵抗。日寇占领山海关后，分别集结兵力，准备向热河进攻。傅作义便分电阎锡山、张学良、蒋介石等请缨杀敌，出兵抗日。在获得阎、张、蒋的许可后，遂将绥远省政府主席之职务交由建设厅长冯曦代理，并保荐七十师师长王靖国为绥远警备司令，负责省内军事责任，即将三十五军开赴抗日

前线待命。

何应钦负责华北军事之后，在长城各口布置防务。任命傅作义为第七军团总指挥，指挥五十九军、六十一军担任独石口方面的防务；杨杰为第九军团总指挥（后改为徐廷瑶代理），指挥徐廷瑶的第十七军（辖黄杰的第二师，关麟徵的第二十五师，刘戡的第八十三师），担任古北口方面的防务；宋哲元为第三军团总指挥，指挥第二十九军担任喜峰口方面的防务；商震的第三十二军担任冷口方面的防务。以这样一个防御计划，摆出了一副抗日的样子来应付和蒙哄全国人民。

二、傅军开驻张家口，担任独石口防务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傅作义亲率所部由绥远出师东进。到达张家口后，即组建第七军团，傅任军团总指挥，参谋长为陈炳谦。第七军团辖三个军，两个步兵军，一个骑兵军，骑兵军直接归北平军分会指挥，其次即部署独石口方面之防务。傅在名义上指挥两个步兵军，而实际上只有两个步兵师，除傅的基本部队三十五军的一个师外，另由山西拨来李服膺的一个师。当时的部队组成如下：（一）三十五军的七十三师战时编组为五十九军，军长傅作义兼，参谋长为苗玉田，辖二一〇旅（旅长叶启杰，四一九团团长张成义，四二〇团团长薄鑫）；二一一旅（旅长金中和，四二一团团长孙兰峰，四二二团团长马逢辰）；二一八旅（旅长曾延毅，四三五团团长苏开元，四三六团团长董其武）。（二）六十八师战时编为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辖：二〇〇旅（旅长刘馨馥）；二〇一旅（旅长李俊功）；二一三旅（旅长贾学明）。部队编组之后，即分别下达命令，部署防务：

令六十一军李服膺部开驻独石口、张北一带，阻击由热河进犯独石口之敌；令五十九军二一八旅开驻多伦，阻击由热河进犯多伦之敌（后由骑兵接防，该旅返回张家口）；令二一一旅进驻张家口和张北之间，沿长城红泥湾、鱼脊岭、两奶尖山等处，构筑国防工事；令二一〇旅在张家口附近构筑国防工事。并令各部队开驻指定地点后，即迅速加紧构筑防御工事，准备迎击进犯之敌。

三、古北口战事失利，傅作义部南调昌平

由于何应钦执行了蒋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消极抵抗政策，各部队的部署只是在长城各口摆一摆架子，希望日本帝国主义适可而止，不再进犯。因此对于整个战争，既无通盘计划，又无相互支援的指示，只令各部在各口死守挨打，互不相关，最后只有均遭敌人各个击破之一途。何应钦为了巩固和加强北平与密云之间的防务，特于四月三十日急调傅作义部开往昌平一带增防。傅奉令后，除六十一军仍留察省防御日寇进犯独石口外，即令五十九军（原三十五军）各部迅速分地集结，乘火车向昌平开动，全军于五月一日下午四时前到达昌平。张家口距昌平三百余里而部队又散驻在察省各县乡，但自命令下达之后，仅用了二十二个小时的时间，即全部开抵昌平附近集结待命。部队到达后，傅作义前往北平军分会报到时，何应钦感到非常惊奇。何对傅说：“昨天才给你们下的命令，今天部队就开到指定地点，为什么能够这样快？”傅说：“这个很简单。只要把部队需用的车辆、数量以及上车的地点、时间、距离等计划分配妥当，部队就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何点首道：“部队非训练有素，这一点就很难做到。”

傅部开抵昌平后，何应钦为了从思想上控制和掌握五十九军，特藉向部队宣传爱国教育的幌子，由北平军分会宣传总队派出一个随军工作大队（刘健群所组织的蓝衣社分子）到傅部来工作。傅即将这个大队分别派到各旅、团部，每团约七、八人。他们来的任务是：想使这个部队中央军化，要官兵们拥护国民党，拥护蒋介石，从思想上将这个部队控制起来。但是这些人尽是大少爷派头，平时养尊处优，每日不谈工作，只讲吃喝玩乐、个人享受，部队官兵看不惯他们的这种作风，纷纷要求把这些人调走。傅为了顾全北平军分会的面子，除说服部队官兵外，还给这些人写过一封鼓励信，大意是：“东北沦陷，日寇嚣张，诸君抱有爱国热忱，躬赴前线，惠承勋勤，无任感佩。惟前方军事倥偬，生活需求，诸有不便。但为国者不计身家，图远者不计近利，想诸君明达睿智，当必有以鉴原也。”虽然傅给他们这样的信件，但他们的恶劣作风，丝毫未改，致使部队对他们讨厌万分，称他们为“讨吃鬼”、“下贱货”，毫无好感，最后这些人感到无趣，就自动要求调回北平去了。

在军民关系上，老乡们看到傅部官兵纪律较好，士气也旺盛，所以傅部开抵昌平后，平津一带商民，均表欢迎，尽可能给予各种帮助。如当时傅部拟购买短波无线电十部，抗日救国后援会即给中国各无线电公司介绍，按原价千元，减价五百元。在其它军用品方面也给了很多优待和方便。特别是在傅部和日寇作战最激烈的五月二十三日那天，受伤官兵甚多，北平红十字会和各大医院均派出了很多救护汽车和手术最好的大夫，携带大批药品，赶赴前线救护伤员，表现出抗日救国的崇高热情，给傅部官兵的鼓舞甚大。

四、平古大道设防，准备迎击敌军

自长城各口发生战斗以来，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罗文峪两地，连战皆捷。及至四月十一日，日寇从商震的三十二军防地冷口攻入，接着迁安也告失陷。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腹背受敌，不得不转移阵地，随即奉命撤至通州以东沿运河布防。古北口徐廷瑤十七军的三个师，自五月十四日战斗失败进入九松山预备阵地，十七日以后即调守北平。

傅作义部的五十九军自五月一日调驻昌平后，十四日夜奉命开至怀柔以西之牛栏山一带，并在平古大道怀柔西北高地经石厂、高各店之线占领阵地，构筑工事，阻击来犯之敌。复于五月十七日又奉命于此线后方二十余里附近的半壁店、稷山营之线构筑主阵地。傅即将全军三个旅，全部布置于这两条战线上，其兵力配备如下：以二一八旅曾延毅部附炮兵第三营为右区队，由怀柔西北高地经石厂之线，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原为二一一旅后因构筑主阵地，又换为二一八旅）。以二一〇旅叶启杰部附炮兵第一营为左区队，右接二一八旅至高各店之线，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并派兵一连在怀柔城内占领前进阵地，阻击来犯之敌。以二一一旅金中和部附炮兵第二营，由半壁店至稷山营之线，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军团指挥部设置于小汤山东北的肖家村。为了避免日机轰炸，名义上设指挥部于小汤山公园内，并在公园门上挂有第七军团总指挥部的牌子，住有联络人员，接待各方来往人士和慰劳人员，以便保守秘密，混淆敌人耳目。

傅作义为了能够以武器装备窳劣之我军而战胜武器装备精良之日军，除运用“近战狠打”战法之外，并认为和日军作战必

须“七分用土（即利用土构筑工事），三分用枪弹”的办法，才能抵抗住日军飞机、大炮的强大威力，减少我军的伤亡。于是亲率参谋人员到前线侦察地形，复参照中国和苏联防御阵地构筑的各种式样，连夜拟出阵地构筑方案，制成图样印发各部队，限令在二十日前完成。此次构筑之工事，各团、营、连的阵地均为三线纵深配备，在阵地前沿构筑四公尺宽、四公尺深的外壕二道；外壕外埋设固定及活动地雷，以阻击敌坦克之冲击；每一道阵地均分上下两层，在阵地上筑有各种掩体，掩体上筑有二寸宽、四寸长的枪眼；并筑有坚固掩蔽部、指挥所、监视所、绷带所、弹药库、通信所、厕所等，并用木材和复土加以伪装，使敌机侦察不易发现。在前后各道阵地上复以交通壕纵横接连，前后左右贯通，四通八达，变化无穷。对此种阵地我军名之曰“迷魂阵”，日军称之为俄国人的工事。我官兵们都说：“我们有了这样象铜墙铁壁的工事，日本鬼子有多少飞机、大炮也把我们奈何不了！敌人由哪里进攻，我们就把它消灭在哪里；日寇来多少，我们就消灭多少。”

在这些工事构筑当中，士兵们一个个都是汗流浃背，甚而有的连吃饭、喝水都顾不上。尤以当地民众为了协助和支援部队抗日，不仅出工具、献材料，而且支援了万名以上的人力，帮助军队构筑工事。这是几天之内虽有敌机轰炸而能克期构筑成这样坚固工事的最大原因，同时这也充分说明了抗日救国不仅是军队的责任，也是全国同胞一致的要求。

五、怀柔战役作战经过

第七军团傅作义部第五十九军自五月十四日夜间奉命调往怀

柔以西地区，赶筑工事，准备迎击日寇以来，十八、十九两日，即有小接触。二十日敌飞机十余架，飞入我阵地上空盘旋侦察，投弹八十余枚。因我军工事坚固，仅伤民夫一名。二十一、二十二两日双方在对峙中。此次犯我之敌，为日寇第八师团西义一部，日酋西义一在密云指挥。二十三日上午四时许，日寇第八师团的铃木旅团及川原旅团的福田支队附坦克十余辆，野炮十余门，山炮二十余门，在十架敌机的轰炸掩护下，大举向我曾（二一八旅）、叶（二一〇旅）两旅之前进阵地发起攻击。我两旅前进阵地部队，虽各仅有一连之众，但斗志昂扬，抱着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同敌进行了顽强战斗。激战至下午七时，日寇始将我前进阵地占领，我两连官兵损失殆尽。其中尤以守怀柔的我军四三六团（董其武团）第十连，全连仅剩张惠源连长及士兵数人。敌军伤亡也甚重。日寇占领我前进阵地后，即继续向我叶旅正面及曾旅董团阵地猛烈攻击。曾旅担任经石厂正面、怀柔至北平汽车公路之防务，叶旅担任怀柔城西十余里平古大道左右两侧高地之防务。当战斗开始时，敌机十架沿我两旅阵地前沿，轮番轰炸、扫射。两旅阵地中落敌机炸弹及敌炮弹三千余颗，因我阵地工事坚固，仅伤亡士兵数人，敌步兵虽在强大的飞机、炮兵、坦克协同掩护下，向我守军阵地连续猛烈冲锋达七次之多，均为我叶旅张成义团（四一九团）曾旅董其武团，利用坚固工事，沉着应战，未为所动。尤以我四三六团在董其武团长的亲自指挥下，事前集中全团冲锋枪及优良射手于敌人主攻方面之第一线内，并预设活动地雷及集束手榴弹于外壕之前，使敌坦克一接近我军外壕，即遭轰炸，不能前进，敌惊疑为“神雷”。当敌步兵在飞机、大炮、坦克掩护下向我军攻击前进时，我军凭藉坚固之工事，旺盛之士气，必死之决心，予以顽强抗击。在敌未接近我军阵地之

前，沉着应战，一枪不发。当敌认为我军被强大炮兵所击毁，步兵大胆密集向我军发起冲锋，前进至我军有效射程时，我军用既设阵地以炽盛的炮火阻击敌人前进，敌猝不及防，纷纷饮弹倒地，积尸累累。我董团第二营第一线之七、八两连虽伤亡达三分之一，仍坚守阵地未动。与此同时，董团重机枪连在向敌猛烈射击时，为敌炮兵发现，集中炮火对该连进行毁灭射击。该连官兵为了不中断火力射杀敌军，甘冒牺牲，未行转移，最后只剩下班长张恒顺一人，仍掌握机枪不顾敌之炮火，向敌奋勇射击，阻击敌军前进。第十一连班长杨根胜，两腿被敌机炸断，营附化博知再三令担架兵抬他下战场，他坚决不下去，并说：“不要派人送我，打敌要紧，能将这支冲锋枪交给营附，继续打击敌人，我就放心了。”有的士兵把子弹打完，来不及等候补充，即跳出外壕，同敌白刃肉搏，直至与敌同归于尽。所以敌人虽多次冲锋，终未得逞。此时我叶旅正面张成义团也在叶旅长躬冒弹雨亲自指挥下，利用坚固工事，运用“近战狠打”战术，敌虽连续猛攻数次，我军毫无所动。故敌自拂晓四时向我曾、叶两旅阵地发起攻击，战斗达八小时之久，终未将我军阵地突破。

正午十二时，敌忽变更主攻方向。在敌酋铃木旅团长亲自指挥下，在飞机六架、十余门火炮的火力掩护下，集所有步兵向我叶旅左翼薄鑫团（四二〇团）发起猛烈攻击。经我军远以重机枪及炮兵零线子母弹射击，近以手榴弹投掷，毙敌甚多，敌迄未得逞。正当敌我两军酣战之际，突然发现敌骑兵七十二联队，配合步兵早川联队（此系在二十二日夜间利用我军空隙经山沟小道向我叶旅阵地实行侧后迂回之敌），由长园堡附近渡河，向我叶旅左后方口头村迂回前进。我薄团第一营营长曹子谦即率部向敌迎击，战斗至为激烈。曹营第一连损失惨重，连长魏振海阵亡，曹

亦负伤。叶旅张成义团战斗方烈，而薄鑫团又被敌围攻甚急，阵地顿陷混乱，形成拉锯状态，战况十分危急。此时我炮兵第一连官兵，不顾一切牺牲，由掩体拉出山炮数门用零线子母弹（此弹内含小群铅子二百七十余粒，炮弹出炮口三十米即爆炸。其爆炸面积宽三十米，长三百米，杀伤力甚大），向敌猛烈射击，毙伤日军甚多（日报曾载：两军相距甚近，华军尚发炮射击，实属罕闻）。我守军拚命同敌展开争夺战，终以众寡悬殊，茶乌村阵地，为敌攻占，战况危急万分。叶旅长不得已请求增援。傅作义得报后，认为怀柔以西平古大道两侧高地失守，日寇即可长驱直入，一举可陷北平。为确保北平这座文化古城的安全，怀柔以西阵地，必须死守到底，即用电话命令金中和旅（二一一旅）孙兰峰团（四二一团），“即刻跑步向叶旅阵地前进，迅速支援该旅，击溃当面之敌，收复已失阵地。”傅打完电话后，即带参谋人员乘汽车赶到孙团，拟亲率该团到第一线指挥作战，收复阵地。后经劝阻，傅始留于金旅指挥部坐镇指挥，并给孙团官兵作了简短的战地讲话，鼓励该团官兵奋勇杀敌。孙兰峰团长即亲率该团跑步赶到叶旅阵地左后方之苏家口，向迂回叶旅之敌，展开攻击。孙出发时认为白天增援，必为敌机发现，途中遭敌飞机轰炸，不仅部队徒遭损失，而且增援任务亦难顺利完成。于是即将部队所有骡马、骆驼排成纵队，沿平古汽车公路出发前进，而部队则利用树枝伪装，沿公路两侧的夏田麦垄跑步驰援。正行进间，敌机六架发现骡马，误认为我军增援部队，即乱施轰炸、射击，并利用飞机之弹着点，引导敌炮兵作阻塞和遮断射击。我增援部队遂利用此机，跑步前进，安全至叶旅阵地左后，向敌实行逆袭，一举将敌击溃，并向敌实行追击。

当我孙团跑步向敌急进时，被敌骑兵七十二联队发现，即拟

发起一次乘马冲锋，但为我军击溃。孙兰峰团长同叶启杰旅长将当面敌情研究后，即亲至第一线指挥全团向敌实行逆袭，战斗极为激烈。孙团与敌寇搏斗数次，双方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形成拉锯战势数次之多，最后终为我军收复。曾旅正面战斗稍缓后，也主动派兵出击，支援叶旅战斗，叶旅遂转危为安。叶旅长将部队略加整顿，即在孙团有力支援和配合下，向敌发起反攻。双方混战至下午六时许，孙团经过三次出击，卒将迂回叶旅之敌早川联队击退，叶旅收复全部所失阵地，同敌人才又形成对峙状态。

当我军已失阵地完全收复、战斗暂告结束之后，叶启杰同孙兰峰研究决定夜间袭击敌军，此时忽然接到总指挥部转来北平军分会命令，着全军即刻停战，向高丽营撤退，遂于夜十二时撤退至高丽营集结，次日即行停战。

原来，二十三日上午八时，当我军同日寇正在激烈战斗之时，突然接北平军分会何应钦电话说，要傅作义总指挥亲到北平面商要事。傅说：“日军已于拂晓开始向我攻击，正在激烈战斗中，不能离开，派参谋长苗玉田去如何？”何当即允许。我赶到居仁堂见何后，何说：“我们与日军已于昨夜达成停战协议。我们是为了北平的安全，才不得已与日军停战的。”并假意说：“我们准备准备，再接再厉，要继续与日军周旋。你们可马上撤至既设阵地。”我说：“现在我军正同敌人激战中，大白天不能在敌前撤退，黄昏后当无问题。”何说：“你给傅总指挥打个电话问问前方情况如何？如日军停止攻击，就即时撤下来。”我遵命即向傅打电话询问。傅答复：“正在激烈战斗中。”我即向何转告，何现出焦急不安情绪。在三小时内，何令我打电话四次，傅均回答：“仍在激烈战斗中。”并说：“自孙兰峰团增援上去以后，战况迅为好转，我军刻已收复数处阵地，但日军仍在向我军进行

激烈争夺。”最后，何应钦迫不及待地说：“你回去向傅总指挥说：‘迅速撤至高丽营既设阵地’。”我说：“那么请委员长先给一手令吧！”此时，商震在我的背后小声说：“对、对。”何即令参谋人员写了手令，略谓五十九军立即停止战斗，向高丽营附近撤退，详情见某电云云。苗当将手令重要内容先用电话向傅作了报告。傅听到后，心情沉重，非常难受，认为这样停战撤退是军人的最大耻辱。于是他对总部参谋长陈炳谦说：“我们打这样的仗有什么价值？我们牺牲了这么多的官兵，他们是为谁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能够死而瞑目吗？”陈炳谦看出了傅当时难过的心情，即说：“别人都已停止不打，仅我们这点部队，也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既令撤退，只好服从。”为了不挫伤前方官兵的抗日情绪，陈即用电话同前方将士磋商，均言不能在敌人炮火下撤退，因而一直战到下午六时许，敌军停止攻击，双方形成对峙，前方战线沉寂之后，傅始派参谋人员，分赴前线正式传达北平军分会的撤退命令，并加以解释说服，各部官兵始于夜间十二时前后，逐次向指定地点秘密撤退。在第一线部队撤退时，金中和旅（欠四二一团）仍占领主阵地，掩护撤退，防敌追击。是役我军阵亡官兵三百六十七人，受伤官兵四百八十四人。日军阵亡二百四十六人（当时日报载是役日军共阵亡二百四十六名，被华军炮弹击毙者居多。我军被俘逃回之士兵也亲眼见到日军火化尸体二百四十六具，装罐二百四十六个），受伤五百余人。长城抗日战役至此宣告结束。

六、蒋介石、阎锡山拨款嘉奖，

日报纸《大阪新闻》评价傅军

我军在怀柔抵抗日寇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报以“以血肉

当敌利器，傅部空前大牺牲，肉搏十数次，使敌失所长，沙场战士血，死也重泰山。”等标题，来赞誉及鼓舞官兵士气。这时的蒋介石不得不表面支持抗日，来电慰问，并奖洋五万元，以示鼓励。阎锡山也奖洋五千元，并派太原绥靖公署军医处长薄桂堂于二十五日携款前来慰问。抗日救国后援会、山西妇女救国会以及绥远和其他各地均纷派代表携带大批慰劳品到前线来慰问，给了官兵莫大鼓舞。傅作义认为此次战役虽然阻止了日寇前进，也皆赖全军官兵奋勇牺牲，战地同胞的大力支援而得。尤以在战争中战地民众的损失颇重，特将此款提出一部分给出力民众，并救济战区受灾难民。

对我军在怀柔抗日战役，各报誉为“最后有力最光荣之一战”，即日本报纸对我军之勇敢善战，也甚惊叹。兹将日本《大阪新闻》所载该报特派员在密云日军中拍发的《记事新闻》（虽其字句之间对我军不无侮辱之处，但其所载，较之片面宣扬者，自是不同）的译文择录如下，以明我军作战实况。

“五月二十二日，中国竟一面讲和，一面在怀柔附近构筑最新式之坚固阵地，并调来阎锡山之精锐部队，人所共知的傅作义军。该军虽号称精锐，但与日军向无一度之接触。因此，彼竟跃跃欲试，抱必胜之信念，而藐视日军之威力。自到怀柔后，对我西义一部，即采取抗战活动，我军对此执拗冥顽之中国军，实不得不予以严重打击。遂于二十三日午前四时，以铃木旅团及川原旅团之福田支队，向怀柔正面攻击，然后以铃木旅团之早川联队，以一夜之强行军，向敌后方行大规模之迂迴，而山中羊肠小道，仅可通行一人一马。是夜，余为明了情况计，也向战斗司令部前进，二十三日午前四时许，即到达目的地，该地距北平仅七十余里。”

“枪声、炮声及飞机之轰炸声，想北平居民闻后定仓皇不安。

我铃木旅团之川本联队及各联队于午前七时，即将敌怀柔之前进阵地实行占领，是时敌有少数部队顽强抵抗。是役我军因受地雷之损失甚大，所以士兵不敢走长草之无道路之地。午前十时许即到达怀柔西端，敌在高地筑有中国式的坚固阵地。该阵地两旁伸出，一对由密云前来之敌，一对由蓟县前来之敌。侧背之早川联队，突受敌千余人之进攻，结果伤亡约三百余人。在高地之敌，因受我军牵制，欲逃不能，仍继续抵抗，并均隐藏于掩蔽部内，仅利用微小之枪眼孔射击。我军既难达歼灭之目的，又无法攻击前进，我铃木旅团长不得已竟不戴钢盔，亲自出马于敌前约六百公尺之高地，从事第一线指挥。友军中一勇士向河内跳出来跃进，被前面敌军在石壁下隐伏的机关枪射倒。如此各联队之勇士，竟有八人前后遭难。因敌阵地坚固，我步兵难以前进。于是即向高地之敌行激烈大砲之轰炸，敌阵内沙塵四起，烟幕弥漫。我某中队在强大火力掩护之下，将敌阵左方高地占领。但因受到敌军有力之逆袭（按即为我军孙兰峰团向敌之逆袭），复归敌手。结果敌我损失均重，战至午后六时许，战斗即入沉静之态。五月二十四日参观敌中国式阵地，实有相当之价值，且于坚硬之岩石中，掘成良好之战壕，殊令人惊叹。敌兵隐藏坚固之穴中，仅露出二寸宽、四寸长之枪眼，作殊死之抵抗。观其在作战中掩埋之遗尸，其中尚有十六、七岁者，且有类似学生者，青年之狂热可见一斑矣！”

七、停战协定签字，傅军开回原防

五月二十三日夜間，我军由怀柔撤至高丽营附近之后，何应钦即于二十四日夜間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派军使和日军商谈停战办法。二十五日上午派军分会作战处长徐祖诒和李择一到日军第

八师团同西义一师团长进行停战交涉。中日停战协定于五月三十一日上午十二时，正式在塘沽签字，我方代表熊斌，日方代表为冈村宁次少将、喜多诚大佐。“九·一八”以来，我国著名的长城抗战，就以这个不战而妥协的塘沽协定结束了。

五月三十一日，停战协定签字后，五十九军又奉命由高丽营开至昌平集结整训。在此期间，外间传说：傅作义即将主察，绥省主席可能由王靖国担任。绥省各界也分电何应钦、阎锡山等请速令傅部返绥主持一切。原电如次：“北平军分会何委员长勋鉴：查第七军团傅总指挥宜生率部东开参加抗日，绥省防务颇为空虚，近日东线业经停战，敌军复又挺进热西，察东形势日见紧张，影响绥省至重且巨。恳请速令傅部回绥，直接充实绥防，间接支援察省，西北防务，庶臻巩固。”

“太原绥靖公署阎主任勋鉴：对日战争东线业经停战，闻日军已开赴热西，大有图察之意，察东形势骤见紧张。绥省比邻察境，颇受威胁。第七军团傅总指挥，现仍率部滞留东线，亟应令调回绥，则绥防固可加厚，晋防亦臻巩固。敬此电请，务请接纳是幸。”

何应钦接电后，即在北平居仁堂召见傅作义，告以：“中日停战协定业已成立，部队可行准备开回原防，俟请示委座（蒋介石）电复批准之后，部队即可开动。”傅即于六月二十日由北平赴太原谒阎锡山报告一切，六月二十八日北平军分会以战事结束，且徇地方之请，正式命令傅部开回原防。傅奉到命令后，全军即日回防绥远。

关于冯玉祥在五原时期

活动的一些见闻

刘 人 俊

冯玉祥(字焕章、安徽巢县人, 贫苦家庭出身), 是北洋军阀时代一个行伍出身的善于练兵、用兵、带兵, 敢想、敢说、敢做的杰出军人。他由士兵、排、连、营长直至十六混成旅旅长, 河南省督军兼十一师师长, 国民军第一军军长、总司令, 陆军检阅使、西北边防督办, 国民联军总司令等职。

(一)

一九二五年, 他受任西北边防督办, 至一九二六年撤离河套、向西转进, 这两年中是冯玉祥的国民军占据河套的时期。那时, 我正由山西初来到河套五原。对冯玉祥在河套地方的一些情况, 还有所了解。兹就当时见闻所及并向几位老年人士作了访问、对证, 简述其概要如下:

冯玉祥于一九二五年经段祺瑞政府派任西北边防督办, 同年秋复任命冯兼任督办甘肃军务善后事宜。在这一年中, 冯有时驻张家口, 有时驻包头, 也有时驻归绥, 躬亲督导察、绥以至甘、

宁各省军、政等事宜。他在此期间对于绥西河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等各方面，均有所建树，为当时人民所称颂。

一、军纪严明，军誉良好。冯玉祥的军队总称为国民军（亦称西北军），官兵一律佩带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军誉臂章，以之表明他的军队是以爱国爱民为宗旨的。国民军的军风纪的确很好。如一九二五年冯部第八混成旅开到五原时，正值夏季，都在城郊搭架帐房宿营，不住民房。随即以工兵在五原隆兴长东郊（即现在五原县城关镇东郊）建筑了一处规模很大的军营，供军队驻扎，人们称它为“大营盘”（解放后先后为县属农林场等机构占用）。那时，冯部住五原的军队虽有一旅之众，可是都在军营驻扎训练，街市上很少看到军人，有时见有炊事兵上街买菜，还是由班长带领着，不让士兵单独行动，军风纪的整肃严明，于此可见。是年八月冯又受命兼任督办甘肃军务善后事宜，当即派原驻绥包一带的第二师师长刘郁芬率部开往兰州，道经河套，沿途宿营，也都是住的帐篷，不入民宅。军用一切，更都是公平给价，秋毫无犯。

二、镇压帮会，绥靖地方。这里所谓帮会，是专指那时在绥区狂妄横行的哥老会而言。当时，绥西地区哥老会被封建上层和一些地痞流氓所把持，成为骗人敛财、扰乱社会治安的反动帮会组织。绥西河套一带，到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间，哥老会正是登峰造极时期，到处设香堂开山门，闹得乌烟瘴气。称没加入哥老会的群众为“白头牛”，往往明敲暗索，任意欺凌，甚至借故拖出野外活埋杀害，以泄私忿。致使广大群众人人自危。同时衙门的官吏还暗中派人与哥老会头子们联系，买哥老会头子们的帐。真成了无法无天的哥老会世界了。冯玉祥率部来到包头、河套后，首先大刀阔斧地镇压取缔哥老会，为民除害，绥靖

地方。在绥西河套一带横行无忌、猖獗一时的哥老会，自将几个为首的所谓“龙头”杨万桢（小五杨）、梁宇庭、古焕章等先后捕获、镇压（杨万桢在包头镇压，梁宇庭、古焕章在五原镇压），并分别枭首示众，以后一些人再不敢出头露面、利用帮会组织招摇撞骗，扰害人民群众了。

三、设局建制。往昔河套地方西自杭锦后旗西界，东至乌拉特前旗东界，均属五原县统辖。由于地区辽阔，因而行政管理颇感不便。冯玉祥即于一九二五年将五原县管辖的东部和西部各划出一部分，分别设局建制。即将五原县以东一部分划归大佘太设治局，五原县以西一部分划归临河设治局，也就是以后分别建成的临河、安北两县。这样，大大便利了政权的行使。

四、收回教会土地，抑制教会势力。自庚子义和团起义失败后，满清政府在各帝国主义的强力压迫下，签订辛丑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河套一带教会迫索地方分担庚子赔款，地方当局不得已遂给各教堂分别划拨一部分土地（订有归还限期合约），以抵偿赔款。在此时期，河套一带的教会势焰熏天，骄纵不可一世。到处占有教堂地，到处开辟洋人渠，到处设立教会学校……。一些神甫、传教士利用地权、水权、教权，胁迫、诱惑群众入教，扩张教会势力。一般群众受其诱惑愚弄，竟有“人穷进套，人松奉教”的流言。冯玉祥虽也曾加入过耶稣教（时人称他“基督将军”），但他在河套时，遇到作威作福、不讲公理的传教士或教徒，毫不容情、宽贷。且那时教会因迫索庚子赔款在河套侵占的土地期限已经届满，冯玉祥当即派遣官员根据合约向教会进行交涉，将河套各教会所侵占的土地全部收回，由垦务机构另行丈放给群众。于是，河套一带的教会势力，不象以往那样骄纵跋扈、肆无忌惮了。

五、整顿垦务，开发荒地。河套放垦的初期，大片土地多被一些有势力的官僚们利用职权操纵，或凭藉亲私拉拢，捏造名堂，挂领霸占，不交押荒（押荒是地价的别名），或欠交押荒甚多。冯玉祥果断决定责成主管垦务机构切实整顿垦务行政，清理积欠押荒。并决定于一九二六年开始丈放五原东北山后莫楞河附近红花特拉一带荒地及二荒地（这一带的土地现属乌拉特中后联合旗），以便进一步扩展农业生产。为以后放垦这一带的土地奠定了基础。

六、建设交通，规划水利。在冯玉祥未到西北以前，河套一带的交通运输还是相当落后的。运输工具主要是木船木筏，牛车、骡马车和驼队，汽车很少。迨冯玉祥进抵河套后，首先把包头至五原、临河以至宁夏的公路分别接连修通。不过那时这些公路上运载旅客和货物的汽车，并不每日开行。往往隔二、三日才开一次，甚至隔时更长一些。但从这时起，河套一带的汽车运输事业确已在逐步发展中。冯玉祥还计划向比利时借款修包宁铁路（包头——宁夏），并在一九二五年冬天组织测量人员，开始进行勘测工作。至于水利方面，在五原设置包西水利总局，负责包西河渠水利的建设管理。组织水利专家勘查规划，拟定西由宁西傅家湾开口，东至大余太中滩珊瑚河为止，开辟一道大型的连环进水总干渠，以增进各干渠进水量，扩大河套一带水利。当时，已绘制有全部规划图表。

七、发展教育，促进文化。冯玉祥未到河套前，河套的文化事业处在萌芽时期。五原全境，仅创设起初小十余处，学生寥寥无几，只五原县城里有复式教学的小学初高年级各一班，统共学生不满百人。教育行政领导方面，更是最薄弱的一环。自冯玉祥来到西北后，萌芽初发的河套文教事业，才开始走上发展前进的道路。

1、建立教育领导机构。一九二五年冯玉祥统治绥远时期，教育厅才通令各县局成立教育局（五原县教育局就是那时成立的），由教育厅遴委教育局长。视学（后改称督学）由县局选择合格人员，报请教育厅加委。各县局教育局成立后，领导力量加强，文教设施逐渐开展起来。

2、整顿小学教育。河套地方初设学校时，不仅学校数量少，师资质量亦不高，有的小学教师还是以往教私塾的老学究老冬烘，学校徒具虚名而已。县教育局成立后，除酌增小学数量外，通过考试对师资进行甄别，择优录用，加强了教师阵容，提高教学质量。为了使较小村落的学童也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还重点试办巡回教学，一个教师到几个较小村落巡回授课。

3、开展民众教育。设立平民教育处，负责主持全绥远区各县局民众教育工作。编印出大量的平民千字课，分发给各县局教育局平民学校应用。并在城镇筹设民众阅报所、图书馆，以供民众阅览。五原县教育局即在隆兴长镇桥西觅定书报阅览室址，着手兴工建筑；并由地方绅士发起，开展募集图书捐款活动。

一九二六年，冯玉祥既向直鲁联军兴师，又向奉晋军阀应战，形势甚为不利，冯不得已遂于当年夏宣告下野，偕同其参赞戎机的上宾李烈钧由张家口启程出国，到了苏联。所部暂由鹿钟麟代理。由于局势混乱，不仅各项建设大计停顿，而且军队需索繁重，地方供不应求。以致军纪废弛，扰害群众。所出的纸币又贬值停用；所以群众愤慨地说：“不扰民，真爱民，西北票子真坑人。”特别是武器大量散失在地方，助长了绥远地区多年未能肃清的匪患。

(二)

一九二六年秋，国内北伐革命战争肇始，冯闻讯深受感动，认为革命道路已经开辟，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在苏联国际友人的启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帮助下，毅然决然地回国，响应北伐。回国时是由苏联经蒙古人民共和国，取道内蒙古草原，从五原县乌镇北山乌不浪口入套，于九月十五日晚上，在前后络绎不绝的一连串汽车灯光辉煌照耀下，象一条蜿蜒飞跃的火龙似的进入五原县城，驻节晋泰豫商号（后冯的国民联军总司令部即设于该商号）。随行者有苏联军事专家乌斯马诺夫、谢礼林等，还有中国共产党人刘伯坚和高级将领方振武等多人。

冯玉祥由苏联回到五原，正值冯部国民军与奉晋等军作战失利，先后退集到河套五原一带。冯随即在五原县城内晋泰豫西北平坦广阔的地面上，就地取材，快速筑了一个誓师台，于九月十七日中午举行誓师大会，宣誓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响应北伐。由刘伯坚代表党组织监誓、授旗（刘伯坚是忠诚干练的中国共产党员，偕冯由苏联返国，是冯的重要幕宾之一，冯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后，刘任国民联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冯在大会上慷慨激昂，痛哭流涕地作了誓师讲话，宣告兴师转进，将与北伐军会师中原，共同铲除国内封建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誓死为革命奋斗到底，并以之勸勉部属，激励士气。冯在誓师后不多几日，就离开了五原，道经宁夏，向陕西转进。

冯玉祥在五原誓师，率领部队向西转进的这个月（一九二六年九月），适值凶狠残暴的英帝国主义在四川境内的大江上派遣兵舰，炮轰万县县城，造成震惊世界的“万县惨案”。这个惨痛的

消息传到五原后（这时冯已离五西进），由冯之国民联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鹿鍾麟主持，在五原县城南门外小桥西北筑了一个土台，布置成简单的会场，召开了“五原各界反对英帝国主义惨杀万县同胞群众大会。”鹿在大会上大声疾呼地报告了“万县惨案”的前后经过，大会通电全国各界一致团结起来铲除国内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为万县惨死的同胞复仇。会毕，与会军民由会场整队出发，通过隆兴长镇桥东西大街，进行了空前的游行大示威。这也是在冯玉祥起义誓师这个期间反帝反军阀的具体表现，特志如上。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是冯玉祥在五原起义誓师日，冯玉祥定是日为国民军五原起义誓师纪念日。在其后一个时期内，凡冯部军队在五原驻防，每年都在九月十七日这天集会纪念。冯玉祥将五原誓师，认为是他献身革命事业的转折点，是他革命奋斗史上新的一页。极为重视，念念不忘。一九三八年，南京国民党政府移迁武汉，各战区高级将领到武汉开会时，冯向马鸿逵（宁夏主席兼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询问国民联军在五原誓师地点的情况。马鸿逵因冯系军委副委员长，询及的问题很注意，当即电示五原军政负责机构，迅速在前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誓师地点，修建一定标志，以留永久纪念。当时绥西行政督察专员兼五原县长陈应道商同驻军高级首长（那时马鸿逵部八十一军军长马鸿宾，绥西游击军司令马秉仁等驻五原）在冯之誓师处建筑了个誓师台，台前建立了高约五尺的纪念石碑，碑面的正中刻着：“国民联军总司令冯誓师处。”侧下方刻着：“马鸿逵敬勒”等字样。一九四〇年春，五原被日寇一度侵占，前建之誓师台和纪念碑，也被敌人破坏不复存在了。

(三)

一九二六年，五原县城设有国民军干部学校。冯在百忙中，每日下午还抽出一定的时间，步行前往该干校给学员们讲授国民军历史。我那时供职五原教育局，在崇拜英雄人物的心情支配下，我先后去旁听过冯的两三次讲课。那时，听讲的学员们都在校院里席地而坐，带着笔记本随听随摘要记录。在当时还允许非学员们在两边的空地上旁听。冯讲授国民军历史，是按照从他入伍起至国民军诞生以至成长壮大的时间顺序并突出重点来讲的。现就我脑海里的点滴记忆与印象，略述如下：冯在讲授时不带讲稿或提纲，只按他的腹稿随口来讲。讲授的方法，是采取讲故事谈话的形式，讲授一开始，就如江河奔流，滔滔不绝。对于有关国民军历史发展经过的追叙，清晰细致，如数家珍。更突出的是他在讲的过程中穿插陪衬多、形象表情多，讲得有声有色，亦该亦谐，引人入胜。因此，听讲的人都是聚精会神，并不时发出兴奋愉快的欢笑声。一直听两三个钟头，丝毫没有倦容，始终保持着振奋充沛的情绪。首次听他讲早年从军时情况，说他是当兵的老粗出身，幼时家境贫寒，无力上学，但是他很爱学习，入伍后，他每天有空余时间都要学习，晚上更要在灯下学习。可是有和他同班的一个弟兄，性情有些乖僻，不但自己不肯学，还在旁边故意高声说唱，或摇晃桌子，扰乱他学习。可是他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继续坚持学习。讲到这里，他鼓励学员们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不要忘记了学习，要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他在介绍他当下级军官时的经验说，每逢部队出发在行军途中，应该拿的东西，有时就忘掉了，显得秩序相当混乱。

他看到这种情况，就想了办法，把所有行军应携带的东西分为四部分，平时即对弟兄们一一讲清，并着手练熟，如有差短，便能立即发觉。从此以后，部队开拔出发，再没有叫嚷遗忘下东西的现象了。他又结合着启示学员们说，在部队里当官佐要处处替弟兄们操心，为弟兄们想办法，才能把弟兄们教育好，把部队带好。

又有一次听到他讲北方军阀割据，抢夺政权的混乱局面。他说，张作霖、阎锡山、段祺瑞、吴佩孚等都是争权夺利，同恶相助的一丘之貉，并以这些人的表现，分别加以严正的批判谴责。但对孙中山则极为尊崇。他说孙中山先生北上后，由于皖奉系军阀段祺瑞等操纵把持，使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未能如愿以偿，以致忧劳成疾，夙志而歿。冯又说在孙中山先生病笃弥留时，他很怀念，他曾派他内人（李德全）前往探视。他又说，孙中山先生的死，使我们失掉一位伟大的革命导师，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损失，是很可痛惜的。

（四）

有关冯玉祥的几件轶事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五日晚冯由苏联回到五原，署理五原县知事（那时的县知事即现时的县长）的刘必达（国民军老干部），即于当晚特备了猪、羊、鸡、鸭、鱼等佳肴美食送去，为冯洗尘，以表敬意。冯大发雷霆，拒不接受，当将刘知事打了二十军棍，并当场训斥说：“现在我的士兵连小米都吃不上，你给我送这些东西，我怎能吃得下去呢？”随后又通报略谓：“五原县知事刘必达餽送食物，有玷官箴，着即申斥，以儆效尤。”后刘随同国民

军西退到了陕西，冯当即任命刘必达为陕西省咸阳县知事。足证其对部下是赏罚分明的。

冯玉祥将军经常保持俭朴的生活，他平时饭食本来就很简单的，他又特意让炊事员每餐必须给他另备两个窝窝头。冯一贯是穿粗布衣服，这是人所共知的。一九二六年九月他从苏联回到五原这一阶段，虽有时也穿着红皮甲克，但以穿粗布服装的时候较多，这表明冯本人生活是大众化的，是不超过一般士兵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

冯玉祥出身于贫苦家庭，一向是同情劳动人民，反对人压迫人的。例如冯认为坐人力车是社会最不平等的，是把劳动人民当作牛马看待的，所以冯严禁他的部属坐人力车。有一次，他来到归绥，走在新旧城马路上，遇见他的一个下级军官，正坐着人力车在奔驰。他当即喝令这个军官下车，把钱照数付了，叫人力车夫坐上车，勒令这个军官拉上走，一直拉到他指定的地点为止。从此，凡冯部的军政人员再不敢坐人力车以身试禁了。

五原县改名义旗县：五原这个名称，由来已久。一九二六年九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五原之名更传闻中外。冯以五原起义，是他革命奋斗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为纪念他这个高举义旗的革命策源地，特于是年冬季将五原县改名为义旗县，并另颁发了木质县印一颗，文曰：“义旗县印”。五原县公署接到此项命令后，启用新印。从此举凡行公文、出布告，都用义旗县名义与印信。不久奉军西来，冯部完全退出河套，乃又恢复了五原县名。

总之，我对冯玉祥这个杰出的历史人物，是相当敬仰的，当他在五原誓师后，我曾以“冯玉祥”将军为题，吟成七绝四首，对他表示赞颂。

我所知道的徐永昌

李居义

〔一〕徐永昌的简单身世

徐永昌字次辰，原名世昌，后因名与徐东海（袁世凯的国务卿）相同，遂改为徐永昌。次辰原籍山西崞县，幼小随父母徙居大同，贫无立锥，父开留人小店，母藉针黹以糊口。十二岁左右，父母先后病故，次辰流落乞讨。适毅军统领姜桂题部某营驻应县，某军需徐某（营口人）领饷过大同，次辰经父执介绍，即随徐某至应县，在营部当勤务兵。徐某甚感次辰聪明，每日稍有闲暇，即教他认字，念三字经，百家姓等。次辰记忆力很强，徐某更为赏识，对次辰吃穿照料周到，无异子侄。戊戌变法，新军次第成立，毅军深感官兵目不识丁，请准清廷统领得从官兵中选拔年在二十左右的青年若干人设立随营学堂。次辰年幼，破格入选，每试名列前茅，得以选送北洋陆军大学预科，期满升入陆大本科。次辰在陆大肄业期间，认识了同盟会员孙岳（禹行）、续桐溪（西峰）、王法勤（励斋）、刘汝贤（竹坡）、耿毅（和生）等。毕业后，随孙、续等，奔走革命，在陕、甘、川、滇各省与继唐尧、熊克武、胡景翼、邓宝珊等相结识。

北洋军阀将领曹锟驻保定时，成立军官教育训练团，孙岳任团长，即约次辰担任教育长。不久，该团改组为陆军第十五混成旅，孙任旅长，次辰担任参谋长兼第一团团长。次辰并约同学员子青任第一营营长。直皖战事发生，孙岳在直系中担任右翼总指挥失利，改派次辰担任，扭转战局，甚为吴佩孚嘉许。一九二四年曹锟贿选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合筹划倒曹、吴。孙岳成立国民军第三军总司令部，即委次辰担任该军第一师师长，员子青任第一团团长，总部参谋长改委何遂担任。战争开始，孙岳所带的陆军第十五混成旅，是曹锟的卫队。孙下令解决曹锞（曹锟之弟）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时，次辰迟疑不决，几误戎机，由员子青挟迫，始开枪把曹锞全部缴械。

曹、吴失败后，段祺瑞二次登台，担任临时执政。冯玉祥任国民军第一军总司令兼陆军检阅使，驻节北京，其所部捍卫京师，并以西北边防督办名义控制察、绥一带；国民军第二军总司令胡景翼发表为河南督军，驻节郑州，同时发表国民军第三军总司令孙岳为河南省省长。孙因病即以参谋长何遂率领第三军一部分前往开封视事，旋与国民二军发生冲突，不得不引咎辞职。斯时，皖系刘镇华在豫西失败，尚盘踞西安，冯为巩固国民军团结，面商孙岳，即令国民三军主力由徐次辰统帅攻陕，一面令二军李虎臣师和驻渭北的田玉洁部，以及原驻陕北隶属三军的井岳秀所属杨虎城部三面夹攻，一经接触，镇嵩军全部溃散。陕南吴新田和陇东陆洪涛各部纷纷向西南逃窜，关中道各县，很快地次第收复。冯、段（执政）改委孙岳为陕西督军，李虎臣帮办，同时段为树立自己势力，以刘治洲是陕西人，委为陕西省长。

〔二〕我认识徐永昌的开始

一九二五年，我辞卸了长安县，不到两个月，国民三军徐永昌带队到西安，他对于陕西情况生疏，得知我是山西同乡，即派参议李荣谦（河南人）持刘贯训（笑若）介绍函邀我谈话（徐的司令部当时驻皇城），随即聘我充总指挥部高等顾问。次辰沉着寡言，对于烟赌嗜好概不染指，每于宴会热闹场所，最爱和歌舞妓女交谈。一日傍晚，他和李荣谦身着便服，到我住宅，约同出外散步，竟把我引至开元寺妓女院内聊天，初则我很惊异，后来才知道他有胃病，为调和身体，清醒头脑，姑作此冶游之举。相处月余略可谈心。当时军阀混战，我对于国家唯一的期望是“统一”。有一次，我曾问徐：“吴佩孚还能东山再起吗？”徐答：“中国人念旧，过去都是好的。论吴的人格，不爱钱，不怕死，岳武穆的优点，兼而有之。论战功，他有直皖，直奉轰轰烈烈的两次胜利。论实力，两湖的肖耀南，三江的孙传芳，四川的杨森等，现尚有军队十余万人，中国多事之秋，过去军阀失败后，一遇机会，远不如吴子玉者，起来的还很多，何况吴二爷，谁能说他起不来呢？”我听了他这一篇议论很同意。紧接着他又告诉我：“起来是起来，不过昙花一现耳。”我当时莫明其妙，又追问是什么理由。他说：“吴无政治头脑，二十世纪的潮流，冲也冲倒了吴子玉。”我才恍然大悟，过去爱吴憎冯的心理，一变而为爱冯憎吴的情绪。这是我从学校到社会作事，思想上转变的第一次。我以后随徐出关（潼关）过军队流动的生活，确是这一个原因。我与徐俱是山西人，我问徐：“你对模范省长阎锡山感想如何？”徐答：“外边的同乡，没有不反对他的，我虽是山西人，

等于非山西人，但我走过鲁、豫、陕、甘、川、滇各省，土遍匪地，民不聊生。我是个军人，不懂得政治，在我脑子里想，辛亥起义到现在，山西秩序没有乱，人民负担虽重，比较别省，该要好些吧。”我当时认为他不了解我与阎的关系或是一种敷衍，后来才知道他是从政治立场上以及人民生活上推想的论断。冯玉祥是国民军的领袖，又有一次我问徐：“冯总司令可以统一中国吗”？徐答：“否否，中国社会道德不够，但冯正如花朵初开。目前露头角的人物，各有长短，总结起来，谁也不如他的分数多。”回想起来，他批评人物，确独具慧眼，令人无限佩服。

（三）徐永昌在国民三军中情况

余在西安与次辰相识后，不久，国民军第三军总司令孙岳于华山养病后，来省接充陕西督军，李虎臣帮办，刘定五省长。孙、刘均函聘余充军省两署参议。旋因各机关改组问题，三方面互有争执。孙岳非陕籍，结果仅以警务处长一席归孙提名委任，孙颇不满。斯时，三军各将领议论横生，有的主张进攻汉中（陕西军务吴新田），有的主张攻打兰州（甘肃督军陆洪涛），次辰因三军官兵多系河北人，冀鲁尚在李景林、张宗昌手中，远征吴、陆（俱是安福系残余），段、冯恐未必同意。原计划无形中打消，孙岳愤而辞职。适吴佩孚、张作霖暗中勾通，有捐弃宿怨、联盟反攻国民军的消息，冯大恐，才让孙岳主冀，令徐率国民三军全部开回保定，和一军张之江部，二军邓宝珊部会攻天津。国民军内部矛盾，经这一调整，始告平息。那时余目睹陕西混乱，茫无头绪，孙岳原拟议让我接管陕西全省烟酒公卖局，迄未实现。我即请假先行回山西原籍省亲。不久，三军奉令开拔，次辰

函召我直赴保定，那时天津战事正在吃紧，国民二、三军攻下保定后，次辰和宝珊即请刘贯训（孚若）接充道尹，刘要候孙督办到保定后再接事，不料孙督办由西安到石庄，即发表王某任保定道尹，同时并委耿毅为河北省政府政务厅长，孙六（孙岳胞弟）任铁路运输司令和军需供给一切事务。我三军总指挥部已移至大城县南台甫，我借段子均给前方送军用品，正遇三军骑兵绕敌后方袭击失利，战事骤形紧张，敌炮弹已落至司令部门口。次辰与我会晤后，立催我借段子均折回保定，整理后方电讯联络事务。激战两日夜，幸一师第一团徐延龄团长在前线沉着应战，终于击退了两倍于徐的李景林支队，最后国民军迫使李景林放弃天津，退至山东德州境内。二、三军联合司令部转移到津浦路青县马厂一带。我回到保定，孙司令给我挂车皮一辆，从平津线转天津住慈游别墅，次辰由前线归来，到别墅看我，言孙督办囑耿厅长找我，想让我在天津附近干县长，我严词谢却。越日，次辰对我谈，孙督办要我去山西一趟，我说阎锡山对我没好感，我不能去。他说孙督办告诉，冀晋两省毗连，今后难免不发生事故，我们政见虽不一致，但都是老同盟会会员，只求两方顾全大局，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我从山西回来，李景林从德州复又反攻，奉军在山海关跃跃欲试。吴佩孚正在调兵遣将，督师北上。靳云鹗前敌总司令部，业由郑州抵达邢台。山西阎锡山在大同增兵，大有截断平绥铁路、阻止国民军西退之势。冯不得已，令国民二、三军与国民一军鹿钟麟代总司令取得联系，集中北平（其时冯玉祥已通电下野）。天津放弃后，孙督办到北平，即入法国医院养病，孙六因供应困难，也潜逃无踪。我随次辰住前门外大旅社。陆军参谋长刘竹坡对孙督办建议：“你既不能出头，与吴子玉言和，次辰新由前线归来接洽亦多不便，何妨委何遂充国民三军副军长代行总

司令职务，让他出动较妥。”孙欣然应允，立即下条委何遂充国民三军副军长代行军长职务。越日，何搭车即赴郑州欢迎吴子玉，行至邢台，遇靳云鹗，大为碰壁，无结果而归。

次辰由青县马厂移防北平近郊，态度消极，我与李荣谦俱住前外大旅社。靳云鹗抵保定后，一再派员到北平要求次辰在孙二哥养病期间，负起全责出面维持三军，一切饷项、给养、服装等，均由他负担，次辰情不可却，初派李荣谦周旋，旋又让我前往一次。动身前，我问此去任务若何，次辰密告我：“荐卿（靳的别号）与我私交甚厚，但他本人担不起这样重担，你去也不过敷衍敷衍就是了。”

我从保定回来，鹿钟麟总司令因奉军与国民军相持，进攻黄村甚急，吴要冯部全体缴械后，方肯收编。斯时，阎锡山为巩固自己地位竟由大同出兵，分布于天镇、阳高一带。鹿闻讯后，异常恐慌，遍找赴晋疏通人员，苦不可得。商之次辰，决定派我赴晋。临行，次辰以山西人的资格，对阎带了几句话，也可说是与阎通讯的开始。他反复对我叮咛：“荐卿数次派人协商，如能接受吴的命令，整个国民三军归我统帅，我尚拒不接受，此去决无他求。国民军举义，在历史上有一定的价值，即使失败，亦觉光荣。阎之环境，固有他的困难，但为阎公计，为山西人民计，无论想什么方法，对国民军应留有余地，若乘人之危，截断国民军退路，永结不解之仇，太不合算！何况国民军拥有陕、甘、绥、宁、青数省兵力，随时可以出兵山西。时局变幻无常，转告阎公，应深长思之。”阎接函甚喜，即复一函，令我返归。归来，奉军已由黄村进入北平，国民三军分散在平汉线上，如庞炳勋旅，门炳岳旅，梁某骑兵等旅因粮草供应无着均为靳云鹗吸收改编。独徐次辰一师和三军司令部卫队以及弓富魁、续范亭各支

队，会同国民一军，均撤至南口以内。

国民三军由南口撤退时，员旅长子青押车殿后，因各军控制机车，司机不能主持，尾挂上山的车头脱勾，机车即与员子青所坐的一列车头相撞，军车上炮弹、炸药齐发，立把员旅长和所带的士兵完全炸死。黄庐初原系徐部第三旅旅长，因津保战役失利撤职，次辰到张家口，重整队伍，复让庐初接充员子青旅长之职。从张垣转移绥远时，蔚县县长濮少戡随军转移，委为总指挥部秘书长，并把收集的散兵归续范亭、弓富魁编为支队。那时，国民一军韩复榘、石友三齐集归绥，阎锡山令绥远都统商震供应粮秣并用金钱收买。结果，韩石两部军队，均换晋军旗帜，独次辰所领队伍，因三军孙总司令已由包头移住榆林养病，意志坚决，迄未改编。冯总司令从苏联回到后套，韩、石得讯后，急急忙忙背叛了晋阎，撕毁了符号，仍旧恢复了国民一军旗帜。趁冯在五原誓师时，全部开进套内，陆续西移。那时，国民三军内部意见极不一致，有的主张服从冯的命令，随同国民一军向西开拔；有的主张从包头过河，移住伊盟和陕北府谷、神木各县，容易与榆林联系。次辰取后一个主张，带大部分军队过河，惟续范亭、弓富魁两支队力主西开，不料行至宁夏石咀山，被石友三、韩复榘伏兵夹击，全部缴械。冯曾电徐说：“他下令仅收集散兵，石韩竟把范亭支队缴械，系属错误，候到兰州后，另给范亭成军。”冯在五原誓师后，为统一指挥曾下令取消一、二、三军名义，把国民三军改编为第十五路军并加委徐永昌为司令，因徐没复电，冯曾派专人找徐疏通，次辰对来人说：“国民一、二、三军联合起义，均有它革命的历史意义，回忆每次战役，总是以冯总司令命令为进退。这次国民三军从平汉线退却时，多被靳云鹗收编，能跋涉塞外的官兵，多系意志坚强，有革命决心。现值颠沛流离，

粮草缺乏的时候，骤易旗帜，官兵难免不发生异议。况二哥（孙岳）尚在，我更不能接受第十五路军司令名义”等语。冯总司令到西安后，次辰还派濮秘书长少戡前往解答，方释误会。

国民三军部队从归绥移防伊盟后，阎锡山派员追随更急，鉴于次辰拒绝改编，不为利诱，一直表示说：“山西军队虽少，决不眼红国民三军那几支枪。”并说：“次辰总是山西在外边的突出人材，他带的那部分队伍，又是在革命过程中久经锻炼出来的，当现在困难的时候，我愿尽量帮助，丝毫没有收编或改换他们军队的意图。”适北伐军进抵武汉（汀泗桥一役，吴子玉全军覆没），国民军急欲渡河参加北伐，次辰取得冯的同意，到太原与阎锡山洽商合作。那时，我从上海归来在安邑原籍，次辰托冯的代表薛笃烈（薛笃弼之弟）回家转告我，次辰要我迅速来省。我到省后，次辰已赴绥转陕北防次，翌年二月，国民三军从榆林移防汾阳，次辰来省与我会面，他问我见阎否？我把赴绥找他与阎的误会情形说明后，并声明甘愿从军生活，决不为阎利用。后来山西两路出兵，商震担任平绥线总司令，次辰担任平汉线总司令，杨爱源任副司令。在两路作战中，商震所收的部队，多自己改编，而次辰为取得阎的信任，把投诚的部队和缴获的枪支及弹药，完全上缴，请阎自行改编。军官们很有意见，次辰当面解释说：“树大还要分枝，他想同化咱们，何如咱们一齐努力钻进他的内脏，取而代之为得力？”那时，孙岳已发表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把国民三军改为中央二十二路总指挥部，并委徐次辰为司令，归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指挥。次辰派我和廉壮秋随同孙岳赴京，并到郑州约续范亭，过驻马店等候邓宝珊师长同到汉口转轮到南京，下榻红门楼李协和住宅。不到半年，孙岳因病移沪逝世，次辰复派我协同壮秋把孙岳灵柩移回保定安葬后，才把国民

三军旗帜更换。那时三军司令部已移防天津，驻蔡家花园。

次辰性情喜简好静，不愿酬酢迎送。曾记他到北平开会毕，令濮秘书长通知天津办事处临时派汽车上站来接，并嘱守密，勿令别人知晓。翌午，火车快抵站时，他听见军乐队奏乐，一个人从后边守车跳下来走了。迨专车到站台停下，军政各首长纷纷上车欢迎，找不见总司令，弄得不欢而散。我和随从人员到蔡家花园，次辰大发脾气，谓濮打电话走漏消息。我说这么一位大总司令返天津，怎么能瞒得过警宪？如此行动，得罪军政机关首长，未免有失总司令身份。他说：“据你说，我又是错了。”第二天坐上汽车赴各军政机关答拜，解释了一番。尤其是新闻记者们，每遇次辰下火车时，左右包围，总想写一点重要消息，可是他守口如瓶，各记者手持日记，一个字也写不上，大失所望，怅怅而归。

次辰在国民三军里，有两个好帮手。一是员子青，在南口退却时，被火车机头相撞脱轨炸死；一是赵维梓，系国民三军中后起之秀，思想左倾，人多目为共产党，他在唐山接充参谋长后，适我暂代宪兵稽查队，朝夕相处，相知甚深。忽因伤寒病移津埠意大利医院，不数日而死。我常对徐谈，员、赵两友死后，你似失却了左膀右臂，徐默然感痛，不胜惋惜！

蒋方震自戕目击记

苗 玉 田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以下简称军校）是辛亥革命的次年开办的。军校直属陆军部。当时，陆军部部长为段祺瑞，军校由陆军部军学司直接领导，军学司司长为魏宗瀚。军校开办之初，校长为赵理泰。不久就为蒋方震所接替。第一期所收的学生，多是陆军中学毕业的，共一千六百余人，我也在内。因此，蒋方震用手枪自戕的事，是我亲眼所见。现将其前因后果以及当时的情形，述之于下：

蒋方震是浙江海宁人，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毕业后又留学德国。在当时，他的确是一位出群超伦的军事人才。一九一二年冬，蒋方震接任校长后，对学生的军事学习和生活，关切备至。给学生讲话时，经常以我国衰弱，应如何奋发图强来勉励学生。对军事学科设有步、骑、炮、工、辎重。各兵科的训练尤为注重，经常考查、督促。对学生的态度既严肃又爱护。课余时间，他经常在俱乐部里同学生一起打球、游戏，由于他的性格洒落、活泼，平易近人，因而学生和他在一起，毫无拘束之感。蒋方震很关心学生的生活。他说，为了让学生吃好喝好，多花几个钱没有关系。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学生们对于蒋方震校长有极好的印

象，相互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感情。

蒋方震拟扩大军校，并有以在日本所学的军事学为基础，参考德国军事学的优点，改进教学方法等等打算。在商请陆军部军学司同意后，当即作出计划，与校部有关人员多次研讨，向学生讲话时亦略有透露。学生闻之，无不高兴。可是当把改进计划呈送陆军部后，却被军学司长魏宗瀚完全推翻，这使蒋方震非常气愤。

一九一三年某日，蒋方震集合全校官长、学生讲话。讲话时，他站于尚武堂（校长住室和办公室的后门台阶上）。通常各连官长都是站在队伍中间，这次却将所有官长集合于学生的前列，虽有此异状，大家亦未想到是他有意安排。当他把改进、扩大军校的计划，以及最初如何得到陆军部的允许，其后又如何被军学司长魏宗瀚完全推翻的经过谈了以后，显得非常气愤。讲话未终，他忽然转身由后门进入尚武堂。不过两三分钟，听到尚武堂内轰然一声，如铁筒从高处落地。在这瞬间，蒋校长又由后门走出，想继续讲话，可是已说不出声来了。身子不由自主地倒了下去。这时大家才明白方才轰然一声是枪声。距离近的官长、学生一齐拥上前去，把他抱住，未致栽倒，当即架到他的住室。经过多方抢救，才得脱险。

蒋方震自戕未死，有这样一个原因。当蒋校长回到尚武堂内时，适校长的随从李某在场，他见校长怒气冲冲，掏出手枪对正心口，在此霎时之间，李把校长的右臂猛推，同时枪也响了。虽已穿透胸部，但子弹偏于一旁，只伤肺叶少许，因而未得丧生。

学生们见校长自戕受伤，大都落了泪，自动地组织起来，给校长站岗，卫护他的生命。军校当局即致电陆军部、总统府报告这个意外的情况。当日总统府、陆军部，都派来了大夫。同时驻北京的日本使馆也派来大夫，还带有看护一人，共同进行抢救。

伤势稳定后，蒋即离校治疗，后至北京。校长职务，由曲同丰接替。

（一九六六年三月）

锡盟王公觐见袁世凯亲历记

宋 英

一九一三年夏天，宣布“蒙古独立”的外蒙哲布尊丹巴，派军队南下攻打百灵庙与滂江时，锡盟十个旗的王公，未敢公开响应。是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指使“公民团”包围议会，强迫议员选举他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十一月间，北洋政府与沙皇俄国发表共同宣言，承认外蒙古自治。袁为了使锡盟王公内附，进行羁縻笼络，特于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初，邀请锡盟各旗王公进京襄赞共和，并欢度春节。各王公不明真象，多不敢先来张家口报到。袁乃派在辛亥年来绥远镇压革命的“京畿第一镇”的李统领（字星阁）带兵分头去“请”。并在沿途“护送”，才有二十多人陆续到达张家口。察哈尔特别行政区的都统虽给这些王公设立了“公馆”，但是这些王公心怀疑惧，不敢居住。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便让他们搬到各自“相与”^①商号中去暂住，等被邀请的王公们到齐之后，一同坐专车进京。此时我在大境门外正沟的天泰德商号学生意。

^①相与——方言。商号或商号与顾客之间彼此有来往、有交情，称作相与。

天泰德一向经销东苏尼特旗（即苏尼特左旗）的碱盐，和东苏尼特王爷是老“相与”，于是他就临时住到了我们柜上。

东苏尼特王爷很年轻。离开旗下的时候，仕官们都不敢陪同他前来，只带着一个名叫罕班的西藏活佛给“保驾”。他从“公馆”中迁出，见了天泰德的掌柜，如同看到亲人一般，说他此去北京吉凶未卜，心中感到非常害怕。我们的掌柜向他解释了一番，方才有说有笑地饮酒吃饭。不久，西苏尼特旗的两个仕官潘定和特木尔，带着一个姓白的喇嘛也到来，住在大境门外西沟的大亨玉。在外蒙军队进攻滂江的时候，该旗的德王，已被察哈尔都统软禁在张家口。由于他装病不起床，就让这两个仕官代替他去北京晋见大总统。当北京拍来电报、并派来官员催促各旗王公启程的时候，东苏尼特王爷又犹疑了，叫柜上派一个“通司”跟他一起前去，必要时给旗下通风报信。掌柜们就让我给他去当翻译。

我跟着东苏尼特王爷一行三十多人，于春节的前几天，乘坐布置华丽的专车离开了张家口前往北京，察哈尔特别区都统曾到站欢送。专车到达西直门车站时，站台上高搭彩棚，有好多官员在军乐声中前来欢迎，并用大马车把我们送到东四牌楼附近的帽儿胡同一座府邸里。这座府邸建筑非常讲究，可惜一九〇〇年被八国联军烧了一半，剩下几座完好的楼房，临时做了安置锡盟王公的宾馆。第二天王公们去安定门大街“蒙藏院”，拜见了贡王（贡桑诺尔布）。当时贡王任“蒙藏院”的总裁。他代表袁世凯向众人说了一番大总统维护王公制度和王公们应当拥护大总统一类的话。从此各王公即在宾馆中安心住下。每顿饭都是八盘八碗的高等酒席来招待。特别是春节那几日，酒席尤其丰盛。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元宵节这天，贡王率领众人去铁狮

子胡同觐见大总统。我们下车以后走到客厅前边，侍从人员掀起门帘，袁世凯穿着大礼服，满面红光，出来迎接。进到内庭，大家鞠躬落座以后，侍从人员给每人倒了一碗茶，谁也没敢端起来喝，都呆若木鸡、局促不安地坐在软椅上。贡王给袁担任翻译，袁世凯问了牛羊水草的情况，贡王说了一派王公拥护共和的冠冕堂皇的话，不到五、六分钟即行辞出。袁世凯此次接见锡盟王公，不仅晋封了爵位，允许王公制度世袭，还赏赐王公每人银圆一千二百元，福晋每人八百元，随员每人五百元。交“蒙藏院”给转发。但没有全数到手。不知是被贡王扣过一半，还是被贡王的“门官”于二（即被袁世凯封为镇国公的于二喇嘛）中饱。因为王公们都是以待罪的心情来到北京，看见北洋政府如此款待，已是出乎预料，谁还计较这些钱呢！

民国初年，北京的政党很多。王公们除了游览天坛等名胜古迹，还出席了各政党的欢迎宴会。每次宴会都要摆上十几张圆桌，百八十人在一起聚餐。听各政党的领导人滔滔不绝地讲演。这些政党都想把蒙旗的上层人物拉到自己党里，因此这些王公今天参加了“共和党”，明天又参加了“进步党”。其实，这些王公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政治主张，他们所担心的是，第一怕被袁世凯扣在北京不让回旗；第二怕北洋政府取消封建王公的世袭制度。所以谁请吃饭他们都去，谁叫入党就入党。好象傀儡似的，任人摆弄。不管见了那一方面的人，总是说“共和好”。这样住到阴历三月春暖花开的时候，王公们感到北京天气燥热，虽然顿顿饭吃的是鱼虾海味，但不合口味，又加不服水土，都患了痢疾。宾馆里卫生条件差，臭虫满墙，咬得人们终夜不得安睡。这时内外蒙边境也已平静，王公们便递上“告假”条子，袁世凯又给王公们晋封了爵位，用专车送到了张家口。

我跟上东苏尼特王到了一次北京，和其它几个旗的王公仕官也成了知交。对于天泰德在锡盟各旗做“通司”买卖，更加便利了。

海 山

白 玉 崑

海山（一八五七——一九一七年）字瀛洲，蒙名松彦可汗，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幼年出过天花，形成麻脸，当地人称海三麻子。

海山是原喀喇沁右旗（现属宁城县）天义乡岗岗营子村人。他父亲白音特木尔，是当地有名的士绅，种地七十顷，堂号“永裕堂”。大门正中悬“永裕堂”金字匾额。大门两旁有一幅对联：永对青山春有色；裕迎紫气瑞无涯。他家在突泉县还有一处窝铺。

海山自幼聪敏，其父请专人教授海山蒙文满文十四年，所以精通蒙汉满文。曾翻译《蒙汉合璧五方元音》。

海山年少有雄心，他的幼年时代正是咸丰——同治年间，他为解脱满清政府“汉不封王、蒙不点元”的规定，特从南三十家子讨了个汉族老婆马氏，打算报汉族考状元。

海 山 初 仕

光绪年间，满清政府为了直接统治喀喇沁，曾在平泉设办事处，海山就在该办事处工作，不久即成为负责人，使他有会结识了一些上层人物。

海山近三十岁时，被喀喇沁右旗王爷提拔为王府管军梅林。

一八九一年金丹道教起义时，喀喇沁右旗派海山、中旗派李梅林一起去平泉告状，要求满清政府派兵镇压。平泉县兵力甚少，对此无能为力。他二人又到清朝驻承德的军门叶志超处上诉。他俩怕自己官小见不到叶志超，就急中生智，骑马往里硬闯。在军门门口被岗哨推下马来。正在纠缠之际，恰巧叶志超从里边走出。他二人乘机把金丹道教起义的事禀告上去。于是叶志超派潘万年带兵到喀喇沁中旗榆树林子、东洼子一带镇压了金丹道教起义军。

逃 往 东 北

当时在喀喇沁右旗、中旗一带有“三个三”。即海三（海山）、鲍三（喀喇沁右旗王爷的舅舅）和张三（名叫张华堂，杜家窝铺南九家人）都是当地豪绅。

这三个“三”在喀喇沁一带互争雄长。张三在“金丹道教”起义过程中，想利用民族矛盾压服海三；海三在镇压“金丹道教”起义军的时候又压了张三。经海山剿办，从张三家起出很多蒙古族的東西。而张三为了站住脚根，化了不少钱，讨好鲍三。本来鲍三和张三年龄相差无几，但张三却认鲍三为干爹，这样通过鲍三的关系巴结了王爷，孤立海三，以伺机打击海山。当时，捕获的一名“金丹道教”小头目，在送往平泉途中，由于看守人员醉酒，致使小头目跑掉。张三告海三放跑了罪犯。还发动“金丹道教”家属控告海三。据说清廷和热河当局，收到很多诉状。

海山了解到这些情况，认定在家要吃眼前亏，于是在一九〇二年冬，兄弟三人，带领全家老少，奔往突泉。其后又怕在突泉住留长久被人发觉，就又逃往哈尔滨。

前 往 外 蒙

海山全家逃到哈尔滨不久，遇见了喀喇沁中旗黑城人傅××。这个人给俄国驻哈尔滨领事当通事。傅某了解到海山的处境，把他介绍给俄国领事西米诺夫。海山在哈尔滨俄领事处潜居达四年之久，并学会了俄文，与西米诺夫勾结甚深。西米诺夫对海山说，外蒙要独立，很缺人材，你赶快去那里吧。于是海山于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到达外蒙。

当时驻库伦大臣延祉，曾接到满清政府理藩院公文，令其“密查海山踪迹，捕获归案”。后经查明，确有其人。延大臣素行和平，以海山只身来库，既无功名，又无势力，当不致为患，遂不根究。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延大臣交卸后，海山始敢公然出头。（见陈篆著《止室笔记》。）

当时的外蒙黄教势力很大。光库伦就有喇嘛数万人。他们左右着外蒙的政权。辛亥革命后，在帝俄策动下，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宣布独立，并当上了“皇帝”，改元“共戴”。为了延揽人才，就让海山担任了内务部司官。在这个期间曾出使俄国，海山有机会参见俄皇，俄皇很重视海山，曾赐与狮皮褥子一件，金票若干元。因而，海山在外蒙的威望更加提高。

海山在外蒙的遭遇

海山任内务部司官后，一九一二年奉命往征科布多，与满清防营开战，将全城夷为平地。

当时外蒙的兵部司官是陶克陶。陶也是内蒙人。在日俄战

争中帮助俄国打日本。俄国战败后，成了东北著名的大土匪。东三省悬赏缉捕，他遁入俄境，辗转至库伦，经积极主张联俄独立的活佛亲信杭达引荐，成为外蒙的兵部司官。

海山和陶克陶同是内蒙人，陶主动接近并讨好海山，愿结为亲家以共同左右外蒙政局。外蒙独立不久，外蒙五十七位王公开会，在宴会之际有一位王公提议，将陶克陶的女儿介绍给海山之子，这时海山饮酒多了一点，便信口说出虎子焉娶犬女，致使两人发生齟齬，矛盾日深。

其时民国初立，袁世凯任总统，几次派人了解海山的情况。驻外蒙大员陈策了解到海山有“内向的愿望”。这些情况，陶克陶略有所知，遂在哲布尊巴丹面前密告海山，说海山在征科布多时残杀百姓，并私通中国。哲布尊丹巴大怒，“海山家被抄，功名几不能保。”（见陈策著《止室笔记》）。其时海山已有察觉，当抄家人员进入院内时，海山急令其丫环桂兰将与中国来往信件藏好，桂兰眼急手快，将文件藏入裤内，海山还告诉她设法将××箱子弄开，把有关文件销毁。来兵带走海山，把箱柜上了封条。

海山走后，桂兰和家里人将封条用唾液浸开，将与中国当局来往信件取出销毁，再原样封上。外蒙当局开锁搜查时，没有得到任何证据。因此，海山被捕后，虽受尽残酷的刑罚，但他心里有数，始终未招认。所以海山被押了三个月后，就释放出来，又复了原职。

决心回国

海山出狱后，感到处境困难，上得不到哲布尊丹巴的信任，

下得不到同僚的支持。加上贡桑诺尔布致书内外蒙及前后藏，劝他们归附民国，同造共和，海山回国之心遂决。出狱后多次请假，要求回国。正在这个时候，袁世凯派喀喇沁右旗希公爷（扮做商人）专去外蒙请海山回国。海山令海注川（海山之二哥）与希公爷先行回北京商讨回国事宜。主要是回国后的待遇和地位问题。袁世凯答应：在外蒙是什么地位和待遇，回国后也给什么地位和待遇。于是海山在一九一五年取道哈尔滨回国。

海山回到北京后，袁世凯曾亲自接见，赠与华丽的府第。袁世凯封海山贝子爵，蒙藏事务局总裁。海山长兄海汇川、仲兄海注川均封公爵、上将军。

海山回国后，为了表彰桂兰功绩，将她许配给自己专灶厨师梁馨，并在老家岗营子给安排了房子，还给不少地，梁的后代还住在那里。

海山到北京后，正值军阀混战，内乱不已。海山在家过着游闲的生活，就继续翻译《蒙汉合璧五方元音》。海山妻马氏精通汉文，在翻译这部著作时做了大量的工作。时间不久，即告完成。

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海山惊吓成疾。复辟闹剧过后，精神稍定。海山有个习惯，每日要有一定的时间，打坐闭目，默读诗文，借以养神。一日风雨大作，海山正在闭目打坐默读，女仆披蓑衣到海山房中送茶，启帘而入，帘声、脚步声惊醒海山，诘疑为鬼。受此惊吓，病情加重，不久即死去。

海山死后，北洋军阀政府，将其灵柩及全家老小送回喀喇沁右旗，以隆重礼议葬于老哈河北岸梅林窝铺西侧山坡上。

（宁城县政协供稿）

海山简历

吴紫云

海山是喀喇沁旗人（他家住在本旗东部哈达兰乌兰岗村，现属宁城县），他是蒙古族，他的生年不记得，可是他在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在北京继续翻译蒙文《五方元音》一书时，已年近古稀。他兄弟三人，他行三，人都称他“海三麻子”，幼年时他父亲聘师攻读蒙汉满文书籍，出学后在本旗任“管旗梅林章京”。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本旗发生“红帽子”暴乱，海山依仗管旗梅林的权柄，挟嫌剿办了当地大户张华堂（人称张三），张华堂不服，认了当地台吉鲍三为义父（鲍三是喀喇沁王的舅父），鲍三包庇了张华堂，见了喀喇沁王控诉海山诬良剿办。喀喇沁王听了鲍三和张华堂的话，责备海山，加罪撤去管旗梅林之职。

海山在一怒之下离开了本旗，其后又去外蒙库伦，参见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彼时外蒙独立伊始，正在招揽人材，任用海山为大臣。海山因事到俄国参见俄皇彼得大帝，俄皇接见海山后，对他很重视，赠与狮子皮坐褥，外赏金票若干。

那时中华民国刚成立，袁世凯听到海山在外蒙有所活动，就暗遣使者邀海山到北京，当即赐封海山为贝子衔，赠与府第，并加封海山各子为镇国公、辅国公等衔。

海山在北京时译成蒙文《五方元音》一书后，写了一篇自序，其中略叙他的出身和家乡。兹将原序附后，以供参考。

夫振兴教育，固为立宪基础，而译书启蒙，亦系兴学要纲，如无蒙汉合璧字汇善本，启迪童蒙，何以期速成而收实效。鄙人本系蒙藩下士，喀旗微员，才疏识浅，曷敢言学。缘生好读书，年进幼学，承父庭训，随同胞兄，出就外傅，共从八师，课读十有四年，全豹虽未得窥，文字常闻其略，自维承父训，受师傅，被王化，沐国恩，生成德大，报称毫无，每一念及，感愧交集，今虽致仕出疆，远托异方，遥听祖国兴学，不胜欣幸，望风祝颂，盼切普及，是以不揣鄙陋，直将《五方元音》一书，译成蒙文，且于每字之下增补一二蒙汉合璧成语，以供初学，随时便览，藉识字义，以资兴学，而尽义务。只以异域旅馆，并无书籍参考，亦无同志校正，冒昧撰杜，未免多欠妥协，其难译之字，均为阙如，统俟高明贤士，更正增补，俾成完善是荷。所译此书，虽云简陋；而于学界，不无少裨益，是为序。

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扎莎克亲王旗、哈达兰乌兰岗村、学海书屋主人瀛洲，海山译于恰克图旅馆。

中华民国六年（壬子）暮春穀旦译成。

男——会川永溥 引川永浚
纳川永函 通川永济 对校

厚山崇福 缮字
子衡书绅

章文轩统治鄂托克旗二十年

刘 映 元

（一）章文轩上台以前的鄂旗情况

鄂托克旗是鄂尔多斯部落的右翼中旗，在伊克昭盟中面积最大，物产最为丰富。它有轻工业原料的盐碱，如碱湖有查汗淖、纳林淖、哈玛尔台淖、巴音淖、达拉土鲁淖、小克泊尔淖和乌尔都淖等几十处；盐湖有苟池、北大池和敖包池三大盐池，另有其它许多小盐池。

鄂托克旗的大面积牧场和盐碱湖，过去多被陕西、宁夏的边商^①和军阀兼并霸占。回民起义^②以后，董福祥（回民）成了满清的功臣，也成了宁夏吴忠堡（现吴忠市）的豪门巨族。董在光绪初年就以极低的价格，从鄂旗王爷手里购买了长城兴武营以外的第一、第二两大段土地，面积共有九百多平方华里。董在所谓购买土地的同时，又霸占了哈玛尔台淖碱湖。董之所以能霸占鄂旗大量土地、碱湖，完全是凭借政治压力，因而能以很少的钱取得了这些土地与矿产的永久耕种权和开采权。民国以来，陕、宁一带

①边商——旧社会进入蒙旗作生意的汉族商人。

②回民起义——清同治年间，宁夏马化龙（回族）率领的回民反清起义。

的军阀更变本加厉。榆林井岳秀^③的骑兵司令高硕秀在定边驻防时，于一九二二年把鄂托克旗长城口外的第三段地开放。这段地东西有一百二十华里，南北宽约二十华里，约有两千四百平方华里，大于董福祥霸占面积的二倍多。另外，还霸占了呼芦素淖碱湖。现在宁夏黄河东岸的陶乐县，原也为鄂托克旗的一部分，绥远省曾成立过沃野设治局，解放以前也变成了宁夏二马（马鸿逵、马鸿宾）的私人财产。至于鄂旗王爷卖给陕西、宁夏边商的土地，其面积并不小于被军阀霸占兼并去的土地。

由于牧场逐渐缩小，鄂旗牧民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城川一带的牧民，从光绪八年就开始不信喇嘛教，信仰了天主教。光绪二十六年鄂托克旗和乌审旗的蒙族军民，受了义和团的反帝影响，在鄂托克旗的垦地上破坏过三十多座天主教堂，并且参加了围攻小桥畔洋堂的战役。小桥畔因有蒙族教民在教堂内死守，外国人才得以保全生命。辛丑条约签订后，庚子赔款时，以闵玉清为首的法国和比利时传教师，向鄂托克旗施行了凶狠的报复。死一个洋人要赔银子十万两，死一个二洋人（中国人中的教徒）要赔银子一万两。小桥畔洋堂被打死一个外国神甫和十几个中国教徒，鄂旗共负担了二十万两银子的赔款。为了筹款，把安边口外约有一万二千平方里大的一块草场抵押给教堂，叫赔教地，还筹不足这一笔巨款。王爷又强迫牧民十羊抽一、抽二地给凑数，及到十羊抽五的时候，牧民忍无可忍，全旗爆发了八处“独贵龙”运动。教堂看见官逼民反，恐将事态弄大，没有敢继续追索。虽然如此，已经把广大牧民都弄得倾家荡产。以致同治年

③井岳秀——清末民初年间，任过榆林镇守使，是榆林地区的土皇帝。

间回民起义战争结束后恢复起的一些元气，又受到严重摧残。

鄂托克旗经过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鲸吞蚕食，王府的权利损失殆尽，各种行政开支都由牧民负担。特别是王爷债台高筑，牧民把牲畜统统缴给衙门也无法偿清。由于葛王（葛拉森如拉玛旺吉拉札木苏）昏庸无能，对仕官和大财主、大牧主没有约束能力，许多拥有奴隶的大牧主以及豪强多不服从衙门，在自己牧场的周围，纷纷搞起了独立局面，将鄂托克旗弄得四分五裂。因为互相争权夺利，不断发生火并。将官司打到盟长那里，甚至派代表到榆林找井岳秀出兵协助，或者是去宁夏向马鸿宾告状。兼任伊克昭盟盟长的达拉特旗扎萨克逊博尔巴图和扎萨克旗扎萨克沙克都尔扎布，都曾派员带兵来处理过鄂托克旗的内部纠纷。这些人役驼马到了鄂托克旗，成天大吃二喝，两三个月解决不了问题，并且还接受贿赂和勒索礼物。酒食肉面由衙门向“边商”赊购，银钱绸缎由牧主向牧民摊派，把地方搞得乌烟瘴气。以致良善的牧民饥寒交迫，终年处于动乱和惊恐之中，不能安心从事生产。最后连召庙的喇嘛亦受到影响和干扰，无法脱离凡尘超然世外。阿拉庙的活佛章文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出佛殿，抛掉经卷，参与了政治活动。

（二）章文轩由“独贵龙”起家

鄂托克旗阿拉庙的活佛沙德如布旦毕扎拉僧，俗名扎木杨什拉布，汉名章文轩，又名尔利喇嘛（即：阿拉庙的喇嘛），一八九七年生在苏秘图的一个贫苦牧民家庭里。十八岁时被送到青海塔尔寺学习藏经，三十岁回到鄂托克旗，先在新生召担任“堪

布”。新生召是鄂托克旗所有召庙的“庙府”^①，里边设有审讯和惩罚犯罪喇嘛的皮鞭和镣铐。章文轩家里有四户不属于参领管辖的伙夫，由他使用和支配，平时替他放牧牛羊、干家务活。章文轩既是活佛又是堪布，不论僧俗人看见他都得磕头跪拜。他在鄂托克旗说一句话，比葛王所起的作用还大。

光绪二十七年，鄂托克旗因为赔款把牧民逼反，全旗起了八个最大的“独贵龙”。“独贵龙”是不分男女老幼都参加的一种革命组织。起先是反抗衙役兵丁到“苏木”（乡一级的行政单位）征要牲畜，或是不愿从王爷卖出或租出的草原上迁移，看见戴“顶帽”的（衙役）到来，就发出愤怒的呼喊，并将其包围起来扬着沙土乱打。如遇军队，能抵抗则齐心合力抵抗，不能抵抗就打游击战。衙门对于“独贵龙”非常头痛，葛王简直无法应付。最初鄂托克旗的八个“独贵龙”，还到十三敖包聚会，联合在一起反对开垦牧场，将其耕牛杀死，农具烧毁，直到闭地为止。以后因为各个“独贵龙”的领导权被贵族、牧主和土匪恶霸篡夺，彼此猜忌，互相倾轧，加上葛王用官爵收买各个“独贵龙”首领，因而难以开展大的斗争和发动总的进攻。民国十年以后，鄂托克旗延续了二十年的“独贵龙”运动便逐渐消沉下去。不过在章文轩统一鄂托克旗以前，全旗仍存在着八个各自为政的“独贵龙”势力范围。这八个“独贵龙”是：巴音淖附近的查汗敖肯“克泊尔独贵龙”，由查汗敖肯领导；西卓资山一带的“阿尔巴斯独贵龙”，由奔特格尔宰桑和哈尔勒特宰桑领导；靠近乌审旗的“苏秘图独贵龙”，由在家喇嘛帕勒嘎尔领导；宁夏陶乐县以

^①庙府——主要召庙，此庙管理全旗召庙的人事。当时的旗衙门还派官吏（非喇嘛）专事管理。

南的“查布独贵龙”，由出家喇嘛色地力布领导；平罗县黄河沿岸的“布拉圪独贵龙”，由财主毛巴素和退職边官秃明领导；城川洋堂附近的“珠和独贵龙”和“查汗陶勒盖独贵龙”，都是由牧民领导，前者的领导人是包勒德，后者的领导人是特木尔。章文轩后来参加的“独贵龙”，是牧民包勒德领导的“珠和独贵龙”。

章文轩参加“珠和独贵龙”后，因和其它七个“独贵龙”或团结，或兼并，逐步弄到一起。从此，章文轩就掌握了该旗大权，把葛王视如木偶。不过，他自始至终，标榜自己是出家人，以后担任了司令，仍旧穿着长袍，一切命令都以王爷的名义发布，为的是名正言顺。不到三年功夫，便将整个鄂托克旗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三）章文轩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章文轩于一九二三年领导了鄂托克旗的“独贵龙”。当时，鄂托克旗的环境非常复杂。虽然他的号召力不同于以前各个“独贵龙”的首领，团结的人也比较广泛，但是群众多半还是赤手空拳。所以他初搞军队时只有二十多支来复枪和老毛瑟枪，很需要用新式武器将队伍装备起来。大财主们已经有了私买的快枪，只给自己保家，不参加“独贵龙”。章文轩最初不仅不能驱逐井岳秀的军队，连跟过“灯影子”^①的普通人都不能对付。把扎萨克旗的仁庆日格巴赶跑以后，随时提防盟长沙王（沙克都尔扎布）再派人来，也怕乌兰哈马尔图巴图尔对他进行报复。每天根据

^①灯影子——一个抱打不平者的绰号，名叫扎娃。

各“个独贵龙”送来的情报转移驻地，很长时间不敢回阿拉庙，常在沙窝或柳林中野餐露宿。章文轩为了尽快地结束这种游击状态，就竭力寻求外边的援助。经扎萨克旗的旺丹尼玛活佛和乌审旗席尼喇嘛的介绍，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接上了关系。先是旺丹尼玛回伊盟活动，到鄂托克旗找到章文轩给了他两支步枪，把他吸收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叫他跟乌审旗的席尼喇嘛取得联系。旺丹尼玛被沙王的儿子格拉僧义西活佛谋害，回到包头因中毒死于泰安客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复派郭道甫到伊盟工作。席尼喇嘛通知章文轩，让他到鄂托克旗衙门跟郭道甫会面，郭道甫给了他十二支联珠步枪和五千发子弹。章文轩的游击队经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装备，加上自己购买了一支日本造步枪和一支德国造手枪，才算有了一点实力，队伍逐渐走向正规，开始在鄂托克旗站稳了脚步。

一九二七年春天，章文轩到乌审旗与席尼喇嘛联系，接到白云梯从宁夏发来的一个通知，叫席尼喇嘛和章文轩前去开会。席尼喇嘛因为离不开军队，派了孟克乌力吉为代表，章文轩也带着随员陞济秘图去了宁夏。在宁夏，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开了两天大会，章文轩、孟克耳居为鄂托克、乌审旗的代表；韩裕如（蒙名：乌尔根达来）、锤乃为准格尔旗、扎萨克旗的代表；奇子俊为伊盟的代表，还有察哈尔盟代表贺志远，西公旗代表蒙亥等，连同随员共二十余人。会后，白云梯没有让他们回旗，领上他们到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去参观学习。去的时候路经阿拉善旗，乘着国民军运输军火的汽车，走了十三天到了乌兰巴托。在乌兰巴托适有内蒙留苏学生白海风、乌力吉敖喜尔、云绒等从莫斯科回来，与宁夏的代表一起，开了为期一个月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会。会上，对白云梯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

评，两派斗争非常激烈。章文轩很少发言，因为他不懂政治理论，站在中间立场上观望。会议决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另立中央，罢免了以前的七名中委，另选了白海风、云绒、章文轩、孟克乌力吉为新中委，最后由外蒙建议把郭道甫拉入，仍任秘书长。这时国内蒋介石和汪精卫合作，冯玉祥也向右转，国民党从四月十二日开始，发动了席卷全国的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进步人士的大屠杀。白云梯看见政治形势逆转，便悄悄地爬上冯玉祥的运输军火汽车溜走，将从宁夏带去的人，完全扔在乌兰巴托。

白云梯回到宁夏后叛变革命，投靠了南京的蒋介石，给乌兰巴托去了一个电报，声称“绝不允许从莫斯科回来的人，踏上内蒙古的土地”。乌兰巴托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左派，当即撤销了白云梯等人的职务，决定由孟克乌力吉任中央委员会委员长。由于国内局势日益恶化，他们在乌兰巴托等了半年多，仍然没有机会回国，只好住在宾馆里边看马列主义书籍。章文轩很关心鄂托克旗的“独贵龙”，不知他离开以后成了什么样子，所以非常无聊、愁闷。入冬，章文轩和孟克领了工作费数千元和路费、皮衣费，还领到了两支联珠枪及数百发子弹，让他们回内蒙去找席尼喇嘛。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在宁夏的以白云梯为首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完全倒向国民党。白云梯到南京去奔走活动，由李丹三代理总书记和革命军总司令。孟克乌力吉一到宁夏便被逮捕，章文轩也被软禁起来，枪支完全没收，旅费亦被搜走。章文轩和陞济秘图住在旅店中，虽然还允许他们上街，但后边跟着便衣特务。因此，他们也就不大出去，只是去找奇子俊设法帮助他们离开宁夏。奇子俊是准格尔旗兼理扎莎克纳森达赖的儿子，当时住在师范学校，由苏雨生骑兵师的兵负责保护。

在宁夏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负责人之一的伊德钦，叫章文轩把旺丹德尼玛和郭道甫发给鄂托克旗的枪收缴了。“珠和独贵龙”的人没有章文轩的命令死也不肯交出，章文轩被迫派陞济秘图回去解劝说服，把枪缴给伊德钦的副官，另外装备了色当台吉，只剩下章文轩的一支日本造步枪和一支德国造手枪，由伙夫们给隐藏起来没有交出。

一九二八年黄河解冻以后，孟克乌力吉虽被释放，但仍不让孟和、章文轩等人离开宁夏。经奇子俊暗中帮忙，一面派人去阿拉庙叫普勒钟喇嘛带着马匹到河东横城等候，一面派一连人把孟克乌力吉和章文轩护送出城。这样，他们才算逃出宁夏，回到伊克昭盟。此先，“珠和独贵龙”的人，听见章文轩在宁夏被囚，以为没有生还的希望，把枪缴给色当台吉之后，都四散回家另谋出路。章文轩回来后，只集合起阿拉庙附近的几十个人。因为势孤力单，他怕被色当台吉和乌兰哈马尔图巴图尔的人歼灭，又去沙窝柳林中隐蔽。有一个时期，简直无法在鄂托克旗存留，还到准格尔旗杨家湾奇子俊的父亲纳森达赖家里躲了一个时期。直到“布拉圪独贵龙”的人赶走色当台吉，色当台吉被乌兰哈马尔图巴图尔打死，方将章文轩由准格尔旗接回。不久乌兰哈马尔图巴图尔得了精神病，牧民以为是被章文轩用“黑经”给噙成疯魔，各个“独贵龙”的人都重新接受了“珠和独贵龙”的领导。葛王看见章文轩东山再起，任命了“珠和独贵龙”的领导人包勒德为参领，所以到了一九二八年冬天，章文轩又重新掌握了鄂托克旗的大权。

章文轩二次上台以后，表面上仍然表示拥护葛王。因此一九二九年春天，葛王还带上他去归绥晋谒绥远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李培基知道章文轩很有才干和威望，便发表为鄂托克旗旗务帮办和保安大队长的官衔，叫他协助葛王治理鄂托克旗。因而各个

“独贵龙”的人对章文轩更加服从。章文轩便把他们编为八个保安连，以后又扩充为十二个连，都归保安大队部指挥。一九三〇年，宁夏主席马鸿宾为了争取笼络章文轩，又给了他一个宁鄂边界巡防司令的名义，并且赠送了一百支步枪，章文轩的实力和声势更加增长、扩大。

章文轩本由“独贵龙”起家，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又给予过他很大的帮助，但因为他在宁夏受过李丹三和伊德钦的软禁，因而再次上台以后，便恨搞党务工作的人，特别对东部区的人成见更深。他原先和席尼喇嘛非常接近，由于席尼喇嘛走上真正的革命道路，他却步入专制独裁的途径，两个人的关系便日渐疏远。一九二九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派到乌审旗的几个工作人员，在回往宁夏的途中，还遭到章文轩的袭击。

（四）章文轩为鄂旗偿还债务与收回利权

章文轩统治鄂托克旗的前十年，对恢复地方的生产作了一些事情。章文轩出门的时候，穿着喇嘛的衣服，带着两三个便衣卫士，拐弯抹角地走小路，到贫苦的牧民家中食宿。这固然是为了安全，避免受到暗算，但也是一种私访，能体察牧民的疾苦。章文轩知道造成鄂托克旗牧民穷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王公仕官奢侈无度，军阀、边商侵占、典押了大量的土地、矿产，以致旗府无财政收入，只好加重牧民的负担，所以他首先决定还清各种债务，把鄂托克旗从高利贷的重压下解脱出来。章文轩在收回鄂旗土地矿产权方面，并非一帆风顺，他用先礼后兵寻求外援等手段，才逐步解决了这个问题。

李培基担任绥远省主席时，省政府有个名叫杜布当的参议，

原先任过察哈尔厢兰旗的总管，以后在归绥小召内住家。此人对章文轩偿还鄂旗的债务和收回鄂旗的利权，起过很大的协助作用。李培基派他到鄂托克旗视察，看见牧民在军阀和边商的盘剥压榨下痛苦呻吟，很表同情，就向章文轩提出赶快还债收回土地、矿产权利的建议，并劝章文轩跟上葛王去见李培基。一九三〇年杜布当带着一个姓高的参议，专门来鄂托克旗帮助章文轩办理此事，用省政府的名义把债主们请到卓力克庙开会，除高硕秀、郑万富和董逸千（董福祥的五儿子，人称董五少爷）三家外，都出席了会议。杜布当按公平价格折本，用普通利率算息，数目小的当时付钱毁约，数目大的分三年还清。几个小碱淖的占有者经此一算，反而欠下鄂托克旗的债务，可是章文轩念他们开采有功，不让他们马上破产失业，决定头一年归还三分之一，第二年再还三分之一，到第三年全部归还。欠神木刘子明、榆林戴鸿业和定边高俊等九家大债主的债，是用欠债不再付利和种地租矿不再出租的办法，分期逐年赎回，边商比较胆小，看见章文轩很讲道理，又有绥远省政府给撑腰，并且他们还想在鄂托克旗存在下去，所以纷纷就范。鄂托克旗除了还清债务，还将二道川和义老湾的好几千顷土地，完全收了回来。

被董福祥霸占的董家地和哈玛尔台碱湖，比较费了一点周折。章文轩派参谋武云章（蒙名：陈亚尔扎布）到吴忠堡跟董逸千算帐。谈妥用现洋四千元赎约，章文轩即把款子筹齐，派阿拉庙的根东喇嘛送到吴忠堡。他们进了董府，董逸千把约掏出说：“这就是当初的契约，你们点款吧”。叫十几个家人数钱，边数边往金柜中盛放，待把钱数完，却把脸一翻，胸脯一拍说：“约在这里，不能拿几个臭钱就随便赎回去，咱们打官司吧！”弄得武云章交了钱，却没有赎回土地和碱湖。在吴忠堡，敌不过董府的

势力，回鄂托克旗报告，又向章文轩交不了差事，只好领着那个根东，去宁夏省城向马鸿宾哭诉。马鸿宾和章文轩的交情很好，打电话叫吴忠堡的驻军扣押董逸千，董家害怕了，才把契约交出。

郑万富霸占的查汗淖碱湖，是在一九三五年开始收回。那时，蒙政会已经成立，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派驻鄂托克旗的人，也帮助章文轩往回收取从前丧失的利权。因为郑万富是葛王的磕头弟兄，并且郑万富来时依旧带着厨师大宴宾客，好多办事人都被软化，章文轩也不忍加以硬逼，只是将永租的死约变为活约，决定郑万富在世一天，查汗淖碱湖仍由郑万富开采，每年交租银一千五百元银洋。查汗淖是鄂托克旗最大的碱湖，年产天然碱六百万斤。商人和脚户到碱湖上买碱，每百斤银洋一元，郑万富除过花费，年可获纯利五万多元，一千五百元租金，只有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二点五，实际等于没有收回。郑万富却因此气病，卧床不起，到一九三七年春天便去世了。郑死后，他的侄子郑尚德和孙子郑继祖对于查汗淖仍不想放手。郑万富死后不久，郑尚德和郑继祖就又带着厨师来到鄂托克旗，说是向葛王报丧。其实是想跟章文轩办碱湖的事，章文轩听见郑家的人来了。便连夜离开阿拉庙。查汗淖的经理刘子明领着郑家的叔侄寻到新生召，三个人见了章文轩爬倒就磕头，跪在地上不起来。说郑家经过冯玉祥和孙殿英两次骚扰，内囊尽空，现在死人躺在棺材里了，还没钱办理丧事，请求佛爷司令慈悲、扶助。章文轩被纠缠不过，查汗淖又叫郑家办了一年，直到一九三八年才完全收回。

巴音淖碱湖是最后收回的。山东蓬莱的郭永熙，是于一九二五年和葛王订立租约的。订约的时候，原订租期三十年。旗府中的“笔帖式”（秘书、文书）故意在文字上要了些把戏，郭家的办事

人当时没有看出。按照合同的文义，鄂托克旗可以随时将碱湖收回。章文轩据此要收回巴音淖，郭家人一拖再拖，直到一九四六年才收了回来，其时章文轩已被杀了。巴音淖周围二十里内的好地也尽行封闭，成了肥沃的牧场。

鄂托克旗除过土地和碱盐，征收掏甘草的捐税和收牧场的水草费，也是一笔很大收入。掏甘草每捆征税一元，夏口来避伏放场的牲畜的“水草费”每只羊是一角，牛马是五角，骆驼是一元。过去这些税收不是边商抗不缴付，便是入了参领和台吉们的私囊。章文轩统治以后，连这些利权也都收回，因此鄂托克旗的财政一天比一天好转，社会秩序一天比一天安定，牧民负担减轻了，生活也有所提高。章文轩严禁贪污，一经发觉，便被整得倾家荡产。章文轩把土匪肃清、军阀赶走之后，谁也不敢在鄂托克旗为非作歹。

（五）章文轩和外界的关系

章文轩是一九二九年担任了鄂托克旗旗务帮办兼保安大队大队长，一九三〇年担任了宁鄂边界巡防司令，到一九三四年以后，他在鄂托克旗的统治就很巩固了。一九三五年他亲自去杭州，把班禅请到鄂托克旗的新生召，这在宗教生活中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班禅的到来，不仅使鄂托克旗的人对他更加信仰，就是在整个伊克昭盟也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于是阿拉庙引起了各方面注意。虽然如此，章文轩在许多方面仍请葛王出面，自己在幕后操纵。鄂旗政事都是章文轩在阿拉庙决定，交旗府盖印。葛王是个无能的人，他看见章文轩上台之后，自己成了太平王爷，便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甘于充当傀儡。有时章文轩闯下乱

子，也由葛王承担责任。

鄂托克旗在收回土地和矿权的时候，只跟高硕秀打过一次仗。高硕秀是陕北哥老会的大龙头和土匪头。经井岳秀收编，给了一个骑兵司令的名义。章文轩向他赎取二、三段地，无异与虎谋皮，因为他兵马众多，只好等待时机，听任他在呼芦素淖修建寨寨驻兵、设卡收税。其后高硕秀的人把鄂托克旗派去征要“水草费”的哈日夫等五个人杀害，激起了全旗牧民的愤怒。当高硕秀到山西汾阳住闲，留下他的干儿高锁儿看家时，章文轩就集结全旗的队伍，包围了呼芦素淖寨，把高锁儿带的一百多骑兵赶跑，烧毁了寨堡，用武力收回了三段地。

章文轩跟高锁儿打仗时，发现自己的士兵还是些乌合之众，需要加强训练。遂聘请参加准格尔旗政变失败的韩裕如为参谋长，奇景峰为伊南游击司令部第二大队副队长。这时鄂托克旗的保安司令部已经成立，由章文轩兼保安司令。韩裕如和奇景峰来到以后，先把司令部从阿拉庙搬出，设在距阿拉庙三公里地方的一个山头寨堡里边，占据了制高点，容易保护阿拉庙这一神经中枢。他们还向章建议设立一支常备队伍，经章同意，于是在原先鄂旗的八个连之外，又成立了两个大队（四个中队）。从此鄂托克旗有了机动部队，分驻在苟池、阿拉庙和北大池。

一九三六年冬天，鄂托克旗和乌审旗因相互侵界，烧毁召庙，赶走牲畜，打了三个多月的仗。一九三七年春天，傅作义派赵金标和张尔逊为委员，带着一团骑兵前来调解，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双方才停止了武装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乌审旗损失很大，乌审旗本来就贫寒穷苦，这样一来牧民越发穷困不堪。

章文轩跟乌审旗作战时，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也很成功。那时，“绥蒙指导长官公署”在各旗均安设了电

台。战事一起，章文轩就叫葛王天天给归绥打电报，在舆论上赢了一着。对傅作义所派来的赵金标和张尔逊和带来的士兵，赠以贵重礼物，在食住方面都给以很好的安排。因而调解人员处处偏袒章文轩。

此后，章文轩更加重视对外交际活动，以应付四周的环境。他对宁夏的马家弟兄，陕甘宁边区的红军和太原、归绥的晋绥集团都拉关系。尤其对马家特别接近。宁夏是鄂托克旗的紧邻，马家处于客军地位。由于鄂旗归属绥远，马家不好过多干涉。而章为了拉住宁夏二马，便把鄂旗和宁夏交界处的一块大牧场的一切权益交给马鸿逵。后来，这块牧区即成了宁夏的陶乐县。因此，双方礼尚往来，交处很好。一九三八年抗战开始不久，经马鸿逵介绍，朱绍良发表章文轩为“伊南游击司令”。一九三六年夏，红军西征时，解放了定边、盐池两县，将马鸿逵的队伍赶走，苟池、鄂包池、北大池等都为红军解放。为了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红军主动将这几个盐池归还了鄂托克旗。当时，章文轩派陞济秘图前去接收。红军到达三边以后，认为章文轩是一个可以团结争取的上层人士，曾派赵通儒等跟他联络。章文轩和红军开始是虚于委蛇。一九四〇年国民党军何文鼎部开到桃力民（在鄂托克旗、杭锦旗和达拉特旗三旗交界处，绥远省政府拟在那里单独设县，先成立了桃力民办事处，行政地位相当于县），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影响下，章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挑拨离间，积极和陕甘宁边区闹摩擦，要赶走三段地的共产党工委的工作人员。当时，驻三边的八路军，对章文轩的无理挑衅，在一再忍让之后，军事上给予坚决还击，打掉了章文轩的狂妄气焰，同时，又在政治上积极争取他，曾派赵通儒、周仁山去阿拉庙，直接和章文轩见面，指明他的前途利害。从此，他的态度才有所转变。对晋绥

集团则是交结阎锡山、疏远傅作义。一九三六年，章文轩曾派葛王的儿子旺钦扎布到太原见阎锡山，阎赠给章文轩晋造三八式步枪五十支。抗战以前，他不敢接近傅作义。傅于一九三一年当了绥远省主席后，章文轩有六七年没有敢去归绥。害怕傅作义抓他。

章文轩会见傅作义，是一九四〇年傅作义于五原打了胜仗以后的事。章文轩知道傅作义非常爱名，所以他到陕坝（今杭锦后旗）的时候，没有携带黄金白银礼品，而是特地从宁夏制作了一个很富丽堂皇的锦旗，另外带了十匹良马和二百只肥羊慰劳军队。傅作义也在中山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并给鄂托克旗成立了一个炮兵连。特别是当他要到塔尔寺拜佛时，傅作义还给甘、青、宁三省去电介绍，这样他对傅作义才没有了戒心，由疏远渐渐靠拢，鄂托克旗的煤矿才允许绥远物资管理处插手。后来几个碱湖几乎被“绥远省合作事业管理处”都接办过去。在他去塔尔寺的路上，确实受到各地的欢迎接待。

章文轩同国民党军统和日本人也有过勾结。军统褚大光曾带领特务到鄂托克旗活动过一个时期，挑拨章文轩同陕甘宁边区搞摩擦，收买了奇恩成、杨森扎布、刘宝才等人。一九三八年年初，日寇曾派特务人员到阿拉庙，并修筑了一个简易机场。由于被共产党发现，同时国民党也派驻三边蒋云台旅的一个连进驻阿拉庙，才把这个机场平毁了。

（六）章文轩的倒行逆施和众叛亲离

章文轩在一九四二年冬天，到青海的塔尔寺拜佛时，带领着鄂托克旗以及伊盟其他旗的大牧主一百多人，骆驼二百多峰，随

行的行列很长。沿途受朱绍良、马鸿逵和马步芳接待，在塔尔寺更受到隆重的欢迎。章文轩对此非常得意，更加高傲起来。他把自己的“成功、胜利”，完全归于神佛的保佑，因而更加迷信宗教，逐渐脱离群众，最后导致众叛亲离的地步。

章文轩大肆挥霍鄂旗资财。他把鄂旗的财产税收，百分之九十都毫不吝惜地捐献给召庙。他把鄂托克旗所有召庙修葺一新，还建筑了五座新召庙，每一座新召最少花费三万元银洋。陕北的泥匠、木匠、画匠都跟着发了财。一九三四年请班禅来鄂旗，因为班禅迟迟不来，准备的好几万斤羊肉和酥油腐烂霉坏，来了以后，三百多人住在新生召大吃大喝了三个多月，班禅回西藏时，五百多峰骆驼驮满了财物，连鞍垫都是鄂托克旗赠送的。章文轩曾两次朝拜塔尔寺。该寺有喇嘛三千余人，头一次去的时候，他给每一个喇嘛五元银洋；第二次增到七元。这还不说他亲自给塔尔寺上的布施，以及回到鄂托克旗经常派阿拉庙的喇嘛给送去的金钱。他在塔尔寺还有一处住房，将鄂旗很多的钱财放在那里，准备在那里渡过他的晚年。查汗淖从郑万富的手中收回以后，章文轩当时就把这个每年有五六万元收入的矿产拨给新生召，养活喇嘛，所以他的部下对他这种做法，都表示愤愤不平。

章文轩初领导“独贵龙”的时候，曾和部下表示说：“只要把土地和矿产收回，你们的生活就能改善。”但是他统治了鄂托克旗二十年，一直没有实行这一诺言。官兵生活很苦，吃的是发霉的粮食，穿着破烂衣服，不按月关饷，部下穷得连买旱烟的钱都没有，莫不叫苦连天。章文轩在临死以前，对待兵不如对待狗，他从塔尔寺带回好几条大狗，派专人每天拿白面羊肉喂养。有一个新兵替他站岗，狗看见生人便咬，这个兵开枪吓唬，误将狗打死，章文轩听见勃然大怒，叫他的侄子（是章与妍妇所生之

子，称侄子）章跃武（蒙名：根片力）用黑牛皮鞭把那个兵打成残废。还让喇嘛给死狗念经超度。所有这些，都使跟他多年的部下感到寒心和失望。

章文轩严禁烟毒，不论是谁贩运吸食鸦片，一经发现便被处死。他的侄子根片力拿公款贩卖烟土几千两，六角一两买入，以六元一两的高价出卖，获利达十倍。章文轩却装聋做哑地不加过问。他有好几个侄子，都不务正业，带着手枪横行霸道，经常骑马在外游荡，强奸牧民妇女。牧民对之愤恨入骨。章文轩把土地赎回以后，有人建议拨出一部分让军队耕种，以改善官兵生活，他也不予允许。日久天长，官兵对他更加不满。

章文轩从塔尔寺回来以后，目空一切，与他的亲信也越来越疏远，连韩裕如和奇景峰等人的话也听不进。原先是韩裕如任参谋长，包玉玺任秘书长，马富刚任秘书，陞济秘图任副官长，顾寿山和巴代等任直属中队的中队长。后来他把韩裕如调成参议，由奇景峰担任了参谋长，将巴代撤职，顾寿山调任副官，同时还撤换了其他许多军官，奇景峰实际也被夺了兵权。章文轩的钱，并不是都放在阿拉庙内，而是让伊南游击司令部和鄂旗保安司令部的几个高级军官分别保管，只许看守不许动用。连跟他出生入死的陞济秘图也开始被怀疑，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跑来查看陞济等人保管的金柜，叫阿拉庙的喇嘛给一五一十地点数，怕他们贪污挪用。

葛王于一九三七年病故，由次子旺庆扎布继续担任扎萨克，西协理是奇恩成的祖父，东协理是旺楚克色令。旺庆扎布亦于一九四三年死去，由东协理护理扎萨克印务，奇恩成的爷爷因年老退休，把印交给旺楚克色令。葛王的四儿杨森扎布，本来已经出家当了喇嘛，为了想继承王位，还俗娶了老婆，章文轩只给了他一

个副协理的职务。章文轩看见鄂托克旗的仕宦台吉，都是些碌碌庸庸之辈，只看准了西协理的孙子奇恩成，想培养他成为自己的继承人。便让奇恩成担任西协理，还让奇恩成担任伊南游击司令部副司令和鄂旗保安司令的要职，章文轩培养奇恩成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使他的两个侄儿将来能依靠王公后代在鄂旗站住脚跟。章文轩对待奇恩成可谓不薄，但是奇恩成却对他很不满意。

由于这种种原因，终于爆发了1946年鄂旗兵变、章文轩被勒死的事件。

（七）鄂旗政变和章文轩被杀经过

鄂托克旗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对于章文轩的倒行逆施很不满意，又加受到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影响，早就想举行武装政变，推翻他的统治。因为高级官员的压服，所以迟迟不能发动。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的“复兴公司”拨来大宗款项，叫鄂托克旗代它收购皮毛。上自奇恩成下至每一个连排长，都顶了大小不同的股子，拿“复兴公司”拨来款项中的一部，在查汗淖碱湖上开办了一个供销合作社。这事被章文轩知道了，不仅封闭了合作社，还来了一个“整风”运动，连奇恩成也受到很大侮辱。这更激起了部下的不满。

一九四五年阴历腊月初，顾寿山就不和章文轩见面，经常带着手枪在阿拉庙周围转游，驻扎在司令部寨子里的马良成的部下，也剑拔弩张。中共鄂托克旗工委领导人周仁山同志了解到这些情况，便特意从三段地前来劝说章文轩，用和平协商的办法解决内部矛盾。章文轩反说什么他的部下对他拥护到底，绝对不会出什么问题，叫周仁山同志放心。周仁山同志见过章文轩以后，从阿拉

庙到保安司令部寨子里休息，奇景峰参谋长提出要到解放区躲避一个时期。周仁山同志为了不使鄂旗事态恶化，章文轩同部下之间需要有人从中斡旋，便劝说奇景峰不要离开。第二天周仁山同志走了以后，章文轩还特意来司令部打听周仁山同志跟奇景峰谈了些什么，奇景峰如实以对。章文轩说：“你不要庸人自扰，听他的挑拨离间，这里没有什么事情。”他要奇景峰去办一件谋害本夫的命案。

经常有三连士兵防守阿拉庙和司令部的寨子。其中，一个连是每月初十轮流换防。阴历腊月初十这天，接防的连来了，移防的连却没有丝毫开拔的迹象。奇景峰感觉事情不妙，便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司令部。在离司令部不远的地方住下。第二天清早，刚刚喝完茶，就有个士兵骑着马从阿拉庙跑来找他，说顾副官和马队长请参谋长赶快回司令部，有紧要事情相商。奇景峰返回司令部以后，顾马二人即告诉他，这天拂晓，他们已收缴了阿拉庙卫士的枪，章文轩已被囚起，希望他回来协助处理善后。奇景峰感到左右为难：他同情政变，但又不愿跟顾、马干，又加自己和韩裕如是准格尔旗人，更不能参加鄂托克旗内部事务。因此不愿插手，免被牵连。

章文轩激起兵变还有一些原因，例如他对包玉玺和乌巴什（汉名：赵国雄）很厌恶，和乌巴什还因争夺一个女人有宿怨，常欲加罪于二人。包玉玺曾经建议将三段地的一部分作为学田，并且已经开种三年，当地还居住有四五百户农民，乌巴什在那里也立有牛圈，种了些田。一九四五年春耕的时候，章文轩突然叫包玉玺和乌巴什去闭地，说是闭不了就要把他们俩活埋在那里。学田靠近解放区，农民坚不迁移，并且把包玉玺和乌巴什保护起来，派代表到阿拉庙向他跪请开释。事情虽说没办成，但是却使部下感

到：章文轩办事阴险，借刀杀人，好多军官都有说不定那一天也会被章文轩整死的想法。

鄂托克旗发动政变的官兵把章文轩扣起来以后，囚在一座蒙古包里边，派兵严加把守。腊月十一日，顾寿山和马良成叫奇景峰去见他的时候，章文轩穿着喇嘛的紫色皮袍，坐在毡上烤火，态度非常镇静，还和往常一样谈笑自若。只说：“年青人不想要老头子了，这也很好。”他好象是想问自己的生命有无危险，或是想让奇景峰设法营救，因有看守，没有说了出来。

这天，三段地的中共鄂托克旗工委把鄂旗政变情况报告了延安，回电要首先保护章文轩的安全。奇景峰见过顾寿山、马良成，看了章文轩以后，即去三段地中共鄂托克旗工委找周仁山同志联络。商定腊月十四这天，请顾寿山和马良成陪同章文轩前来工委开会，进行调停。但是到开会这天，只有顾寿山和马良成来了，他俩身后跟着阿拉庙的一个报丧喇嘛，说：“活佛昨天夜晚死了。”经了解，才知顾马等人看到开会通知上列有章文轩的名字，知道共产党不愿杀害章文轩，他们害怕章文轩重新掌权进行报复，遂派人在阴历腊月十三晚上，用麻绳将他勒死在蒙古包内。章文轩从一九二四年参与政治，到一九四六年初结束生命，享年六十一岁，统治鄂托克旗整整二十年。

（一九六五年五月）

巴布扎布事略

正珠尔扎布

巴布扎布于一八七五年生在蒙古镇旗（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今辽宁阜新县）一个贫农家庭，他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其中一个出家当了喇嘛，一个妹妹，他本身有三男二女，我是第三子。

巴布扎布由蒙古镇旗迁居到苏鲁克旗（彰武县）乌和林果勒。以后又迁到大冷营子，在那里扎了根，成了富农，日俄战争后，成了官僚地主。

一九〇四年日本和俄国在我国领土上交战（日俄战争），这时巴布扎布二十九岁，日本派遣一批军事间谍——松周胜彦、边见勇彦、大岛与吉等到苏鲁克旗一带招募“洋队”，巴布扎布参加了。同时应募的还有张作霖、冯麟阁等人。“洋队”的任务是扰乱俄军的后方，切断粮食和武器的运输线，截劫这些东西。巴布扎布又率领群众参加了日本的永治沼挺身队，爆破范家屯铁桥，切断俄军退路。

巴布扎布这样有力地帮助了日本军，因而得到了枪弹粮食和金钱，发了一笔洋财，充实了武力，他在地面上出了名，部下也陆续增多。一九〇八年他被任为彰武县区官，由于保护地面、打土匪有功，得过赵尔巽的奖状。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满清皇朝崩溃。当时外蒙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独立”称帝，这个消息传到了内蒙各地，从来迷信皇帝的巴布扎布，是不欢迎辛亥革命的。外蒙独立，他遂产生了北走外蒙，往投哲布尊丹巴的思想。

一九一三年一天午夜，巴布扎布领着三、四十名部下，带着妻子儿女逃出了大冷营子，奔向大库伦（今乌兰巴托）。我那时才七岁，由家出走的情况还模模糊糊地留在我的脑子里。那天黑夜，全家坐了一辆七个马拉的大车，盖着被子出了大门。屯子里狗声乱吠，前后都有骑马的人保护着。这夜雾下得很大，走出不远有人说后边有军队追来了，我觉得很害怕。不知走了多么远，才到了金龙镇（以后经过的地方我就记不清楚了）。住了些日子，再往西北通过奈曼旗、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东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浩济特旗等地，把家属留在浩济特旗，巴布扎布率领部队前赴大库伦，一路上跟政府军打了好几次仗，最激烈的是在优贵吉尔庙一仗。

由大冷营子出奔以后，一路又卷进不少人，到达大库伦时拥有二千多人马。

巴布扎布见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其他赛得（大臣），受到他们的欢迎和款待，当时哲布尊丹巴给了巴布扎布镇东将军、镇国公的爵衔。

巴布扎布在大库伦住了一年多以后，带着部队到哈拉哈河沿岸驻了约二年，整顿和训练部队。呼伦贝尔副都统凌升赠给巴布扎布牛马羊群和帐篷、粮食。

满清皇朝被推翻之后，清皇族肃亲王与日本人勾结，亡命到旅顺，日本浪人头子头山满、川岛浪速勾结肃亲王、升允等人，在日本东京组织了以满清复辟为目的的宗社党，他们阴谋组织一

个由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傀儡政权，并在东北组织了一些军队。明清时期，川岛浪速在北京日本公使馆当翻译，后来又做过清朝的警察教官。他与肃亲王交往很深。肃亲王亡命旅顺，也是川岛浪速为之策划的。后来肃亲王与川岛浪速结义为兄弟，川岛浪速没有儿女，肃亲王把自己的第十四女儿金壁辉给川岛浪速作为养女，改名为川岛芳子（川岛芳子后来曾嫁给我二哥甘珠尔扎布为妻）。

巴布扎布在哈拉哈河畔驻扎时，宗社党想把他拉入党内，利用他的兵力从事复辟活动。因此，川岛浪速派了几个日本浪人和他的义弟川岛浪平等到哈拉哈河游说巴布扎布加入宗社党。巴布扎布答应参加，并派妻弟塔萨到日本去联络。宗社党向巴布扎布那里陆续派去日本浪人斋藤元宏、入江种矩（退伍工兵大尉）、木古辰二（日本陆大中途退学）、松隈据告（退伍军曹）、井上晴能、北条等人，并秘密运给许多炸药子弹（藏在火柴箱里伪装商品），加强了巴布扎布的武装。

为了表示诚信，在川岛浪速的斡旋下，肃亲王把第七子宪奎（金壁东）送到哈拉哈河，巴布扎布把大儿子浓乃扎布、二儿子甘珠尔扎布送到肃亲王家，双方易子为质，以坚信誓。

宗社党打算让巴布扎布率兵南下，攻打张作霖，先把东北拿过来，然后进关复辟。

曾经有三四个德国人带着通事和向导骑着骆驼来见巴布扎布，听说他们的来意是游说巴布扎布出兵，攻击俄国的后方。这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巴布扎布答应了没有，我不知道，临走时，他们赠给了一箱德国匣子枪。他们走离不远，一部份士兵追上去，把来人全部打死了，到如今我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巴布扎布把所部分成两个梯团^①，自己率领第一梯团，布恩巴扎布率领第二梯团，分路南下，准备攻打奉天城。军中高揭一丈多长的黄旗，人们称之为西喇奇力克（黄军）。南下之中，沿途胁从参军的蒙古人不少，兵力达到三千人，一路上跟奉军打了多次仗，攻破了瞻榆县，进攻突泉县。

这时吴俊升驻守突泉。在这次战役中，吴肩上受了伤。巴布扎布军队经郑家屯北上，进入南满铁路线郭家店车站。张作霖各处调兵遣将，十多万奉军包围了郭家店，双方对峙了一个多月。日本当局为了保护巴布扎布军队，借口满铁附属地带，不允许双方在这里交战，宗社党又给了巴布扎布四门青铜炮（日俄战争时日本用的旧式山炮，一打就后退三米远，再往上推到原地再发射），并派来一个退伍炮兵少尉西园元三郎，这时日本国内许多报章杂志，极力给巴布扎布宣扬，称之为成吉思汗再来，蒙古独立的“英雄”。

正在这个时候，大总统袁世凯病故，日本大隈内阁的对华侵略政策，采取狡猾、隐蔽的手段，不让宗社党公开活动，宗社党只好令巴布扎布撤退。巴布扎布无可奈何地准备退出郭家店，但是陷于奉军重围，突围必将付出重大牺牲。日本乃借口在南满铁路附属地带不许交战，并由关东军驻公主岭的骑兵联队派出一个小队（排），打着日本国旗护送巴布扎布军队脱出重围。巴布扎布率众准备再回大库伦，取道双辽县、东科中旗、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巴林旗等地，途中也不断与奉军交火。到了林西县，一天清晨，攻打林西县城，城里奉军驻有一个旅，激战之后，奉军开始由西门撤退，巴布扎布刚要由东门闯进的时候，一颗流弹

①：彭祝三文中说是组织三个梯队。

打中了左眉上都就地阵亡。事后有人说是一个随从打的，究竟如何至今也不清楚。

巴布扎布阵亡，全军失去了主宰。也不打林西了，一霎时各自四散，有的投降了张海鹏、吴俊升；有的拉出当土匪。色布精格率领二百多人回到哈拉哈河，北上攻陷海拉尔，盘踞两个来月，烧杀南屯，抢劫财富，后来，呼伦贝尔副都统凌升到赤塔求借俄国兵才把这些残兵打出去了。

（海市政协文史组整理）

编者附记：据自治区政府参事室原主任博彦满都先生谈，巴布扎布确系被他的一个随从卫士打死的。这个卫士打死巴布扎布以后，并把巴布扎布的头割下来，跑到吴俊升处请功，吴当时竟下令把这个卫士枪决了。

巴布扎布叛乱始末

彭 祝 三

巴布扎布与米振标的战争已经过去五十年了。巴布扎布制造民族矛盾，分裂祖国，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甘心为虎作伥，一心扶助清室宗社党进行复辟活动。他的队伍毫无纪律，抢掠蒙、汉人民，焚烧残杀，行同盗匪。对此，我访问了在巴布扎布所部当过连长的古鲁扎布、当过兵的高文才（蒙名正月），又访问了毅军管带张子平、旗牌官郭巨万、周凯臣等人。综合情况，整理如下，尚希知者加以补充指正。

一、巴布扎布的起家

巴布扎布系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人（后移驻苏鲁克旗，即现在的彰武县），略通蒙文，身体粗胖健壮，善骑射。据说，巴布扎布系“他不囊”（驹马）出身，为僧格林沁后裔。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日俄战争时他即投靠日本，当了蒙人洋队首领，在辽北一带扰乱俄军后方。沈北三面船地方的俄军粮台被焚烧，巴布扎布也出过力。帝俄战败，南满权力归于日人之手，日人对巴布扎布更加培植。辛亥革命以后，又把他拉入宗社党内，希望他进一步作日本帝国主义的爪牙。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外蒙八世活佛哲布尊丹巴宣告“独立”^①，称“日光皇帝”于库伦^②，年号共载，传檄于内蒙古各王公，谕告归顺。并于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十月，派“陆军大臣”陶克陶为统帅，率精兵八千向热河一带入侵。此时，巴布扎布在锡林郭勒盟召募了一千八百余人。由于缺枪弹，亲去外蒙觐见哲布尊丹巴，原期得到械弹补充，但所得援助不多。于是，巴布扎布率队转战于张家口、多伦诺尔、经棚^③一带。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袁世凯改制称帝，巴布扎布借口讨袁，誓师于哈拉哈河，统军南下。哲布尊丹巴派游格吉庙大喇嘛拉甘什，暗中援助内蒙古王公和巴布扎布发动暴乱。当时内蒙古人民，因受军阀压迫，战乱骚扰，有盲目加入巴布扎布队伍的。日本帝国主义乘机派遣特务，与巴布扎布建立密切的联系，给予支持。巴布扎布统率所部，流窜于阿鲁科尔沁旗、科尔沁右翼前旗、呼伦贝尔和洮南、突泉、辽源、怀德、梨树诸县，以及热河及乌珠穆沁旗一带地方，骚扰蒙汉民户，劫掠往来商旅，无所不为。

巴布扎布在其日本主子的指使下，称自己的队伍为蒙古宗社党，自任宗社党领袖，并与满洲宗社党取得联络。日本帝国主义者派遣日本教官，到巴布扎布军司令部担任训练工作，并以武器装备其部队。在巴布扎布的庇护之下，前清宗室某王之子^④，以

注：

①有的文章说应为二十一世，

②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把托。

③多伦诺尔——今多伦县。经棚——今克什克腾旗。

④即肃亲王善耆的第七个儿子宪奎。

满洲宗社党领袖的资格，在东北境内大肆活动。

二、流窜热察，发展壮大

林西为热北门户，并为军事重地。袁世凯早在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三月间，就派毅军^①统领米振标率兵二十余营为前敌司令，由通州开赴林西坐镇；后又以姜桂题为热河都统，米振标仍以镇守使固守林西，控制边陲，攻守可据。

一九一五年秋，巴布扎布率部窜扰于张家口、多伦诺尔一带，乘虚进攻经棚。该地并无守兵，商会会长刘金秀将巴布扎布迎接进去，供应队伍给养。巴布扎布也禁止所部骚扰商民，并以黄布书写蒙文盖上将军大印，以作顺民执照，连同经棚地方四十二排半，亦同享此顺民待遇。巴布扎布以经棚东门外的关帝庙作为将军行辕，队伍均住在附近各处，在街外作防御工事，并将大炮设于敖包山上。至十月一日，奉军吴俊升部二千余人蜂拥而来，巴布扎布开炮迎击，并着密集马队冲锋，分左右两翼包剿。激战二、三日，双方互有伤亡，奉军退于经棚以东之大坝梁地方。毅军前敌指挥张二扁担（名殿如，字敬亭）率马队三营，步队三营、炮兵两营前来，与奉军会师联合向经棚进攻。巴布扎布部队伤七八十名，乃撤出经棚向沙窝子一带退却。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春，巴布扎布率队退到乌珠穆沁和浩济特两旗边境上的嘎海额勒苏（沙漠）定居下来。巴布扎布自称大将军，二将军为白某（忘记名字），多留守后方，班宝珠为

^①毅军隶武卫左军，为正式建制军队，军饷由袁世凯政府供应。

三将军（东北人），并越级提升官兵以资鼓励。本年初夏，古鲁扎布因屡立战功，升为红旗先锋连长，编制等于一个营。巴布扎布还派员到外蒙喀拉喀等旗召募新兵，以扩补其部队兵员。为与外蒙切取联系，还设立驿马站十八处直达库伦，并亲去外蒙一次，请求补给枪弹，后又派白二将军去了一次。外蒙补给别来弹枪一千八百支，连珠枪一百支，由驿马站用骆驼及小车运来，分发官兵使用。这年冬天，派队去宾图、索伦等旗和其乎拉、其木巴、达庆合夥，以扩大兵力。由于队伍增多，日用浩大，因而强迫汉人富商大户，捐献马牛羊，少者三四十头，多至百八十头；对蒙民牧主则勒令报效军马菜牛。如巴林左旗东协理之兄莎拉沁扎布，曾被孤去（等于绑票），用好马百匹、元宝二十多锭始行赎回。以后遇到汉人的牛马羊群就全部赶走，一点不留。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十月间，热河方面派来大军，分路包剿，激战有六七天之久，双方伤亡很重。巴布扎布终以众寡不敌，器械悬殊，遂率队撤退，逃到外蒙境内喀拉喀河畔。是役巴部伤亡四五百人，逃亡者也很多。官兵家属均安置在距营房十数里外之牧场。巴布扎布之家眷则随军携带，有太太一人、大闺女及三个儿子（浓乃扎布，甘珠尔扎布，正珠尔扎布）。巴布扎布向来都是穿紫色衣服，俨如喇嘛，临阵两手拿自来德手枪亲自指挥。乘马打仗，穿红色斗篷，夏令穿红色偏衫。在喀拉喀河畔期间，秋冬之际，他常出外行围打猎。此时，巴布扎布部队的军饷，甚感困难。肃亲王之子（名字不详，人称七爷），（按：即宪奎），系巴布扎布之婿。他派人来到喀拉喀河，向巴说已取得日本人的援助，答应给步枪一万支，大炮四门，弹药充分供给，定于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秋在四平交货。以后又有日本人来过一两次，研商起事及接应军火之事。巴布扎布即加紧训练队

伍，准备南侵。

三、南下与米振标大战林西城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七月初旬，巴布扎布的队伍开始南下活动，当时编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由色布精额统领，第二梯队由哈达统领，第三梯队由巴布扎布及其副将鄂巴扎布统率。各个梯队到达兴安岭后，隐蔽潜行南下。经过喜图业图旗（即科右中旗），令第一、第二梯队攻击突泉县，巴自率主力，到四平街取到军用武器，并由日本人派来特务军官、医官二十余人。第一、二梯队占据了突泉县，开始与奉军吴俊升部接触，战斗十一天之久，互有伤亡。因遭到奉军合围包剿，即突破奉军左翼，于七月二十二日由十家子渡河向南继续挺进。此役奉军吴俊升受伤，巴布扎布的统领巴他阵亡。南进中时与地方警甲遭遇，也有打土围子的时候（地主庄园）。得到的一些旧式武器和大炮三门，每门炮均配属两名日本教官担任指挥，精选十名士兵随炮，此外军中另有十五、六个日本人，担任参谋和医疗工作。

八月十五日，巴布扎布率第三梯队占据了郭家店，在扎鲁特旗巴音苏庙与一千多名奉军骑步兵遭遇，打了两天两夜，奉军败走。这时，巴布扎布以前由海伦招募的汉族步兵三千名（多系土匪），器械齐全，也由梨树县买卖街等处前来会师。奉军吴俊升又配合万福麟部，分路前来兜剿，用大炮合击，战斗非常激烈，几乎把郭家店炸平。巴布扎布抵抗了五六日，死亡二三百名，受伤者三四百名，于是年九月初旬退出郭家店，沿达尔罕旗（即科左中旗）向北撤退。经扎鲁特、阿鲁科尔沁、巴林左、右旗西进，沿途各旗的牧民青年被裹胁者颇多，到了右旗白塔子地方，

检阅徒众有八千余人，号称万骑，浩浩荡荡扑向林西县城。到达东沙台地方，得悉林西县城已有准备。当派骑兵两连向南道搜索前进，派步兵两营向东河一带跟进，时在十月七日（即旧历九月十一日）。当时林西镇守使为米振标，因为已派常得胜带骑兵五营援救开鲁，林西守备空虚，即电热河都统姜桂题请派队协防。姜电复固守。米振标于十月六日夜派骑兵两连，向东河方面搜索；派管带石成金，率步四营为前卫；派马帮带（管带为米之次子，年幼不能带兵）率步一营为后援队，均前往东河一带迎击防堵，以固林西门户。十月七日早七时，石成金率队渡河之际，巴布扎布之骑队却由沙不台左右两面猛袭而来，石率队仓促应战，士兵四散奔逃。巴布扎布指挥大队迂迴包围，石管带阵亡，全营被歼。这时，步一营马帮带尚在东河西岸，应援不及，士兵也四零五散，奔回林西城中仅剩百余人，马帮带也畏罪而逃了。

米振标两营被歼，即将其余七营兵力调入城内，把守城垣。将炮兵两营布置在西山上，将东、南、北门用土袋堵死。并在城墙东南、东北的炮台上作好机关枪掩体。一方面急调常统领马队星夜回救林西。布置尚未就绪，十月八日晨，巴布扎布之骑队已由大小簸箕沟以东的不冷苏不台庙，分数路蜂拥而来，并从东山上架炮向城内进行轰击。巴布扎布之队伍冲到城边二三次，均被击退，最后终将东营盘占据（距街一里）。巴以此为据点向北门进击；又令古鲁扎布率红旗先锋连攻击南门，复派大队迂迴袭击西山之炮兵阵地，战斗非常激烈。米振标的司令部设于北门之下，米骑马往来指挥战斗。此时城中弹雨横飞，炮弹炸伤商民数十人，房屋倒塌无数，人心惶惶，有越城逃亡者。米振标派队督查，严禁逃亡，尚正法一人。

四、巴布扎布之死

正当林西城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有刘姓闲员一人，他在炮科多年，充当炮目，发炮甚准，经人推荐，米当令其到炮兵阵地相机应付，并许以重酬。该员试射第一炮即中敌之炮兵阵地，发射第二炮，不偏不倚，正射入敌之炮口，将炮炸毁，伤亡数十人。又连续发射数炮，均命中。巴布扎布即于此时头部被击中，阵亡于东山下（按：此说不一，详见附记）。巴部主帅一死，兵无斗志，纷纷撤了下来。这时红旗先锋连连长古鲁扎布已率队冲到南门，听见指挥部的集合号声，带队回到东山司令部，始悉主帅阵亡。巴之尸体用黄缎子盖紧，就地拆房一间，用裸木火化，尸体火化之后，筑一土坟为记。米振标见敌军火力减弱下来，阵势亦呈动摇之象，遂由北门派出步兵两营，分头出击，两军呈混战局面。巴之部下统领小喇嘛，有二三百人顽强抵抗，直到日没，弹尽力竭，始率百余人投降。此役，米振标还俘获日本教官三名。巴之残部，当晚退出十七八里宿营。是夜，大雾弥漫，连续三日双方派兵警戒，未有战斗。至天晴时，巴残部始分三股向坝后退却。第一路一百多人护送一门小炮，连同驮着炮弹的一百多峰骆驼到游格吉喇嘛庙；第二路，护送辎重行李车，向喀拉喀河退却，当行至巴林左旗乌素伊肯地方，被增援开鲁回来之常得胜部队剿袭，加以后有追兵，前后夹击，大小辎重车千余辆均被截获，巴之残部又伤亡一二百人。另一路二千余人，由副统帅率领，沿大小巴林向锡林郭勒盟地方撤退。此役，米振标军虽亦阵亡七八百人，但终是大获全胜，缴获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甚多。

在林西围城战之中，伤亡商民数十人，房屋倒塌数十间，尤

其是巴部溃退之际，巴林左右两旗北部遭溃兵烧杀抢劫受害最重。不论蒙、汉人民之牲畜，遇着即被成群赶走。如巴林左旗东协理米希格拉布丹一家，就被抓走三人，家中细软抢劫一光，一千多匹马、一千多只羊、几百头牛全被赶走。巴林左旗王爷之马群亦被赶走八九百匹。其他不胜枚举。《林西县志：战役记》云：“民国五年一役，凡巴布扎布队伍经过之地，俱为灰烬。”日人柏原寿久《蒙古地志》中亦说：“在遭到巴布扎布乱后，左右两旗牲畜，损失达三万头以上。”当时米军亦藉机掠夺，使蒙古居民不堪其苦。牧民见军队来，骑马逃避，军队即指为奸细，格杀勿论。驻经棚的官军张二扁担在浩沁羝羊庙一带，抓获所谓通巴布扎布的蒙民嫌疑犯四五十名，砍头八九名，监毙三四名，余者均判徒刑。在交战中，双方俘虏更多，状也极惨。巴布扎布之残部，由副统领色布精额率领之一路，尚有二千余人，于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春天，曾攻入海拉尔，占据半年之久。后被帝俄军队逐出，由鲍四台吉率领投降了西扎鲁特旗王爷。其余残部均被黑龙江奉军收编。至此，巴布扎布叛乱始告平息。

附 记

关于巴布扎布之死，其说不一。据访问毅军第三营管带张子平（张现年百有四岁，为林东老爷庙住持）说是炮弹炸死的。而旗牌官周凯臣说，巴骑一匹大黑马，穿红色斗篷，带队冲到城之东北角，被机关枪打落马的，由部下抬到马上驮走。古鲁扎布的儿子图门布和与高文才则均说，巴布扎布在东山上指挥，在炮兵阵地左侧，被自己的差人用黑枪打死的。据说当差人系替兄报仇，乘炮炸之际，烟尘弥漫，暗下毒手，将巴打死。当时该当差

的乘混乱之际，带几个人投降了米军，米振标曾赏一哨官位置。但不几天即被米枪决了。因米谎报军情，说巴布扎布是在交战中被击毙的。怕该差人泄露真情，遂将其处死。

林西县东门外龙王庙左侧，有巴布扎布祠堂一所。据访问图门布和及高文才二人，均称该祠堂是米振标于战后第二年修的。原因是，巴之部下尚有数千人在蒙地潜伏为患，热河军政方面出示晓谕，以宽大为怀，既往不咎，令解散归里，各安生业。所以米振标在巴阵亡之处给巴修了一个小祠堂，藉以笼络巴之部下。但在访问郭巨万时，郭说是伪满康德元年三月间，溥仪举行登极大典时，令林西县修的。巴之儿子甘珠尔扎布，在伪满康德八九年，为通辽第九军管区中将司令官，林西是其防区，因而日满官兵经过巴的祠堂，均要下马致敬。

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

（政协昭盟委员会供稿）

五四初期新文化运动

在绥远地区的传播

杨令德

(一)

五四运动后三年头上，一九二一年春，京绥铁路修到绥远特别区首府归绥（又叫绥远城、归化城，即今呼和浩特）。随即修到了包头。

这年上半年，甫由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萨拉齐人祁志厚新任绥远唯一最高学府——归绥中学校长，由一位老夫子成焕文任学监。当时这个学校每年毕业一班，新招收一班，同时在校有三、四个班。祁志厚开办的是第十一班，开始举行入学考试（过去不考试，每个学生且免徵两顷地田赋）。李裕智、吉雅泰和我同时考入这个班（我们三人同住一间学生宿舍）。这时学校的国文老师还是教古文，读经传，我们也是用文言文作文章。子曰诗云，之乎者也，乱扯一阵。到了下半年，祁志厚从北京请来他的一位北京师大的同学叫李广和，担任十一班的国文教员，气氛一下

子就变了。李广和教白话文，把五四运动新文化、新思潮传播到这里来，很快就在学生中掀起了反对旧礼教、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高潮。学期未完，李以过激分子的罪名被驱逐出境。但李撒下的火种，却熊熊燃烧起来。

第二年一九二二年，十一班的同学以李裕智、吉雅泰为中心，组织读书会，狂热地读起新书籍、新报刊来，如《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白话书信》、《新青年》、“三大副刊”等等，在班里掀起了文言白话之争，甚至驱逐了一位教古文的老学究。

这年下半年，成立了绥远师范学校。因为是官费，吉雅泰、我还有一位十一班同学董怡，报考师范转学。试卷上（1）论文题：战国四君论；（2）问答题：乌伊两盟十三旗的名称。论文好做，对于战国四君的故事也比较熟悉，所以洋洋洒洒写两三千字的白话文，在我说来已不难。问答题几乎交白卷了，因为在高小学地理没学过这些，当时绥远包括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十三旗和土默特旗。我只知道有土默特旗、准格尔旗。就这样还是考中了。可是过了不久，对我们从中学转过来的一律不收。于是我们就找学务局交涉，找老师们帮忙。我给学务局长王济若上了万言书。几经周折，在师范学校开学之后，才把我们收下，到校第一堂课就是荣（祥）耀宸先生讲的国文课。荣先生蒙族，土默特旗人，对国学有深厚根底。在北京上学时，拜一位桐城派大师为及门弟子，对桐城派古文很有造诣。先生擅骈体文，精于诗律，以少年才俊与当时在京的樊樊山（增祥）、易石甫（顺鼎）等老人唱和，有“塞北文豪”之称。三十年代即有《瑞芝堂诗钞》行世。先生是国学营垒中的卫道者，与五四运动新文化格格不入。今主持师范学校教坛，遂发攻击白话文的言论，称《胡适文存》

不值一读。此类书他一周就可写出云云。我听了甚为诧异，因《胡适文存》我已读过，所受影响颇深。下午上习字课，我写了这么几句话：“字之写不好也，笔无罪，墨无罪，纸无罪，砚亦无罪，罪在朕躬”。李裕智、吉雅泰我们几个人，平常自称孤家寡人、称朕、开玩笑，所以这里我就用了“朕躬”字样。大字写完尚有余幅。我又把不久前看到的林琴南的几句话，用小字写下：“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传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算甚么东西”。林琴南说的是反话，他写了一篇小说，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金心异为名，影射钱玄同，借此用上面那几句话骂了一通。这时我在绥远《西北实业报》已经不断投稿，头几天在《西北实业报》看到引用林琴南这些文章，今天也是故意想刺激一下荣先生。我的同学董怡与我不谋而合，他在习字课上写了下面一段话：“塞北有个大文豪，自大一点臭也”云云。这下子激怒了荣先生，以去就力争非开除我们两人不可。罪状是“诬蔑古人，辱骂师长”。于是我们很快就卷铺盖了。

十一班同学刘桂，于气愤之余给北京《晨报》为此事写了通信稿，刊登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晨报》第七版上，原文如下：

绥远师范风潮趣闻

学校也兴文字狱

难道这应开除么

绥远师范的国文教授，就是自称塞北文豪的荣祥先生。有一日，他上了课堂，对学生说道：“现在的白话文，是很没有价值，如胡适他们做的那些非驴非马的文字，简直是很容易做的。要是让我来做，一礼拜就能做一厚本”，荣祥说了这几句话后，引起两个学生的反对心，所以在那日习字堂上，这两个学生在他

们的纸上写了几行字，一个写道：“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算甚么东西。”一个写道：“绥远出了个古文家，就是有点自大”。荣祥见了这两张纸惶恐的说道：“师范不幸出了这样的捣乱学生，这还了得么。”于是忙忙的拿了那两张纸，一溜烟跑到学务局去见局长王济若，王一见这几行字大惊而特惊的说道：“这种现象不应该出在绥远，尤其不应该出在师范学校。总而言之是我的过错，假使我当时不让这两个学生进这个学校，那有今日之现象发生呢”。于是召集各教员会议，马上将两个学生开除了。（馥斋）

《绥远师范风潮趣闻》登出后，影响还不大。可是这时绥远在北京上学的大学生，一般都是参加了五四运动的，对于我们的被开除，激起了义愤，他们在北京办的介绍新文化的两个刊物，旅绥同乡会会刊、同学会会刊，便以大量篇幅，刊登了不少攻击荣先生和同情我们的文章，我也写了长篇文章，在这刊物上发表，当时绥远在北京的大学生，如北大的陈志仁（之的）、师大的贾武（止戈）、农大的潘秀仁（大一）等，连续在两会刊上发表批判荣先生的文章，甚至加以人身攻击。这样就把绥远新文化运动文白之争的第一仗轰动了起来。

其实，当时都有很大的片面性。我们把荣先生当作“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荣先生也就把我们看成“离经叛道，洪水猛兽”。胡适与老虎总长章士钊的文白之争，章始终不写白话文。荣先生在三十年代初，主持他大女儿婚事。亲自写了白话文，在报纸上登了启事。以后在我编辑的书报刊物上，他也写了大量抗日的白话文章。抗战期间，我们在陕北榆林住了八年，共同矢志抗日，成了真正的师生。

三十年代初，内蒙王公、贵族、总管，搞了百灵庙自治运动，

一开始德王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操纵下，卒至在日寇刺刀下搞了个伪蒙疆政权；荣则弃家出走八年，坚持抗日到底。在此期间，荣受邓宝珊将军的影响很深，直至参加了绥远“九一九”起义。先生在抗战时期和解放以后，以律诗、古歌写了不少坚持抗日和歌颂新中国的诗篇。律诗工稳严整，古歌隽永流畅，咸有独到之处。此外，还留有不少有学术价值的国学论著。盖棺论定，可以说先生是一位热情的诗人，对方志学，史地沿革有著作、有贡献的国学家，值得怀念的爱国老人。

(二)

五四初期的绥远新文化运动，到了一九二三年，就逐渐影响到社会。学生走出学校，在归绥街上游行示威，反对“二十一条”，纪念国耻，抵制日货，轰轰烈烈闹了起来。

火车已经通到包头，归绥的中学生，就自发地沿绥包路在萨拉齐县、包头镇街头宣传讲演，大声疾呼纪念国耻，抵制日货。

这一年，在北京的绥远大学生，于寄发大量的宣传品回来之外，又组织了话剧团，和归绥的中学生、教师，共同在归绥的戏园子里，公开演出了《一念差》、《孔雀东南飞》等剧。学生演戏，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气得老年绅商直翘胡子。我们托县一位这样的老人，一见我在舞台上出现，就说：“怎么杨家这小子也唱起戏来？！”我们几个托县同学把演剧的道具、剧本搬回托县那个小城，在城隍庙的大戏台上，也演出了《孔雀东南飞》，效果不亚于在归绥的演出。

托县城距归化城近，文化较发达一些。五四新文化运动也逐渐传播到这里来。当时有托县、河口两个高等小学。河口是水旱

码头，早建立了商务会。商务会办了一个等于高等小学的乙种商业学校。商务会的秘书贾静德先生同时也当了商业学校的国文教员。贾是名塾师郜荣先生的弟子，读过四书五经，家贫不能深造，住归绥简易师范不到一年，也回家乡当了塾师。其时贾年不过十七、八岁，学生颇有年长于他者，而他对之也是施以夏楚，严加管教。他教的学生，学业成绩，一般都较好。这样他就成为名噪一时的“少年塾师”。今执教商业学校，如同荣（祥）耀宸先生在归绥师范学校一样，在文白之争、新旧之争中，成了旧文化的卫道者。我在他出的题为“胡适论”的学生作文本上，看到了经他批改过的这篇宏文，就以L T的笔名写了一篇讽刺文，发表在一九二四年四月九日的《晨报副刊》上：——杂感“胡适论” L T

记者先生：

我这篇纪实的文章，你看可以当作杂感发表吗？

有一天——星期日的下午，我匆匆跑到了S学校，在校长室休息了一会。随便拿起一个学生的作文练习本子打开一看，见有标题“胡适论”的一篇大文！我想胡适何幸，竟有人为之作论了！一时引起我的好奇心来，便详细地把这篇大文——胡适论——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呀！不看还好，这一看之下几乎气破了我肚子！原来这篇文章是经该校国文教员A先生修改过了的，所以内中A先生说的话也很不少！末了A先生的批语是：“作辨驳文可以唤醒迷梦，该生其注意”数个大字。唉！不意我们绥远的学生——而尤其是教员——竟会有如此荒谬绝伦的思想、言论，真教人哭笑不得，当时我的脑筋紧张到了万分，把这篇师生合作的大文中的要言语，足足的读了数遍，我现在且节录于下，介绍给大家见识见识：

“彼胡适者，伤天害理，倒行逆施，可谓极矣，提倡男女同校，主张自由结婚，误解平等自由之学说，举行公妻共产之主义；……遵崇外洋之劣法，排斥孔孟之大道；……破坏礼教，捣乱纲常……是亦所谓民贼也已，……岂以圣人为不若彼耶？不然，何以举吾古圣贤王之六经竟不惜革而过之，复活不知耻，犹高谈彼辈提倡之不值一文之俚俗白话耶？丧心病狂，一至于此！……胡氏詎能辞其咎乎！呜呼！若胡适者！诚千载以下之大罪人也，……”

这里边的标点符号，当然是我加的蛇足了！本来都是打着很浓的密圈呢。浅学如我的人，读这篇师生合作的大文，很觉费力，因为有许多地方我觉有点太……了！我所录的这几句话，是原文的最精彩处，读者总可以领悟出来的吧。

静德对我自然很不满意。真是不打不相交，当我也在商业学校一度任教时，我们很快就成了知己。后来我当了新闻记者，离开家乡几十年，他在家乡勤勤恳恳当了一辈子教员，桃李满门，功在桑梓。六十多年来，我们始终保持了深厚的友谊。解放后他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拥护祖国的统一。在党的培养下，他的子孙辈有优秀共产党员，他以“鞠躬尽瘁，克己而已”勉励之，高风亮节，老而弥笃。晚年受聘为内蒙古自治区文史馆员，一九八四年初以近九十高龄而逝世。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呼和浩特）

回忆包头《西北民报》

杨令德

一九二五年，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焕章）上将军驻守包头。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李大钊同志领导北方党的工作，包头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内蒙古省党部，由土默特旗早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李裕智、吉雅泰负主要责任（李、吉两人也同时为国民党员）。我也是成员之一。我是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时参加国民党的。

一九二五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在包头创办了《西北民报》，由早期共产党人蒋听松任社长，胡英初任总编辑，出面主持报纸工作。对外宣称报是冯玉祥上将军办的（党在报社内是公开的，但对外不公开。北伐以前，改组后的国民党在不少地方也是处于地下的）。这张报纸一开始，便以新的面貌，宣传“五四”新文化运动，运用白话文，每日出版一张四开报纸。最初为石印。这不但在闭塞的绥远地区是首创，而且在当时的西北地区也几乎是一张有影响的新型报纸。不久，冯部在包头购置了铅印设备，成立了西北印刷局，《西北民报》就改为铅印，由西北印刷局承印。蒋听松是浙江人，胡英初是江西婺源人。报馆成员不足十人，C·Y（共青团员）多于C·P（共产党员）。当时的同

仁，有周之楚、马荫良、丁宝铨、刘贯一和我等国共两党同志，我和刘贯一最年轻，刘比我年纪还小。报纸的内容有社论及各方面的文章等。社论大都由蒋听松、胡英初执笔，马荫良（C·Y的负责人）主编副刊。

《西北民报》曾经发表过的重要文章，能记起的有：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的文章等等；反帝、反封、反军阀、反对旧教礼、打倒孔家店的文章，发表的更多。一九二六年初，河套的大恶霸地主王同春（王英之父）死了。当时讣告甚为流行，王家更不例外。讣文的公式开头几句总是“不孝某某不自殒灭，祸延先考（妣）”云云。意思说自己不死，反而祸延父母死去，大不孝。这岂不是说先父母而死倒是“孝”了吗？这本来不象些话，但习以为常，所谓上流社会的人们也就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我们就这个讣告，在《西北民报》发表了一篇指名道姓冷嘲热讽的文章，引起了知识界的重视。象这类内容的文章，我们经常发表。我也写了不少这类短文。“窥一斑见全豹”，《西北民报》发表的文章，大都是这样。

在这之前，我已在绥远、北京的报纸上发表过一些短文章。一九二五年，《西北民报》一出版，它的新风貌便吸引了我。在家乡托县河口镇乙种商业学校任教的我，便投寄了两篇文稿，都被采用了。之后，《西北民报》社长蒋听松写信给我，招聘我到报馆工作，从此我投身新闻界，一直当了廿五年新闻记者。我在《西北民报》当小记者、小编辑，除出外采访，还编了一个名为《余兴》的专栏，另外还附出了几期《火坑》（这是我办的一个文艺刊物）。因为我是本地人，比较熟悉，所以成了报馆唯一的外勤，当时叫访员。

一九二六年《西北民报》同仁随冯军西退后，次年胡英初、

马荫良几位同志就牺牲了。蒋听松随冯部西退到五原，和刘伯坚同志在冯玉祥幕下工作了一个时期。西退时，《西北民报》也停刊了。冯玉祥由苏联回国后，在五原誓师发表的《告全国人民书》就是蒋听松执笔的。蒋当时不过三十岁，文采出众，善与人交，其后隐于陕豫之间，与南汉宸同志保持往来，仍为党做了不少工作。解放后病逝于北京。刘贯一在兰州被捕，由邓宝珊、续范亭保释出狱，转入地下工作。五原誓师后，冯玉祥一度到过包头，《西北民报》改名为《中山日报》，由郭伯瑞负责，出版了很短时间。

包头《西北民报》虽然仅仅出版了一年来时间，而在宣传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反对封建、反对旧礼教、传播新文化方面，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它同当时绥远地区只在旧绥（即今呼和浩特）出版的一张《西北实业报》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时的《西北实业报》完全是一套旧东西，其“社论”竟辱骂孙中山：“孙文一无赖子耳！”云云，其它就可想而知了。

《西北民报》这样一张小小的四开报纸，可以说当时在整个西北地区是独一无二的。它对于新文学、新文艺在这个地区是首先倡导传播的。我在《西北民报》附刊的《火坑》后来单独出版，延续数年，成为内蒙西部（包括绥远地区）比较早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刊物。

包头《西北民报》的出版，距今已整整六十年了。当初的同仁真是零落殆尽，只有刘贯一和我尚在。但我们这两个当时最年轻的人，如今也已七、八十岁了，所以好些事体都已遗忘。我曾保留有《西北民报》一部分资料，经过抗日战争，早已荡然无存。致使《西北民报》没有留下片纸只字。今日拉杂记此，不胜感慨。

（一九八四年四月廿三日于呼和浩特）

清兵镇压卓昭两盟金丹道

起义的经过

邢复礼

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年），带有反帝反封建农民革命色彩的金丹道教民，在卓昭两盟的各蒙旗举行起义。这次起义遭到了清廷的血腥镇压而失败，教民被清兵屠杀的近三万人，各旗蒙民遭难的也有三万人左右。被兵燹的地区有喀喇沁左旗、喀喇沁中旗，东土默特左旗、右旗，东、西翁牛特两旗，尤以奈曼旗及敖汗旗最为惨重。敖汗贝子府及翁牛特两旗的王府，都被烧成一片灰烬，蒙古王公祖先及下嫁公主的坟墓，多有被挖掘暴尸者。这些都给身经其事的各族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惨痛印象。即在解放以后，仍旧被提出为茶余酒后的谈话资料。现在根据父辈的传说，辅以个人的记忆，并参照有关史料，把这个历史事件的梗概，简述如下，能供给史学家们参考，则幸何如之。

一、教民在平泉州起义，

清廷命李鸿章出师

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年）十月十七日，教民数千，突入

平泉州街（俗称八沟，原为喀喇沁中、右两旗的所属地）焚烧天主教堂，打开州署的监狱，释放囚犯，商铺、民家亦有受其骚扰者，声势极为浩大。热河都统胜福闻报后惊惶万状，除飞奏清廷外，并檄热河管下州县及沿途各要冲，严加防范。奉天将军福录命东三省练兵事宜大臣安定派兵征讨。安定命聂切庭率兵五营进剿，因教民势盛，未奏肤功。

清廷钦命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出师。李鸿章命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兵急赴喀喇沁左旗。十一月二十一日，叶志超命亲军马队右营参将刘运昌，率领古北练军后营马队游击夏青云麾下的步兵两营，前进到建昌（俗称忙牛营子。喀喇沁左旗所属地）。又命营务处记名提督江自康，古北口练军参将韩照琦，正定练军右营参将叶玉标率部续进。令副将潘万才率马队两营，由五虎马梁、老河（即辽河）进剿喀喇沁左旗境内的教民。叶志超自置大本营于平泉州，指挥全军的作战。

参将韩照琦前进到建昌东南的瓦房店，侦知有教民两千，有进袭建昌的企图。遂与刘运昌、叶玉标、夏青云及练军马队记名总兵兰玉喜，热河队官防御斐录等联合前进。至五营子地方，看到教民无数，漫山遍野，树立五色大旗，严阵以待。及清军逼进时，枪炮齐发，势甚汹涌。其中一人羽冠鹤氅，执剑作法，是金丹道的头领。韩照琦、叶玉标等由中央冲入，动摇了教民的阵营；刘运昌、夏青云向左右两翼围攻，教民因腹背受敌，开始四散，清军追击，教民损失甚大，清军也付出了伤亡极大的代价。叶志超意识到教民数万，清军只有几千，恐难取胜，遂暂时停止行动。奏请清廷，派久经战阵的直隶记名提督聂士成亲率所部，征讨建昌及朝阳（土默特右旗）一带的教民。清廷准奏后，他觉得有所仗恃，才开始了进一步的行动。

安定和福录也共同研究了征讨的方案。以提督丰盛阿代替了聂切庭，并令丰盛阿麾下的总兵聂桂林率部前进。行至朝阳的八角山，又与教民遭遇，遂与朝阳练勇合向教民所据的山前和山后的阵地进击。教民即退守桃花吐地方（朝阳东约六十华里），选出精壮教民两千，列阵以待。聂桂林把马兵分为两队，由东西两侧偷偷绕到教民阵地的后背，丰盛阿自督本部人马，由中路直冲教民阵地，鏖战四小时，双方均死伤甚多。迨教民退到老崖沟（距清河门约六十华里，土默特左旗的边界）大庙、三家子一带，清军亦即掩至，教民又被屠杀数百人，并被清军占领了珠录格歹、水泉子等地。教民首领杜把什亦被打死，教首郭满昌、杨明两人被俘。此役前后被屠杀的教民约两千余人。建昌、朝阳各地的教民，遂被清军镇压下去。

二、旗官无故杀人，老道高树义帜

齐保山又名齐胤，别号齐洛道。本为建昌人，后移住于敖汗固山贝子旗，自称金丹道的教首，广收门徒，以“学好”相标榜。一八九二年五月，有他的胞弟和胞侄两个人，入里山（贝子府的后山）盗伐柴草，为王府的旗官所执，竟被处死，引起齐洛道的怀恨，思图报复。正值喀喇沁左旗教民起事，认为机不可失，利用汉族农民对敖汗旗王府征收地租过苛而引起普遍不满的心理，遂纠众千余名，突袭敖汗贝子府，焚烧王府，老少男女，无一幸免。继又出没于土默特右旗，掠夺黑城子王府后，蒙族人民亦多有受害者。收容由建昌、朝阳逃来的教民，分为数队，其势甚盛。各旗王府均向清廷呼救。叶志超派副将潘万才督师出动。潘万才前进到距榆树林约七十华里的地方，因天色已晚，遥见

火光烛天，知为金丹道教民聚集的场所，于是星夜急驰，在拂晓时，已到达榆树林子街口。看到教民的步兵约一千七、八百人，据榆树林子市街，还有骑兵二百多人列阵于街外，附近的各乡村也都被教民所占据。潘万才指挥各队，突入市街，双方短兵相接，展开激烈的白刃战。教民队牺牲百余人后，退入街上的一所当铺内死守，该铺有围墙两层，坚如营垒。营官都司蒋广标亲率各队，从四面围攻，并施以猛烈的炮火，血战入夜，犹未能攻入。马队哨官杨建胜，哨长徐绶廷，奉天军哨官黄占标等各率兵五十，攀登围墙由东西两面突入，枪击、刀砍，教民死伤甚多，同时对教民怀恨的蒙古人，也多来援助。潘万才又命本部人马，把教民在街外的骑兵和附近村屯的教民，全部包围，大肆屠杀，教民首领李某及领兵官孙惠、杨升、张惠、王承元等亦均被俘。

同年十一月十三日，直隶记名提督聂士成等，侦知教首刘怀，在建昌东叶柏寿（喀喇沁右旗所属地）地方，招集起教民一千余人，正在准备起事的消息，聂士成亲率参将叶玉标、刘运昌、夏青云等督率马步队数千人，径赴叶柏寿。教首刘怀列队迎战，聂士成令叶玉标直捣教民的中队，刘运昌、夏青云则由两翼围攻，酣战多时，刘怀的教民队伍渐难支持，纷纷后退，清军追击，教民又被杀戮百余人。接着又进剿了黑水一带（喀喇沁右旗所属地）的教民千余人。喀喇沁左旗的西南边境，至此已略告平稳，正欲进军敖汗旗的时候，忽然又接到教首赵玉恒率教民数千，在喀喇沁左旗境内的大马营，军师裴某率数百人屯聚于建昌附近的高尔砬地方的情报。

三、各地教民的奋勇抵抗，蒙古王

公队伍参领海元的镇压

叶志超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先讨大马营的赵玉恒部众，依次再前进到高尔砮。遂令副将潘万才率轻骑急赴吴公旗（即喀喇沁左旗）。

潘万才前进到教民的据点毛家窝铺，看到教民的堡垒异常坚固，两堡相连，并筑有重垣多座，依山，背水，形势险要。在主帅的黄色大旗下面，排列着服装整齐的步兵数队，骑兵则分布于附近各处，正在严阵以待。潘万才逼近堡垒以后，立命都司蒋广栋、潘万钟及各哨官分为三路，同时进攻。补用知县汪鹏，喀喇沁左旗参领海元也带领了本部马队，参加了战斗。三路围攻开始后，堡垒前的数门大炮和排列为一字形的八十余杆抬枪（俗称二人抬）齐燃并放，硝烟弥漫，弹下如雨，两军混战，喊声震天，清军伤亡很多。潘万才被迫自督部下，均下马步战，教民拒守堡垒，旋因教民统兵指挥赵金贵中弹阵亡，清军乘教民阵容渐乱，突入堡垒，教民头目徐小枝、侯阵忠等十数名都牺牲，教首刘献堂因伤重被俘，此役又屠杀教民三百余名。

叶志超立命总兵曾腾芳进击高尔砮的教民，并令副将杨元升，佐领金铃各部听其调遣。曾腾芳经澜泥沟、苇子沟、柳条沟等一些山岳重叠和深林密草的地区，突袭了教民的大本营，俘虏了教民及首领等四十余名，并在这里得到金丹道盟符的符号。黎明时，教民部队与清军展开了一场大会战，因军事指挥于刚（绰号于大刀）被俘，教民不得不向三官庙及金沙沟方向转移。

奉天提督丰盛阿听到有一部分被清军打散的教民，在土默特

右旗王府黑城子集合的情报后，立即派盛字营右翼马队佐领依桑阿，副将程楠森，总兵耿凤鸣分三路近逼黑城子。教民利用了黑城子附近的旧城堡，东南两面修筑了两座炮台，并占据城墙左边的固子贝子府的房室为前卫，见清兵到来，即以炮火猛轰，拒守甚严，清兵恃其人数占绝对优势，不顾伤亡，各队拥进城内，教民退至贝子府东，进入旗衙门，因旗衙门的庭院宽敞，墙垣高耸，据以反攻。耿凤鸣、程楠森各督部队，从东、北、西三方面猛烈进攻，旗衙门院内的炮台遂陷。教首于发等四十二名被俘。教众千余突围后，出黑城子的西门转移。

此时叶志超的大营，已由平泉州进驻到珠勒科歹地方（距下长皋约三十华里）。当时有一部分教民，分据下长皋及敖汗贝子府两地，形成犄角之势，叶令聂士成进剿。

同年十二月十三日，聂士成率部到杨家湾，令刘运昌，叶玉标率步兵由中路前进，夏青云居左，江自康居右，聂士成自率马步小队，在后督战，由三面进攻，教民给予猛烈射击，双方鏖战多时，教民遂败退，清军追击十余里，又屠杀教民约三百余人。十四日下长皋的教民，分三路来援，一路攻叶玉标、二路逼聂士成，势甚汹涌，清军仓卒应战，夏青云、刘运昌也分队驰至。前后夹击，教民被迫退守山岗。清军正想收兵，忽然有敖汗贝子府的教民骑兵约三千余人蜂拥掩至。聂士成下令余有云守东西一路，夏青云、江自康仍从左右围攻，自带马步队为中锋。教民骑兵突来袭击，都用黑墨涂鼻，用红线造须，口诵咒语，虽在弹雨枪林中，绝不后退。清军因子弹打尽，不得不安装刺刀，短兵相接。喊杀声，震撼山岳。最后教民不支，逐渐向敖汗贝子府方面撤退。清军追击三十里，杀戮涂鼻的教民两千余，生俘七百余。据说参加这次战役的为教首冯天祥的最精锐的部队，几乎全部牺

牲，生还者仅二三百人左右。

聂士成拟乘机进攻敖汗贝子府。先遣江自康、叶玉标、刘运昌等合围下长皋、切断援贝子府的后路。于十八日，亲率夏青云等各游击队冒雪出动，在寒风凛冽中，急驰四十里，到贝子府的时候，天尚未明。教民无准备，从梦中惊醒，仓惶应战，坚守贝子府的高墙。聂士成令夏青云从后面进攻，使聂曾率马队截住教民的退路，自引步兵数队，直冲贝子府的前门。激战数小时，教民不支开始后退，清军继又进入府内，教首王正、王福、马二老师等战死，教民被刀砍死者约五百余名；越贝子府高墙夺路而逃的教民，又被聂曾的马队截杀的约三百人，敖汗贝子府的教民，又遭到一次清军的大屠杀。

继而聂士成率全军人马，开始了进剿下长皋教民的行动。令副将张复成，参将韩照琦进攻东面，叶玉标攻西面，聂士成仍自攻中路。又把中营马队分为三路，堵截教民的退路。用大炮轰击教民阵营的前门，击中火药库而引起大火，教民正忙于救火，清军突入，乱杀乱砍，教首徐勋如、李亮等被害，军师孔庆广被俘。已经逃出的教民又被三路马队追杀无算。此次教民前后被屠杀的约二千余名。清军伤亡的也近千人左右。

四、左宝贵登场，李国珍出现，

杨悦春被执

福录和安定的军事会议决定，以猛将著称的左宝贵统率奉天军。左宝贵带着军队来到彰武台边门，与丰盛阿会师以后，即开始行动。破小岸伦开太庙各地的教民。副将程楠森在陈家窝铺，又俘虏了教首徐英瓶。在朝北营子的战斗中，教民领袖齐洛道为

流弹所中，右脚受伤，坠马后被部众所救，在煤窑沟回回教徒李洪才家养伤，又被清军搜获。

左宝贵继续挥军到奈曼旗，攻击据鄂尔图板的教民，并放火烧其营寨，屠杀元帅王凤得以下的教民一千余名，迂迴至建昌界的干沟子，又杀戮教民六百余名。十二月十九日突袭二十家子，又屠杀教民二百余名，元帅于化汶被俘。

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叶志超的大本营，由珠勒科歹进驻到敖汗贝子府，并会诸将，划定警戒区域。贝子府以东各路，由奉天军负责进剿。提督左宝贵驻军于山湾子，丰盛阿在清河门外，总兵张永清在鄂尔图板。直隶军提督聂士成驻军于下子，管理贝子府以西的剿讨事宜。

时有李国珍者，据赤峰北的乌丹城（翁牛特左旗所属地）自称为大明后裔，提出了“覆清灭蒙”的口号，扬言要给明朝报仇。纠合附近的马贼，进行抢劫。敖汗贝子府及下长皋被清军攻陷后，战场上败下来的教民，都被他收容下来，聚众有四、五千之多。自号“扫北武圣人”，从乌丹城以北起，经过那林沟，直连巴林旗的所属地，在这一段长达八十多里的直线内，设置了许多座营寨，按照八卦的方向，命名各营，每营拥有军士三百名，还派有军帅、将帅、副帅等各领兵官，气势颇盛。翁牛特左、右两旗的蒙民，多有受其蹂躏者。叶志超的大营，接到李国珍有准备进攻赤峰（翁牛特右旗所属地）的情报以后，立派潘万才、傅廷相两将，从事征讨。潘万才率马步兵前进到乌丹城附近，李国珍据乌丹城北的喇嘛庙，坚垒以守，并列队千人，射击清军。潘万才带邦统潘万铃从正面攻入，都司蒋广栋，哨官缪自成等则分击左右两侧，各队齐进，酣战多时，双方均有相当的伤亡。李部五百余，退入庙内，坚守不出。清军以车辆为梯，登上

大庙的围墙，居高临下地猛射了一阵，李部不支，突围撤退，首领梁成贵父子被清军所俘。

潘万才把全军分为两队，留一队驻守乌丹城，自督一队向纳林沟的另一个李军的堡垒挺进。十二月十六日的黎明，突袭据七棵树合成烧锅的李军一队，将帅张双及副帅周宽等带着七八百名战士，很迅速地转移了阵地。潘万才仍继续前进，在途中捕获了李军的哨兵一名，讯知与那林沟的李军堡垒仅一山之隔，清军立即登上山顶，正在俯瞰观察地形的时候，已被山下的李军所察觉，即用阵前所排列的抬枪，不断轰击正在下山的清兵。潘万才指挥潘万铃、缪自成的各队从中路直进，傅廷臣、蒋广栋各队分四路围攻李军的堡垒，血战数刻，李军已退入堡内，据围墙奋勇抵抗，清军又分数路超越围墙进入堡内，杀戮了由合成烧锅逃来的将帅张双及副帅周宽等外，并大肆屠杀李军的战士，有五百名之多。分头地驻有李军一队约有七、八百人，闻讯来援，在途中遭遇知县汪鹏及喀喇沁左旗参领海元，遂即交锋。潘万才率部众也赶来助战，在清军的左右夹攻下，李军败退，清军追击十余里，屠杀六百多人，清军前进到分头地的阵地（分头地分为左右两个村庄），李军筑成一道比较长的堡垒，把两村连在一起，并设有枪眼，见清军掩至，即以排子枪密集射击，清军不顾死伤，攻入堡内，李军败退四散。清军虏获大炮十六门，红帷朱轮轿车一辆，黄蟒袍一袭，明《万历通鉴》等书籍一箱，并有其它各种战利品。

清军留守乌丹城的部队，进行了一次大搜查，生俘重伤李军将士百余名，内有扫北武圣人李国珍及军师孟某。李国珍虽被执，但金丹道的第一首领杨悦春仍无下落，叶志超命令全军搜查各地的同时，并悬赏缉拿。继有密报者称：杨悦春在下长皋一役

后，已逃到色力虎金厂沟梁的山洞内潜伏。聂士成闻报后，亲率各队至金厂沟，包围山洞，生俘杨悦春父子、叔侄等六名。

卓昭两盟的金丹道（又名“红帽子”、“学好”）的起义，仅两个多月，即被清廷的无情镇压而告终。就教民领袖们坚贞不屈，教民的喋血奋战，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反对清朝统治争取自由争取生存的坚强决心，至于当时的历史及政治经济的背景，尤其在清朝统治下的蒙汉民族的关系，还有待史学家们作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四辑

作者 =

页数 = 2 1 7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